

炎黄春秋

第 **11** 期
2011 年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中国改革：从摸石头过河到架桥过河

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

希望工程是否存在“黑幕”的辩论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考察

目 录

特稿

- 1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程敏 建军 整理

亲历记

- 8 希望工程是否存在“黑幕”的辩论郭宇宽
14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
.....蒋庆泉 口述 寇德印 整理

一家言

- 21 中国改革：从摸石头过河到架桥过河聂辉华
25 政治体制改革躲不开绕不过虞崇胜
29 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演进郭道晖

人物志

- 32 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胡治安
43 张执一与隐蔽战线工作张惠卿
47 王实味在开封女中沈志平 沈建平

争鸣录

- 50 质疑“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期”说张光明
54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胡新民
56 “毛选”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吗？阎长贵

往事录

- 58 我和辛亥革命的缘分李锐
63 天台“犁豆事件”始末郑普顺

文荟苑

- 67 《内蒙春光》影片风波朱安平
72 小说《刘志丹》第二次被禁情况补充王晓中

怀人篇

- 76 我的父亲“丁海关”丁耀琳

品书斋

- 79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朱正
83 失落自我 回归自我资中筠

海外事

- 86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考察王铁群
91 日本“买下美国”的教训张焕利

编读窗

- 93 读者来信摘登朱夏生 等

顾问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锐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实	王俊义	冯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方	吴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光
杜导正 (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杨天石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沈志华
杨奎松	杨继绳 (副召集人)		周瑞金
苏双碧	陈敏	邵燕祥	郭道晖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展江
资中筠	钟沛璋	凌云	高尚全
秦晖	袁鹰	袁伟时	萧蔚彬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曾彦修
彭迪	韩钢	董健	
鲁瑄	雷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 (主任)	吴思 (副主任)	杨继绳
李晨	徐庆全	胡竟成
		张晓鸥

社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思

副社长：杨继绳 李晨

副总编辑：徐庆全 执行主编：洪振快

社长助理：胡竟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经理：李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张晓鸥

理事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莊其環 李琼

理事：白建钢

秘书长：吴思

副秘书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索赵律师事務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刊网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68525374

办公室：68522852 (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8.00元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 程 敏 建 军 整理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之女叶向真、叶帅的侄子叶选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华国锋之子苏华、彭真之子傅洋、习仲勋之女习乾平、陆定一之子陆德、王若飞之子王兴、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肖劲光之女肖凯、张爱萍之子张胜、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苏振华的子女苏承军和苏承业、张鼎丞之女张延忠、谭震林之女谭径远和女婿虞大江(江华之子)、耿飚之子耿远志、杨成武之女杨俊生和杨杨、张廷发之子张鹏、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罗青长之子罗援、彭冲之子许海星、严佑民之子严小江、李琪之女李海文、包惠僧之子包楚弓、齐燕铭之女齐翔延、李鑫之子李赤子、贺炳炎之子贺陵生、王诤之子王苏民、程世才之子程力、周希汉之子周泰阳、史进前之子史小刚等。周总理和叶帅等人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8341部队的部分老同志也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孙长江、张天荣、沈宝祥、王贵秀、周为民、蔡霞、马立诚、雷颐、章立凡、王占阳、吴思、梁晓声等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现将座谈会的主要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追忆历史事实,回顾历史功绩

李海文:今天的《南方周末》登了我一篇文章,讲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毛

泽东逝世后,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中央全会要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沈宝祥:为什么要采取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曾对胡耀邦详细讲过。1977年12月17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讲过这件事。我的记录如下:

华主席前几天同我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話。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糟蹋吗!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先从这个問題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肯定,他们也不会成功的。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2011年10月6日，“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遗憾的是，耀邦没有很详细地讲，但从他简要的讲话中，也可了解当事人当时的想法。毛主席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活动的严峻情况，华国锋很忧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粉碎“四人帮”，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不被他们“糟蹋”，是为了党，为了国家和人民。对于个人的命运，他“没多考虑，没多想，置之度外”。

有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所以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个人的地位权力之争。这样一种解读，很不符合实际。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的负责人，在毛主席病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找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就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我们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陆海空三军的领导和指战员那么听话？早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和部署。

叶选基：我写了一篇文章——《叶帅与粉碎“四人帮”》，缅怀那个历史年代。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定决

心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之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密封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

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

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即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就是没有流一滴血，非常果断漂亮地干成了。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屡战屡胜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叶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纪坡民：我说说具体问题吧。我父亲纪登奎当初也是中央的一个领导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我也问过他，零星听到一点。我父亲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上的基本情况有这么几点。

第一，他是拥护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他对粉碎“四人帮”也是知情的，吴德的回忆录里面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爸爸知道。第三，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我父亲参加了一点。主要是公安部，因为公安部那边是归他管。后来华国锋同志当了公安部长，华国锋管公安部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公安部的工作就不管了，归我爸爸管了。因此，粉碎“四人帮”牵扯到公安还有些需要配合的事情，这个事情大概是华国锋通知李先念和我爸爸两个人布置，然后配合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因此我爸爸也参加了。

还需要说明一点，我父亲参加粉碎“四人帮”

的行动,是一些外围的配合性的行动,他没有参加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决策,这个情况也是很清楚的。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又听到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一些历史信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也给大家做点介绍。我听李鑫同志给我讲过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说,9月18号,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完了,当天晚上,张春桥找李鑫谈话,当初李鑫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毛主席的很多著作、讲话、谈话的记录等等,都在他那儿,张春桥找他谈话要某些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李鑫不给他,张春桥就硬要,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凶,不欢而散。李鑫跟我讲,回家了以后,左思右想,越想这个问题越大,越想这个问题越不得了,他说我应该向党中央报告,他所谓的向党中央报告,就是向华国锋同志报告。他还跟我说,他本来是中办的副主任,但是他不敢向8341车队要车,他怕走漏了风声。他就骑了个自行车到华国锋家里,首先汇报了张春桥跟他要毛主席谈话的事情。然后李鑫说,华国锋同志,中央现在要出大事了,要出了不得的大事,中央必须采取断然举措,再不采取断然举措,这个国家,这个党要出大问题了。粉碎“四人帮”的动议,大概就从这儿开始。

赵霄洛:1976年12月初,我父亲赵行志被派到上海工作,根据父辈的回忆和搜集到的资料,我谈谈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的一些工作情况。

向上海派驻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迅速摧毁“四人帮”残余势力的重要部署。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帅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认为,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帅同意华国锋的意见,并提出苏振华同志当此重任。最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派三位同志去接管上海。同时叶帅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一意见成为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方针。彭冲同志回忆说,在这个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叶帅虽已79岁高龄,仍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10月底,中央工作小组的同志陆续到达上海,开始了复杂的接管工作,工作组最多时有226人,被“四人帮”排挤出领导班子的韩真义、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出来担任市委领导。1977年3月,苏振华发言说,五个月来,上海接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充分肯定了工作的成就,中央工作组在新的市委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把持的党政大权,顺利地进行了揭批斗争,既搞清了事实,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开始发展的新篇章。

1979年1月,苏振华同志调离上海,彭冲同志任第一书记。遗憾的是,对于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这一段工作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1980年之后,在上海逐渐传出,上海清查工作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上海已经丧失了时机,上海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一万多人,但真正凶手没有抓到几个,有的说,上海复查工作起步慢,进展缓慢,有些单位存在着该平反的没有平反,有些平反结论仍不恰当的情况。总之,最后把派驻上海工作归结成三个不足。希望做党史研究的同志,也能对这段历史做一些研究。

二、阐释历史意义,再论历史分期

叶选基: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的再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结构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这首先应当归功于粉碎“四人帮”带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胡德平: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了大无畏的抉择,为人民共和国立下大功。否则,中国的前途是不是昨日的柬埔寨呢?让人不寒而栗。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会场

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事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沈宝祥 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是大家公认的,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对此,看法就不完全相同了。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既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标志,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

但是,对这个问题也有另一种观点。《求是》杂志1995年第4期有一篇文章,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文章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应当放在前一时期。作者将这两年 and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合在一起,称为“‘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按照这样的分期,粉碎“四人帮”就只是前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件事,意义和作用就大大降低了。为了突出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就淡化、贬低另一些历史事件、另一些历史人物,尽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论著中

司空见惯,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王贵秀:我们一贯总结,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它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从全面专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党的十一大,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都是粉碎“四人帮”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划成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开始,不应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开创的意义,为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奠定了基础。

纪坡民 粉碎“四人帮”,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军队的缔造者,他的地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如果他做事情做错了,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可以批评,也是可以纠正的。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毛主席的错误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那么,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他的错误也都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我觉得这对解放思想的意义也许更加重大。

苏承业 我记得,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民那种欢欣鼓舞、发自内心的快乐,真不是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人操纵的,完全是人民自发的。为什么呢?这个伟大的举措,完全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三、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还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沈宝祥 怎样看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除了上面讲的认为是“‘文

革’结束的两年”以外,还有两个提法。一个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还有一个是:“扭转乾坤的两年”,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提法。我觉得,后一个提法比较合乎这两年的实际。

这两年,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工作进展相当快,成绩很大。这期间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1977年12月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加速了冤假错案的平反,等等,就更不好说这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了。

这里要讲一下华国锋。他的思想体系是“两个凡是”,但他这个人比较务实,也比较谦虚,比较宽厚,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他力图从新的实际出发,解决一些问题。他对《理论动态》1977年年终的一篇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提出的“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的提法,很赞赏。12月30日晚上,他拿了这一期《理论动态》,对《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同志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习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华国锋与其他一些同志不太一样,对“两个凡是”不是那么固守的。

王贵秀:这两年的工作叫徘徊中前进是不对的,是自相矛盾的。更主要的,它跟基本事实不相符合。十一大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又对“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两个凡是”的问题,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不能转得太快。如果把这两年叫做徘徊,我们反过来讲,不徘徊还要怎么发展?我认为这两年是突飞猛进的两年,不是徘徊的两年。

四、反思文革根源,改善党的领导

叶选基:我们党历经了十年的“左”的文化大革命。“左”的东西和“左”的思想,给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曾经带来一场劫难,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了党的领导,形成全国内战,这种无政府主义,

带来了国家和民族的劫难。

今天的国家,我个人认为,还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完善党的领导,完善我们党内的民主和集体领导。同时,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构建具有各阶层民主代表一起决策的机制,继续推进我们国家深化改革开放。

叶向真:我看了三中全会上所有的发言,对叶帅的发言反复看过好多次。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长期以来,我们党没有认真执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发生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办法阻止。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哪里还有党内讨论?没有了。一个政党,如果想生存和做得好,必须恢复民主集中制。另外,他也提出来,除了要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要完善法治。

我们经济上发展得这么快,人们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比过去强得多的生活。但是反过来看,我们现在是短腿,经济和上层建筑应该相应地发展,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缺失了很多。温家宝总理说我们道德滑坡。这个问题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

我们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我们一直在反对封建专制,这是一定要反的。文化大革命跟这样的思想基础、这样一种体制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

陆德:我们之所以有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问题,这些根源,我们现在是否都克服了?

反思一下,我们党内当时如果能够强调民主集中制,如果不是毛泽东永远正确这样一个观点在头上笼罩着,文化大革命可能不至于发生。家长制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这些我们要克服。现在我们是不是克服了呢?我认为不尽然。我们党内还有很严重的封建残余,有些还愈演愈烈。

理想、信念、价值观,这些支柱在哪里?民主集中制又在哪里?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严重。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

5.0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

政治经济学里有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势必要推动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要跟它配套，要互相促进。我们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我没有看到政治体制上有什么变化。

马晓力：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是全党比较清醒的时候。那时候李维汉就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是第一位的，就在我旁边敲着拐杖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太重了。可不就这样吗？

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问毛主席周期律问题的时候，他多清醒！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解决了没有？没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阵子特别高兴，那时候最该清醒地认识这个党向何处去、这个党要解决什么问题。但那时候过于重视经济问题，把政治问题忽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还没解决呢。耀邦同志其实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他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问题了，不能说这个党没有自净能力，人们都期待着党内有一股正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一下。

这个党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周期律问题呢？我们能不能避免这条路？可能我们有点着急，我们不愿意让这个国家乱，我们最害怕乱了，就因为不愿意让它乱，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我们的幸福长远一些，我们就要有一个好的机制。

马立诚：文革是不是民主运动呢？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你必须按照最高权威的意向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最高权威所不喜欢的，你才能够质疑他、批判他，比如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等。张志新给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割喉处死。这种追随专制权威指挥棒的运动，不能称民主，更不能称大民主。

五、以民主和法治解决当前问题

胡德平：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存在着矛盾。虽然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但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是完全和谐的，阴暗面也是非常多的，矛盾积

累得很多。怎么解决这种矛盾？毛泽东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和文革之前也有类似之处，矛盾也是有的，冲突也是有的，不和谐也是有的。有的人呼吁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我觉得不能再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了。我希望中央更主动地推进我们的民主法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再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更主动地用民主法治、政治体制改革，在宪法的神圣轨道上解决我们的矛盾。只有这样，我们三十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苏承业：我一直在基层，我感到现在群众是有一些想法，比方说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腐败现象，或者是有一些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现在有这些问题。如何看这个问题？从粉碎“四人帮”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党可以通过不断地清除自己的腐败分子，不断地清洗自己的肌体，在人民的监督下，不断地向前走。我们的这些问题，就跟粉碎“四人帮”一样，我觉得一定还是人民的胜利。

马立诚：今年9月9日，全国20个省，在毛泽东忌日这一天，在“乌有之乡”等“左派”的鼓动下，举行了人数不等的一些活动，悼念毛泽东。有的省人数比较多，像太原等等。这些地方有的就喊起了口号，叫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这是文革标志性的口号，现在高声呼喊打倒走资派，那一定是要再来一场文革。

在庆祝人民胜利的同时，我们要思索一下当前中国面临的这种极为严峻的局面。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主张，和当前社会中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可能会酝酿再一次动乱。

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只有走宪政的路，发展民主和法治，才是解决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不是说那么急迫地要求党立刻怎么样，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共识，就是民主和宪政。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拿出一条民主的道路，要有权力制约，让老百姓的呼声有传达的渠道，而且能够解决问题的渠道。真正防止文革重演的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合乎法制的、合乎民主的、合乎世界各种文明规范的制度。这是中国大跨步地前进，同时彻底摆脱文革阴影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出席人员合影

吴思 现在,有一种越来越强的呼声,用文革的方式解决当前矛盾。细分起来,至少有三个文革。第一是经济方面的文革,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搞经济,最终指向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大食堂。第二是侵犯公民权利的文革,只有毛泽东的权力无限扩张,其他人只能表忠心,狠斗私字一闪念,轮流挨整,文斗加武斗,甚至出现半无政府状态。第三是奉旨造反的文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用揪斗走资派的方式,替毛泽东监督官员,解决官民矛盾。

这三个文革相互关联,相互支持。毛泽东为什么不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官民矛盾,同时解决黄炎培所说的周期律问题?如果真实行民主了,第一和第二个文革就无法存在。农民不要人民公社,毛泽东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前两个文革,我看现在也没多大市场,但很多民众怀念第三个文革。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受欺负,又找不到更好的制约权力的办法。反过来说,如果民主法治建立健全了,怨气有了合理合法的出口,官民矛盾有了妥当的解决办法,第三个文革就没有市场了。防止文革重演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法治。

改革开放后,毛泽东不搞民主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在经济方面,比如大包干,民营企业发展,农民工自由流动,这些东西不会被民众投票所推

翻,恰恰相反,会得到更好的保证。所以说,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官民矛盾,在毛泽东时代是办不到的,现在是可能办到的。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还就相关党史及理论热点问题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座谈会后,主办方还邀请了执行抓捕“四人帮”命令的8341部队的部分老同志和与会者见面并合影留念,随后在举行晚宴时播放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欢庆游行的盛况,丰富的音像资料用事实证明了粉碎“四人帮”是全党的胜利和人民的胜利。■

(责任编辑 吴 思)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希望工程是否存在“黑幕”的辩论

○ 郭宇宽

“希望工程黑幕”风波

“希望工程”是一个旨在救助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的慈善事业,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它是1989年由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的徐永光发起和创建的,徐永光1986~1988年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2006年5月26日,徐永光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说:“希望工程17年,接受社会捐款超过30亿人民币,救助农村失学儿童289万名,他们中有的继续受到资助上了中学、大学;最新统计捐建希望小学12559所。希望工程对于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确,“希望工程”的功绩是会被历史记住的。

希望工程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徐永光的运作能力。希望工程给徐永光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但在2002年,也把他卷进了一场“希望工程黑幕”的风波,使其个人声誉一落千丈,并引发了人们对希望工程的信任危机。

“黑幕”是由《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揭发的。他在2002年12月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和思考》的文章。文中透露,在此之前他写成《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一文,准备在2002年3月21日用4个版的篇幅在《南方周末》刊登,直指徐永光个人一意孤行,利用善款做违规投资,还把善款转到个人名下炒股,并有中饱私囊的嫌疑。方进玉的揭发主要来自于“希望工程”内部财务人员柳杨。而就在报纸即将上街的前一天(20日)的晚上,报社忽然接



到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南方周末》因此撤下了已经付印的版面,蒙受重大的损失。

方进玉是一位非常有职业声望的记者,有良好的职业形象,而且毫无疑问是一个正派的人,《南方周末》又是在当时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媒体,报道被封杀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方进玉的指控是真实的。再加上柳杨后来又不幸得癌症去世,几件事凑在一起,给社会的印象好像是,徐永光此人简直“罪恶滔天”。不过,徐永光否认《南方周末》那次被撤稿封杀与他有关,对方进玉的“指控”也拒不接受。对于徐永光到底有没有“挪用善款违规投资”,方、徐二人各执一词,这就使“希望工程黑幕”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遗案,即使将近十年过去了,人们仍然未能完全了解其中的真相。

我和徐永光、方进玉的交往

在当了记者以后,特别是自从2003年开始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之后,我参加了一些公益界的活动。我观察到,在公益圈子里,徐永光非常受尊重和认可,这与他在“希望工程黑幕”风波中的形象完全不相符。这让我产生了好奇。

在一次会议中间茶歇的时候,我过去跟徐永光打招呼。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很坦然地收下了。我说我好像看过一些关于您的报道,对您有很大争议啊。他说对啊,对我的争议多了去了。我说您能不能找个时间跟我交流一下,咱把这事儿谈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迟疑地说,没问题啊,你跟我约吧。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他手机号。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如果确实像因那次报道而提前退休下岗的方进玉之所说：“人们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揭发徐永光这样的‘光环人物’，必定要冒生命危险”，那徐永光又为什么会非常大方地表示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呢？

我向《南风窗》编辑部讲了这件事，并向很多学术界、媒体界的朋友征询意见。大家的反应都是“别沾这事儿”。一种态度是，这事儿永远都搞不清楚，以后也别讲了。讲这话的人甚至是北京某大学专门研究公益组织的教授。另一种态度是让我别趟这浑水。这种态度隐含着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的背景很强。他们是出于对我的爱护，让我别碰这事儿。第二种意思是他们的手段比较厉害，如果你要做这个调查，徐永光可能要拉你下水。你作为一个年轻记者，碰到这种事儿说不定会抗拒不了诱惑，被腐蚀掉。这更激起我的好奇，徐永光真有这么“邪恶”吗？

如果继续调查下去，可能的结果会有两种。一种结果是我采访过后发现他确实有问题，但因为他有背景，我批评他的文章发不出来，而一旦发表出来，我就会得到像方进玉一样的下场。第二种结果是我调查完后发现徐永光和希望工程没问题，但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既然媒体界同仁都是这样一个态度，我又去搜索了一下网上的言论，基本是一边倒地在骂徐永光和希望工程。我就想知道大家都在骂这个人，而这个人又表现得这么坦荡，那到底他是真的有问题呢，还是社会对他有误解。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哪怕一个人是大坏蛋，十恶不赦，社会最起码要给他一个完完整整地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否则就太残酷了，甚至在我看来是最残酷的事。”

于是我和徐永光约了一个时间见面。关于约在什么地方，徐永光表现得很随意，说“我家旁边就有一个茶馆，我们在那里见个面，好好谈一谈”。而且当他从他家走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所住的那个小区在北京属于比较中档的小区，并不是豪华别墅。这与别人对他的描述不太一样。如果他真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在希望工程一开始就贪污得很厉害，那他应该非常有钱，不至于过这种普通的中产阶级生活。

采访还未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会交代不能录音或谈话不能发表之类的事情。但在采访开始

之后，徐永光从头到尾都没表示说什么问题不能问，不能讲。他的回答也让我感觉是诚恳的，没有闪烁其词。特别是我注意到徐永光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可以和你对视的。我们记者做采访多了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的神色表情其实是很难掩饰其内心活动的。所以我做电视记者和主持人在采访时无论如何都要拍到采访对象正面的面部特写，甚至包括他无意识时的小动作。在一个人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问他问题，他的第一反应以及眼神、表情，最能反映他心里有没有鬼。一定程度上讲，面对面的采访是有测谎功能的。我问了徐永光很多问题，包括所谓有的投资血本无归的事，他都回答得很坦荡。所有问题他都认真地作了解释。

有时候一个客观的事情，看的角度不一样，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比如说对徐争议最大的一件事是他将希望工程的资金投资给他的一个浙江老乡，最后没有收回来。徐永光是温州人，大家知道温州人做生意很厉害，他们的圈子也都是以商业为主要目的的群体。有人怀疑徐永光把善款投给老乡做生意，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他的回答很坦荡，他说第一，那人是宁波人，我是温州人，两个地方差得远了，在温州人的概念里根本不能算老乡，而且我过去跟他也不熟悉；第二，作为投资者，如果我当时觉得这个项目很好，我就投给他，这是出于公心。后来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法律程序跟他打官司，以尽量减少投资的损失。如果我贪污受贿，心里有鬼，我怎么可能理直气壮地跟他打官司，告他去呢？这个解释在我看来，至少是讲得通的，可以自圆其说的。与此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而有意思的是，徐永光在跟我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每一个问题都能回应，而在当时的公共媒体上，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报道是关于徐永光如何完整地为自己辩解的。这相当于媒体对徐永光进行了一次缺席审判。这就是问题所在。做新闻报道，最讲究的是要有平衡的信息来源，所以我问他方进玉有没有采访过你。徐永光显得非常委屈，说方进玉只是听信了易晓和柳杨的一面之词，从来没给我任何一个辩解的机会。

我又联系方进玉。他对此事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还是认为徐永光就是贪污分子。我问为何当



“大眼睛小女孩”照片：希望工程宣传照，1991年
《中国青年报》记者解海龙拍摄

时没有采访徐永光，他说他派了另一个记者去采访。我又联系他所讲的那个记者有没有去采访徐永光，那个记者说没有。我就没有继续追究下去，也许是中间存在误会，但即使没有这个误会，相对来说我也能理解方进玉的选择。因为在中国新闻界，新闻审查制度和行政权力干涉是一股很大的干扰力量。我们做记者最担心的就是当你为了某件事，费了很大的精力采访，终于把它搞清楚了以后，稿子却不能发表。为什么呢？因为在采访完甲方，再采访乙方的时候，这一方就去公关，找你上面的领导或领导的领导，使得稿子发不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中国的新闻报道不能完全适应西方新闻理念所讲的对等采访的原则。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这样就会导致一些新闻报道不够客观中立。

所以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包括我在中央电视台做出镜记者的时候，为了既保证新闻的信息平衡，又避免片子被“公关”，最后播不出来，一般都不敢一开始就去接触负面的采访对象。往往是在这个片子的制作过程中先掌握负面新闻的充分证据，在最后临近播出之前再去接触政府官员或被揭发的负面对象。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方没有充分的时间做公关，以使得报道能顺利地发出来，但又给他一个充分的解释机会，当然，如果他自己放弃就另说了。在方进玉准备报道“希望工程黑幕”的时候，徐永光是团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在

大家看来是有深厚政治资源和背景的人，所以我更加可以理解方进玉在当时会有这种担心，害怕如果采访了徐永光，这篇报道就不能顺利发表。所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为什么到后来一直也都没有其他媒体去采访徐永光从而给他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呢？我觉得除了客观原因外，有些记者缺乏求真的精神，也是原因之一。而我自己的性格中有一种热情，我觉得一件事一定要真正地刨根问底地搞清楚，否则就对不住自己，没法交代。于是我就作了这样一个报道，当时全文发表在《南风窗》上。很多媒体人看过我的文章之后都觉得我的文章写得比较客观中立。徐永光和方进玉两方面都表示他们对这篇文章并不喜欢但是可以接受。

在2005年，我曾经问徐永光想不想和方进玉见面，做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他的第一反应是很警惕，不情愿，并说方进玉是无良记者，不够客观中立，而且怀疑他是被别人指使来丑化、抹黑他。然后他又想想说其实见面也可以，但条件是这个见面会必须由你来组织，并做主持人，而且有其他人旁观，这样才可以，否则方进玉又要断章取义来污蔑我。于是我又联系方进玉，说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徐永光表示愿意见你，你愿不愿意意见他。方进玉说不想见。我问为什么？他说就是不想见，因为这人非常坏。我向他解释至少从我跟徐永光的接触来看，没感觉出他是吃人的老虎。但方进玉仍是不愿意。

在采访过程中，我觉得无论是方进玉还是徐永光，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方进玉是我在新闻界的前辈，他的这种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职业使命感使我产生对他的亲近感和尊重感。而对徐永光，至少我非常欣赏他那种坦荡、自信的性格。在以往的采访中，很多人都处在一种猥琐的、不敢与你对视的、心里有鬼的状态，而他是一个坦荡的人，并且对自己的道德有自信。中国号称做慈善的人太多了，但到底干了什么没人知道。而我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许多希望工程援建的货真价实的学校，这说明希望工程是用真金白银干了一些有公德的事情，这也令我很是尊敬。我想既然两个都是我敬重的人，他们应该不会有原则上的大分歧。但他们之间仇怨这么深，那就说明两人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所以我才想创造一个

机会,让他们能够面对面地澄清误会,而方进玉不接受。

此后我还做了一次努力,我给江艺平老师打电话,请她出面。江老师是《南方周末》前主编,也是方进玉非常信任的人。而且江老师对我也非常信任。我跟江老师说,以我对方进玉和徐永光的了解,他们之间一定存在误会。目前徐永光愿意见面,澄清误会,但方进玉还是不答应,能不能请您出面,做一个中间人,我们哪怕以吃一顿饭的形式,来把事情摊开讲清楚。江老师非常热心,说没问题,我来跟老方联系。过了一段时间,江老师说我跟老方讲过了,但他非常固执,就是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这样这个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不过我在2005年《南风窗》上的那篇《“青基会事件”的教训和收获》文章中,特别提到“笔者甚至想到,方进玉和徐永光也许会有坐在一起澄清误会,感叹‘不打不相识’的一天”。

就在2005年,在舆论风浪中的徐永光淡出青基会调到中华慈善总会做副会长,11个月后辞职,转投民间公益,到了南都基金会。

一次“流产”的公共辩论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提这件事,但对他俩的关注却一直没有中断过。每次见到《南方周末》的人,我还常问,方进玉最近怎么样啊?他们说我们也不太了解他在干什么。而徐永光在北京的公益圈里非常活跃,恰好我后来也参与了很多公益事业,于是跟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特别是在打工子弟问题上。我在2007年左右开始关注北京的打工子弟政策,几乎同时徐永光创办了南都公益基金会,重点服务于打工子弟。更多的接触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尊重并且可以作为兄长和朋友的人。据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刘洲鸿跟我说,回过头来看以前的文章,我写的《“青基会事件”的教训和收获》算是最全面客观的。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完全站在徐永光的立场上,而且也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但的确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所以后来只要网上有人问徐永光不是坏人吗,怎么做你们基金会的秘书长啊?基金会的人就把我的文章拿去给他们看,觉得这样有说服力。

方进玉对徐永光的报道,是中国媒体第一次

非常系统深入地揭发公益组织内的黑幕,也是里程碑式的报道,而方进玉和徐永光无疑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并且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公众记忆,他们的事不断地被人提起。而在今年,又出了“郭美美事件”,大家就又把他俩的事情一遍遍地旧事重提。在这个过程中,徐永光觉得受了很大委屈。

今年8月底,一个机会又让我再次牵起了他俩的线。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律师浦志强,在网上抨击徐永光,大意说这家伙早该法办,但至今仍逍遥法外。在我看来社会对徐永光有很多偏见,而且有的偏见要澄清是非常困难的。有的人骂徐永光,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一样跟他有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但我已经把文章写得很清楚了,如果看了我的文章还是对徐永光有片面的认识,那恐怕就有问题了。所以我就在微博上开玩笑似的回了浦志强一个帖子说,如果要审判的话,就让他俩公开对话,让你这个律师作为公诉人代表来审判徐永光,让大家旁观。我本来是想调侃浦志强,结果他在网上跟我争了起来,导致很多网友围观。网友们有的说我有理,有的说他有理,莫衷一是。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能把事情摆上台面讲明白的机会。当年的纽伦堡审判,哪怕是对十恶不赦的战犯,都要给他们请优秀的律师,让他们能充分为自己辩解。哪怕是再坏的人,也要给个机会,让他把道理讲出来,在充分表达后再让陪审团裁定他是否有罪。而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这样的意识。我觉得这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也不理性,甚至是低估了整个社会的判断力和理性。大家不要以为撒谎是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以我做记者的经验来看,当一个人在面对质询和追问,而且特别是在被摄像机的镜头对准的时候,撒谎不被人识破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坚持认为大家不应该在网上不给人辩解的机会,好像网上有一万人骂徐永光一个人,他就一定是坏人了,让徐永光百口莫辩。骂徐永光的人应该认真列举出对他到底有哪些质疑,他到底有什么罪?同时也应该允许徐永光公开辩解。最后让“陪审团”裁定。陪审团可以是全部网民或是公众。

我在网上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后,有一天,微博上突然有一个人关注了我,这个人的ID就叫

“退休的方进玉”，还跟我打招呼说，你好啊。我当时很惊奇，就赶快回复说是不是方老哥，他说就是。我知道他肯定是看了我和浦志强的争论，就趁热打铁说，现在和徐永光做一次正式的对质好不好？方进玉就问我你为什么老撺掇我和徐永光交流？我坦诚地说，不管您同意不同意，我确实觉得徐永光不是坏人，我觉得你们之间存在误会，既然你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搞清楚这件事，应该见一见。结果方进玉就答复说我没问题，就怕徐永光不敢。这个态度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就向徐永光转达了这个消息，徐永光说我也愿意交流交流，态度很积极。

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我本来的意思是做一个私下的交流，比如我约两位老兄一起吃个饭，不需要很多人旁观，只是几个当事人澄清误会。结果徐永光同意见面这件事让方进玉觉得挺出乎意料，就又补充说见面可以，但是我必须带几个记者旁观，并全程录像，以后准备公布，否则徐永光会曲解我的意思。我又将这番话转给徐永光，他又受到了刺激，说，方进玉叫记者，没问题，但我也要叫记者，不然这就成了一边倒，我干脆要求全程公开，网络直播，以免断章取义。

就这样，我无意中成了这场带有激将法色彩的公开辩论的发起人。于是我就把这个消息在微博上透露出来了。方进玉和徐永光决定面对面对话，公开辩论，欢迎围观。这个事情马上就轰动了，大家就像要观看武士决斗一样，全兴奋了起来。不想这又出乎方进玉的意料，说这搞得也太大了。我说老哥这不能怪我啊，是你要求带记者，才把徐永光逼急了，要求干脆公开，你要这时候退，也没理由啊。他说好吧，那我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我要精心准备。据我所知，无论是方进玉还是徐永光对这场辩论都是志在必得的，都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甚至发言稿都反复推敲润色。

活动的整个准备过程相当艰辛，包括都有哪些人参加，谁来做陪审团，等等。尤其是对于场地安排，中间改了七八次，找到让双方都满意的场地非常不容易。我曾经跟一个大学联系，但对方说这样的事儿一是不大好，二是不宜高调，所以拒绝提供场地。还有人说愿意提供场地，但会议室只能容纳二十人，而双方约的记者就已达三四十人，所以不合适。我还曾经一度联系到《南方

周末》，他们愿意提供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的会议室。可方进玉又提出说，这样显得徐永光是客场作战，不行，即使在团中央辩论都行，他就是不想占主场优势。我费了很大的工夫，终于将场地选定在东城区图书馆，不仅地方显得中立，而且适合讨论。

关于辩论的规则也讨论了很久。方进玉说讨论时必须由他来进行质询，可以有人旁观，但不能打断他说话；只能他提问题，徐永光回答，而且徐永光每次发言不能超过十分钟，若超过时间或跑题他来打断徐。我说这样不符合公平辩论的规则。辩论应该是双方平等发言，由主持人掌握时间，这样比较公平。方进玉也就接受了。徐永光又说凭什么光方进玉来质问我？我还要质问他呢，你也要给我质问他机会。我想既然这样，那就采用林肯—道格拉斯赛制。该赛制脱胎于1858年夏天，当时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竞选，候选民主党籍的现任参议员史蒂文·道格拉斯和他的竞争对手共和党籍的亚伯拉罕·林肯之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主要特点是保证双方都完整充分的陈述，这样双方能对等地把问题讨论清楚，最后由公众决定谁有道理。规则就这么决定了。

然而就在辩论开始的前些天，方进玉突然发信息给我说，不行，你对徐永光有偏向，不适合担任主持人。我说老哥啊，我怎么有偏向了？他说你在我面前坚持说他是好人，所以由浦志强担任主持人比较合适。但徐永光对浦志强做主持也不会答应啊，浦志强一开始就说要法办他，不是更不客观吗？我已经邀请浦志强和你一起来质询徐永光了，他怎么能又同时当主持呢？只有我担任主持人才行。我就向方进玉解释说，方老哥，我在你面前说徐永光不是坏人你就说我不客观，但是我在徐永光面前我也说你不是坏人，不信你问他，那这是不是也算不客观呢？最后他说行吧，我多虑了，还是你主持吧。这才算最终确定下来。

结果最后，在活动开始前两天，从某方面传来消息，要求取消活动，没说这个活动有什么错，就是说这个活动在这个时机搞不好。考虑到给各方面带来的不便和风险，这次活动就这样非常遗憾地被取消了。

本来，所谓“希望工程黑幕”这件事，把它公开地谈清楚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样一个公开的辩

论,不仅能让大家明辨是非,也可以让整个中国公益界认清楚这个行业的道德边界在哪里。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呢?徐永光说他也很难过。方进玉也觉得很遗憾,因为他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的。不过徐永光说,也许这个时机还不成熟,他还是希望以后能有一次和方进玉哪怕范围小一些的面对面交流。方进玉通过这次打交道,我察觉到他对徐永光的态度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原来他提到徐永光都很不客气,这次他也跟我说“老徐”如何如何,这也传达了一些善意。这更印证了我的信念,如果大家胸怀足够坦荡,都把问题摊到桌面上,即使针锋相对,也能够通向更多的理解和共识。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香港中文大学陈建民教授对此事有一个点评,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精当的点评。他说:“有些人害怕的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的真相,而是我们这样一种追求真相的方式。”有了这种真正符合公民社会和现代法治理念的方式以后,大家再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就都可以当面对质,并直接向公众发布,同时在网络上直播。这种方式是有些人受不了的。这也是我

在这件事上最大的遗憾。但我觉得,迟早中国会走到这么一天,会接受这种方式,并且觉得这是探讨真相最好的方式之一。

无论如何,这次流产的公共辩论是中国公益行业,乃至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一次重要事件,中国政治传统中有太多的台下交易,暗箱操作,当面一团和气,背后各下毒手。这种不健康的氛围也毒化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像鲁迅这样的文化人,从来没有一次和他的争论对手面对面地坦诚交流,隔空喊话的攻击却非常阴损。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更近一步,有些网络意见领袖还爱裹挟一大批粉丝,施展话语暴力,占据道德制高点,不给对手辩解的机会。这些习气都在毒害年轻人的心灵。所以我有一条座右铭:“若辩解不自由,则批判无意义”。

这次难得这样众缘和合,二位有行业地位的人物,愿意以光明磊落的方式面对面澄清是非,这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也许都是第一次。能走到这一步,在我看来,方、徐二位都是胜利者。■

(作者为清华大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 洪振快)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监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

成为战俘之后

○ 蒋庆泉 口述 寇德印 整理

我的名字叫蒋庆泉，是一名老兵，有人说我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原型，因为我在战斗中也喊出过“向我开炮”，但我不认为我自己就是“王成”，“王成”是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的杰出代表，而我只是这些战士中的一份子。

一、弹尽粮绝，我喊了“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向我开炮”这句话的确是我喊出来的，当时是在1953年，那时候板门店正在谈判，为了配合谈判，上级命令我们部队积极对敌进攻，以争取谈判上的主动权。

1953年4月16日，我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二营五连接到命令，夜袭美七师的阵地——石岘洞北山。

进攻是在晚八点开始的，营长带领五连率先攻上山顶，但是由于敌人炮击猛烈，原本一百多人的队伍在占领阵地之后，只剩下十几个还有战斗力的士兵了。这十几个人，退守在一处暗堡内。

当时，我在二营任步行机员。营长看到五连的步行机员已经牺牲，便把我留在了阵地上，让我负责五连与指挥部的联络；营长还命令，一定要坚守阵地，等待四连或者六连上来换防以后，才能撤下。

谁成想敌人的炮火太过猛烈，四连只上来三个人，六连一直也没能攻上阵地来，我们守在山头的这十几个人最后坚持了两天两夜，始终没能撤下去。

在这两天两夜里，我们无粮、无水，许多战士

口渴难耐，最后都喝起尿来。由于大部分枪支被土埋过，很多都打不响，我们最后弹尽粮绝。但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坚守阵地，没有一个人投降。

在这两天中，我们是怎样守住阵地的呢？这就全靠我的步话机了。我通过步话机向总部调炮，我方炮兵再根据我所汇报的坐标，向敌人实施炮击，就这样，我们粉碎了敌人一波又一波进攻。

4月18日早晨，敌人再次冲上来，这次足有几百人，我又立刻调炮攻击了，但是大炮不知怎么了，都打在前后左右，敌人进攻的势头一点都没有被削弱，他们渐渐对我们的阵地形成了合围。

就在这危急时刻，我方的炮击突然停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没炮弹了，所以才停止炮击。当时我就在阵地上一直呼叫：“要炮啊，要炮啊，炮、炮、炮……”但大炮一直也没能打过来。

敌人突击队攻上来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40米，30米……我就在那里一直喊开炮，最后情急之下，我干脆喊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没能守住阵地，请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向我开炮！”

大炮终于打过来，但是很遗憾，这一炮不是我方部队打的，而是美军开的炮。我看得很真切，炮弹从地堡窗口处打进来，蓝光一闪，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打在后背上，我哼哧一下摔倒在地。紧接着，美国人又扔进地堡里一个东西，类似手榴弹，冒着白烟，我当时被呛得一个劲地咳嗽，很快便没了知觉。



《英雄儿女》电影海报

二、战场没死成，却遭了活罪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后背和大腿一阵阵发疼。我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几个美国大兵正在扯着我的大腿向前拉，他们见我没死，就把我抬到一个空场上。这个空场还有几个俘虏，是我的战友，当时我想反抗，可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动不了。

我被抬上一辆卡车，这个卡车车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装着美国士兵的尸体，下层装着我们这些战俘。我躺在车厢底层，一动不能动，上层死尸身上还在不断地往下滴血，都溅在了我的脸上。

美国人把我们拉到一个陌生地点，这是一处大帐篷，我看到在这个帐篷前面，蹲着一群志愿军战俘，总数能有几百人。我被抬进帐篷里，美国翻译问了我姓名、年龄、家庭住址、部队番号等等。我当时思想斗争很厉害，开始什么也不肯承认，但是敌人威逼利诱，还动手打人，为了脱开当时之苦，我挑简单的，承认了一些。

我给自己编了一个假名，叫蒋东阁，我承认了自己是通讯兵，但是敌人问我都给首长传过什么信，我啥也没说。敌人问我部队番号，当时我本不想暴露，但是在我前面审讯的一位小战士已经把部队番号给说了，我就没有隐瞒，结果把23军67师201团二营五连的番号又报了一遍。

敌人问我志愿军部队都使用什么武器，我回答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挺小机关枪，敌人

又问我们部队伙食和饮水情况，我搪塞他们说，在部队里我们都吃大米白面猪牛羊肉，喝的是井水，敌人又问我到战场上来，走的是哪条路，我的回答是“大路小路”。

总之，我就是在糊弄敌人，面对敌人的审讯，我从未屈服。但就是这些回答，在我回国以后，在辽宁昌图审讯的时候，上

级还是给我定了罪，上级说我暴露了军至连的番号、部队的饮食和武器情况。

我们这些战俘在这个大帐篷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敌人把我们全部押上一列火车，直接拉走了。

列车里全是志愿军战俘。他们没有受伤，就列队站在车厢内，我受伤较重，躺在车门口。在我不远处站着几个美国大兵，手里都握着枪。

不大一会儿，美国人开始为我们战俘发糖。糖是那种用竹签穿着的五色软糖，每个战俘都得到一串，可就是没有给我。大家正吃着糖，突然有人说话，他说美国人对战俘多好啊，还给糖吃，他要大家不要丧良心，要配合美国人。我当时就发火了，大骂那个叛徒。在我身旁有一位难友，他踢了我担架几脚，示意我不要吵。美国兵冲上来，寻找闹事者，由于我当时已经不喊了，所以美国人没有发现我，就这样，我躲过了一劫。

三、美国人有恶人，也有好人

下了火车之后，美国人命令两个没有受伤的战俘把我抬起来，直接把我押到一个陌生地点，就地审讯。

美国翻译问过我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之后，又问我部队番号了，我给他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的第一名老战士，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军。”

听到我这样回答，翻译踢翻了凳子，他把我按住，要对我进行殴打，结果被美国军官拉开。翻

译最后又问我：“仗今后可能不打了，停战后你会去哪？”

这位翻译为我指了两条出路，一是去台湾，二是回大陆。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回大陆！”这位翻译说我选择了一条死路，我对他说：“就是死我也要回家。”

就在我和美国翻译斗争的时候，从旁边冲上来一些中国人，看样子他们都是战俘，但他们手中却都握着手腕粗的大棒。这些冲上来的人对我大喊：“你想要回家，我们先送你回老家。”

美国大兵用枪把冲上来的这些人轰散，然后把们这些新来的战俘归拢在一起，就在大太阳底下晒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美国兵把我们这些战俘分批带走。我被抬上一辆吉普车，他们把我拉到了“大韩民国陆军医院”，地点在汉城（今首尔市）。

到达医院后，护士立刻为我清洗伤口，然后为我缝合、涂药、包扎、打针等等，治疗得十分精心。我换上崭新的住院服，然后被安置在一间病房里。

与我相邻病床的两位难友都是志愿军。他们身上都有伤，我左侧的这位难友肚皮被炮弹击穿，肠子裸露在外一小截；右侧的那位难友一条腿被截断了一节。

这里的医生对病人照顾得都很好，他们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之间都会来给我们换药。这里的伙食也很不错，一日两餐，早餐是一杯牛奶、两片面包，晚餐是西餐。他们在一个方形的钢盘里放了四样菜，有蔬菜、鱿鱼、火腿肠、卤肉、鸡蛋、牛肉罐头之类，每日轮换，有时候还有雪糕和果汁。

有一天，医生又准时来给我换药，还为我打了一针，然后为另外一位难友处理伤口。我趴在床上，歪脖盯着医生，看他如何处置那位断肠难友的伤口。

那位医生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揭开难友肚皮上的纱布。我看见难友裸露的肠子在冒泡，喷出来的东西是黄色的粪汤。这时候，病房内许多难友都用手捂住了自己鼻子，然后把头扭过去，我也忍不住，憋了一憋气。那位医生和护士却没有扭头，也没有捂鼻子，看不出有丝毫厌恶的反应。医生用镊子夹住一块棉花，一遍一遍擦拭，直到

清理干净后才离开。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大夫的模样，谢谢，美国人有恶人，但是同样也有好人。

四、把胳膊砍了，随你们去刺字

在医院里住着，我分不清时间，也不知道在这里住了多久。有一天一个翻译来到我床前，他问我在部队里是干什么的，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我回答他说，我在部队里是当兵的，负责站岗放哨。

这位翻译不相信我的话，因为他看见我手上没有老茧，并且我还留着长头发，没有留平头，他一直都以为我是当官的。其实我没有老茧是因为我是通讯员，不拿枪，不挖战壕，而留长发的原因是我头上生过疮，怕风，一见风就痒得要命。

这位翻译为我指了三条路，第一去日本，第二去台湾，第三回大陆，他还明确地告诉我：“回大陆是死路。”

我不能去日本，因为我知道，美国人把志愿军战俘送去日本的目的是学习怎样当特务。我听说曾经有一位战俘，好像是姓杨，他被送往日本学习特务完毕之后，美国人用飞机把他投到我军后方，在这位战士跳伞离开飞机的时候，他拉响了一枚手榴弹，扔进飞机里，结果把那架飞机给炸了。我更不能去台湾，因为国民党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爷爷，我即使不跟国民党谈国恨，但是我也不能忘了这家仇。我坚持回国，回国后就是死，我也认。

这位翻译见不能把我说服，无奈地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依旧想方设法诱导我。

有一天，一位外国人来到我床前，他手中拿着一张画报，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最后硬塞给我，逼着我看。画报上画着一道红墙，我认识，那是苏联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在墙上有一个大胡子伸出头来，那是斯大林。只见斯大林手里拎着一个筐，筐里装满武器弹药，在筐里还坐着一个人，我仔细一看，竟然是毛主席。当时我真是急了，和美国人扭打在一起，他们在污蔑我的领袖，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结果美国人对我一阵毒打。

经历这次争吵，美国人对我的审讯变得更加

残酷。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个人,一个翻译,两个美国人。那位翻译对我说:“凡是战俘都要对台湾政府表示忠心,对联合国军表示尊重,你也不该例外,应该履行义务。”

我问他们要履行啥义务,他们说要在我手臂上刺字,左臂刺“反共”,右臂刺“抗俄”。我当然不肯,当场,我就对他们明确表态:“你们想要刺字也行,那你们就把我这两个胳膊砍掉,然后随便你们刺!”当时我都想好了,美国人胆敢刺字,我一定跟他们拼命,活是活不成了,早死早解脱。美国人见我态度十分坚决,他们没敢硬来,可能是担心我会自杀。

美国人几次甄别,我都未曾屈服,他们见我实在无法“改造”,于是决定把我带出陆军医院,送我去战俘营,用他们的话来说,要让我尝尝真正的战俘生活。

五、以“我要回家”来纪念七一

美国人用车把我押到一个战俘营。难友们告诉我,这个地方是“釜山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

难友们对我说,美国人肯定还会审讯我,他们建议我再次面对美国甄别的时候,一定要硬点,否则他们的审讯就会没完没了。果不其然,第二天美国人又把我提了出去,依旧动员我去台湾。在审讯时,我发现翻译官桌子上放了一个很大的搪瓷茶缸,里面装了半茶缸水,我打算抓起那个茶缸,对着翻译的脑袋来上一下。可我刚一伸手,就被翻译按住,接着,在场的美国人对我一拳打脚踢。

自这次审讯之后,美国人果然很长时间没有再审讯我。

在战俘营内,我结识了一批难友。这些难友彼此都没有留真实姓名,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是谁。在我记忆里,有一个疯子,我对他印象最深刻。这个疯子平时说话颠三倒四,难友们说他是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中了头部,精神失常。但是我知道,这个疯子是装疯的,因为每每到关键时刻,他的头脑总是很清醒。

战俘营里的伙食可不比汉城陆军医院,战俘们虽然也是每天两顿饭,但是每顿饭都是半碗大麦米,菜是白水煮的干鱿鱼汤。战俘们整天都吃

它,反正吃不饱也饿不死。

1953年6月28日,战俘营打算举办一次擂台赛,具体内容是书法比赛。之所以举办这次书法比赛,目的是为了庆祝“七一”党的生日,对于这次书法比赛的组织者,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是刚来这里的,其他难友虽然表面上接纳了我,但是内心中对我还是有些防范。

书法比赛的时间最终定在6月29日晚上,因为7月1日这天太敏感,我们担心美国人会在这天突击审查,干扰我们庆祝。

一位难友给了我一支铅笔头,能有手指那么长,还给了我一张从香烟盒上拆下来的包装纸。这位难友告诉我,这支铅笔十分珍贵,它是伤病战俘们,把用来给自己治病的消炎药节省下来,然后通过伙食房的伙夫与韩国老百姓换来的,所以他要求我一定要保管好这支铅笔。我把铅笔用纸包好,然后塞进自己的鞋里,走路时用大脚趾按着,生怕把它弄丢了。

比赛那天,难友们都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写了出来,贴在桌子上,我没有写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在拆开的烟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家”字,在这个家字下面,我又写上了四个小字——“我要回家”。

比赛结果是我得了第二名。这一切刚好结束的时候,也许敌人发现了什么,他们调出了重兵,将战俘营包围起来,直接冲进了我们囚室。

随后,在一位美国军官的指挥下,一群志愿军战俘中的叛变分子也冲了进来,他们手持刺刀、大棒,到处乱翻,足足搜查了一个小时,什么也没能找到。

美国人走了以后,我的难友们把我围到了中间,他们都问我,到底把铅笔藏在哪里了,刚才他们都在为我担心,因为一旦被敌人发现我这里有铅笔,很有可能会死人。人到难处不言羞啊,其实我在当时,把这个珍贵的铅笔头用烟盒里层的锡箔纸包上,塞进了肛门里。

7月1日这天,我们战俘聚集在一起,唱歌来庆祝党的生日,大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但只有疯子不唱,他站在囚室中间跳舞,只见他平举双臂,狠攥拳头,然后和着旋律一下一下地往下砸拳头,我们大家规定,疯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的暗号,它的意思是“团结就是力量”。

六、“好样的，小兄弟！”

我记得是在7月4日，时间大约是在上午9点钟，突然有几个美国人冲进了我们囚室，他们拽起我就走，还拎上了我睡觉用的破军毯。

美国大兵把我推出了战俘营大门，要把我押走。我边走边和美国人扭打，但是他们人多，我根本反抗不过。走上公路以后，我回头看我的囚室，囚室内的难友们都出来了，他们站在铁丝网上向我挥手，我看见疯子站在院子中央又跳起舞来，我看得很清楚，那是我们的暗号：“团结就是力量”！

敌人把我押到了一个新的囚室，我刚一进这处囚室所在的大院，就发生了突发状况。院子内有许多自由活动的战俘，他们头上都戴着帽子，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特别明显，很显然，这些人都是打算去台湾的战俘。

这些人一看我进了大院，一下都冲了上来，有个人手里拎着一根棒子，第一个窜到我面前，他二话没说，举起棒子就是一下，我用手一挡，手都被打麻了。

我刚要还手，却被美国人拉开，这时候，在囚室里头有人大喊：“反对美方支持坏蛋，反对无理挑衅！反对干涉回国战俘的人身自由！”

美国人一看情况有变，立刻驱散了围住我的战俘，直接把我送进囚室。原来囚室分为东西两个大屋，我被送进了东边一侧的屋子，屋内能有二三十位战俘。这些战俘见我进屋来，鼓起掌，他们纷纷冲我点头，对我说：“你是好样的，小兄弟！”

囚室内，一位姓关的难友告诉我，我现在住进的这座战俘营，是釜山十号伤病战俘营。这个战俘营里的战俘，分为相对立的两派，“回国派”和“去台派”，东屋内全是坚持回国的战俘，西屋是去台湾的，两派平时水火不容，时不时就会打起来。

我住进这所战俘营后，不几天就出事了，西屋一群人有一天突然冲进东屋来，按住一个战俘就打，他们用刀子把这位战俘的手掌扎穿，两屋战俘打成了一团。事后我了解到，那位被扎穿手掌的战俘与西屋内的一个战俘是战友，西屋内的

那个战俘打算去台湾，又怕东屋这个战俘告密，于是总想趁机弄死他。

东西两屋战俘一直在斗争。

在十号伤病战俘营内，我当上了学习小组长，每天我会教我的难友们认字，同时会编一些快板唱给难友们听，借此给难友打气。

我刚刚和大家混熟，敌人又把我转移了。敌人把我送上了码头，然后推我上船，船靠岸的地方是济州岛，这时候，我来到了“大韩民国陆军济州基地”。

七、济州岛升起五星红旗

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大片铁丝网，走进铁丝网大门，呈现在眼前的还是一层层铁丝网。美国人把这处战俘营圈成许多小战俘营，小战俘营之间被彼此分开，这是为了防止战俘互相联系。

敌人对我进行简单审讯之后，把我押到一个大筒屋子跟前。我稀里糊涂地走进囚室，这囚室很大，里面空旷得很，屋内什么陈设也没有，连床都没有，在靠近北墙的位置上，有人铺上了一些烂草，烂草上有六个志愿军战俘坐在那里。

美国人离开以后，六位难友为我腾开了中间的位置，他们说中间草厚，能暖和些，就让我睡在中间。

一位难友告诉我，这里是“美军济州岛第八战俘营”，我现在住的囚室是七号。这个七号囚室可不简单，在1952年10月1日，七号囚室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在了战俘营的上空。

难友们告诉我，为了纪念那次升旗，这里还流传有一首歌呢，这首歌的歌词是：

“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我们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拳头当做刺刀，石头抵住机枪，臂膀靠着臂膀，胸膛筑成铁墙。保卫我们的国旗，打击敌人的疯狂。仇恨结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还偿。万恶的美帝，逃不出世界人民的手掌。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英勇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了解到这处囚室的历史以后，我感到无比高兴，我为自己能住进这样的英雄囚室而感到自豪。

由于小战俘营之间彼此孤立，战俘们联络不

畅,于是大家就想尽办法彼此联系。对于重要文件和重要信息,战俘们就写在纸条上,然后用绳子把纸条绑在石头上,就像甩手榴弹那样,把“石头信”扔到相邻战俘营内。

我就收到了这样的一封“石头信”,信上所写的内容是:“欢迎新同志。”我也写了回信,回信的内容是:“团结就是力量。”

我在济州岛没住上几天,我们的参谋长突然被押走了。

一天我正在睡觉,突然被一位难友叫醒,他告诉我说参谋长要被敌人带走。参谋长是谁?我一无所知,据难友说,他是志愿军的一个大官,被美军关押在特殊战俘营之中,这次美军会把这位参谋长带到哪里去呢?我们都不知道。

在济州岛战俘营,能有上千人趴在铁丝网上送参谋长,大家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以此来欢送参谋长。

八、这是最后的斗争

参谋长走后,我们一度很失落,大家都不知道敌人下一步会怎么做,会不会陆续把我们都带走?然后秘密处决我们?总之是人心惶惶。

没过几天,美国人果然有动作了,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甄别,这次是普查性质的,对每一位战俘都进行了审讯。审讯的内容相对简单,只是询问战争结束后战俘们的去向。

审讯后的第三天早晨,美国人把我们济州岛内的战俘全部集结起来,然后他们把战俘们都哄操到海边。战俘们全部都上了军舰,美国人以20人为单位,把战俘们塞进一个一个的木头笼子里。于是在军舰的甲板上,一排排摆着的,都是装满战俘的木头囚笼。

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人还用军用雨布把囚笼蒙上,本来一个木头笼子里都挤了20个人,这已经是前胸贴后背了,再加上这么一蒙,不透气也不透风,不少战俘都被憋晕过去了。在我相邻的囚笼里,一位难友被活活憋死。

我们忍无可忍,于是都用脚踹那个木头笼子,美国人这次很收敛,并没有开枪,他们站在一边哇哇大叫,然后用枪托透过木板缝隙,狠砸我们,我也挨了几下。



蒋庆宗在昌图时的照片

大家斗争的情绪非常高涨,谁也不肯屈服,直到最后把那木头笼子都踹碎了才停手。令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我们与美国人的斗争,竟然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回国了。

船在釜山靠岸,又有火车把我们拉到汶山,在汶山的一处大帐篷内,美国人开始招待我们,给水喝,让我们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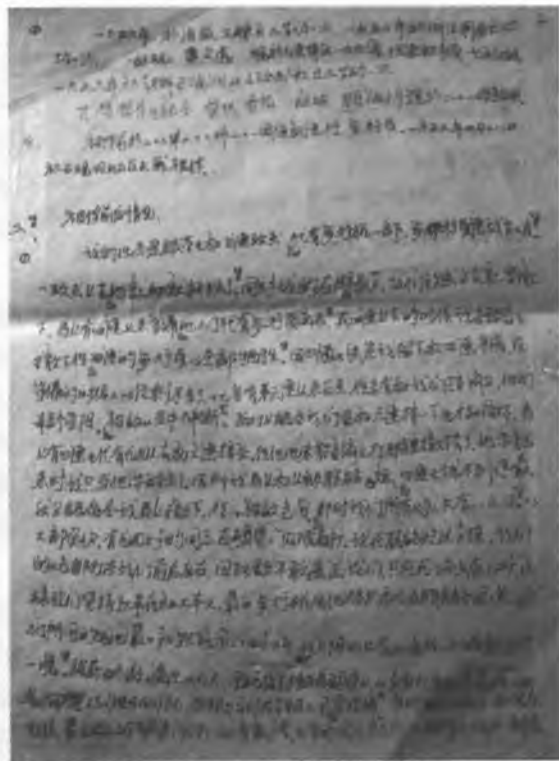
正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大家突然听到帐篷外的大喇叭里,有人在喊话,说的是汉语,我听清了,喊的大致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党派人来看你们了。”

所有战俘都跑了出去,跑到电线杆前面,这时候大喇叭突然传不出声音来,一直在咔咔地响,有的战俘开始大骂:“混蛋美国鬼子,不准干扰我们祖国的电波。”

更多的人是在哭,号啕大哭。

我们在这处帐篷内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大家陆续登上美国人开来的敞篷卡车。下车第一眼,我看到在一排铁丝网后面,立着五顶大帐篷,在大帐篷前面立起一座高大彩门,正上方有四个大字——“祖国怀抱”!我急忙跳下车,真想一下窜进大门里。

迎面走来一位祖国代表,这个人我认识,就



1953年7月蒋庆泉在辽宁昌图“归来人员管理处教导第三团”时的反省材料，档案原件现藏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

是那天我们在济州岛战俘营唱歌欢送的那位参谋长，他没死，是在我们之前回国了。

一群祖国代表走过来，开始发烟，战俘一人得到一盒红色的“大中华”，就是烟盒上印着天安门图案的那种祖国名烟。

战俘们排成一队走进帐篷，迎面走来一群穿着中山装的蓝眼珠的外国人，他们是联合国军战俘，他们与我们相向而行，我知道，这是在交换俘虏。

我们志愿军战俘边走边脱衣服，大家都说不穿美国人这身狗皮了，结果都脱了，我脱得只剩下一个小裤衩。走进帐篷，我方人员开始为我们洗澡、消毒，然后大家坐上军列，终于回国了。

我从1953年4月被俘，到8月6日回国，一共在敌人战俘营内遭了3个多月的罪。

九、我不是“王成”，只是一个老兵

回国后，我们这些从朝鲜回来的战俘直接去了昌图，在那里接受改造教育。

上级认为我暴露了部队的番号、部队的武器

和饮食情况，但是斗争精神还不错，在被包围时喊出了“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所以对我从轻发落，保留了我的党籍和军籍，处以党内警告处分。

我们在朝鲜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数有2.1万多人，最后回到大陆的只有6064人，其余战俘全部去了台湾。我们回归大陆的这6000多人其实都挺悲惨，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以前军籍。在2900多名共产党员当中，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党籍，保留党籍的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和留党察看等处分。

在昌图改造完毕，我被责令复员。于是我回家了，回到锦州大岭村，在那里耕田种地，劳作了大半辈子。我的故事没想被人知道，我原打算平平静静地过完这一生，把过去的那些屈辱都烂在肚子里，于是，连我的妻子和儿女都不知道我在战场上的事，我没有告诉过他们。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60多年中，一直有两个人在找我，这两个人就是陆洪坤和洪炉。陆洪坤是我的老战友，也是步行机员，当年他在指挥部，我在前线阵地，我就是通过步话机对他喊出了“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本来，我不认识洪炉，当年他是《战地报》记者，他在前线听说了我的事迹之后，写了一篇报道《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但是由于我的被俘，这篇报道一直没有发表。

我的事发生之后没有多久，在我们23军又出现了一个和我很相像的人物，他是218团的于树昌。于树昌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同样通过步话机喊出了“向我开炮”，结果壮烈牺牲。这件事被洪炉和田庆波写了出来，并且得到发表，引起极大反响，后来作家毛峰再根据洪炉写的这篇报道，塑造了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形象。

我和“王成”就这样沾上边了。别人都说我是“王成”，我却不这样认为，在我心里，“王成”是于树昌，“王成”是千千万万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烈士，我没有为国捐躯，还给党旗抹了黑，所以我就不是“王成”。我只承认我喊了“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只知道我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其他都无所谓。■

(整理者为《辽沈晚报》记者)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中国改革:从摸石头过河到架桥过河

○ 聂辉华

中国 30 多年来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 201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收入(GNI)超过了 4000 美元,贫困人口减少了 2 亿多人。然而,总体上中国的改革并未完成,而是进入了深层次阶段。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政治改革踌躇不前,社会改革任重道远。中国社会仍然面临诸多重大问题的考验,未来的改革更加牵动人心。为此,回顾中国改革道路的特点,剖析其成败之因由,可为未来的深层次改革提供思路。

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框架下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和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是其特点的最形象的概括。当年,邓小平确定了改革和开放的基本国策,但是并没有为改革的具体过程设计详细的路线图。相反,他认为改革是“伟大的试验”,鼓励地方政府“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就是陈云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在很多场合提到“摸着石头过河”。早的可追溯到 1950 年 4 月 7 日陈云出席政务院第二十七次会议时,在发言中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 页)1961 年 3 月,陈云在听取化工部负责人汇报时说:“看来,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就铺开来搞。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陈云年谱》下卷,第 69 页)1980 年 12 月 16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时说:“我们要改革,但是

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9 页)从陈云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可以发现,陈云讲“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要求各项工作中应从实际出发,力求稳当,“不能要求过急”。这与后来被视为“渐进式改革范式”总纲的“摸着石头过河”有些不同。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点的改革有其成功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弊端。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之处

改革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也可以理解为重订契约。但是中国的改革因其“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只能看做是签订了一种不完全契约。所谓不完全契约,指缔约双方不能完全预见契约履行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从而无法达成内容完备、设计周详的契约条款。简单说,不完全契约就是无法包含未来所有可能情况的契约。由于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各方当事人只能等事情发生之后再行谈判和利益分配,这激发了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当事人在事前做出的专用性投资会面临事后被对方“敲竹杠”的风险。为了最小化这种风险,应该在事前对事后的剩余控制权或者产权进行分配,最优的方案是将剩余控制权交给对投资重要的一方。通俗地说,当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发生时,应该将事后的决策权交给重要的一方。



小岗村农民按下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的这场改革试验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完全契约。地方进行改革试验,如果成功则在事后得到中央肯定,并且其经验作为正式的政策或制度推广到全国,然后中央和地方分享改革成功的收益。如果失败,则地方自己承担风险。

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署了一个承包村内田地的协议,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小岗村民的做法在当时要冒坐牢风险。当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来信,批评安徽的做法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幸运的是,当时的安徽领导人万里顶住了压力,并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这使得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成为惠及全国的国策。乡镇企业、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股份制银行等改革措施也都是通过类似的渠道由地方试点变成中央决策。

不幸的案例同样很多,只不过在改革总体上成功之后,失败者的悲剧很容易被胜利者的光辉所掩盖。在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企业家因为触及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底线而丢掉官帽或深陷牢狱。由于中央对于改革的具体步骤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一旦政治风云变动,地方政府以及当事人就可能为改革付出代价。例如,乡镇企业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

是温州的改革成绩,但在1989年“姓社姓资”争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支持改革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被浙江省委免职。

在经济增长几乎停滞的时候,只要松动僵化体制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释放生产者的动力,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改革的不完全契约中,尽管改革的目标尚不明确,改革的路径尚不清晰,地方政府进行改革试验的努力在总体上风险并不大,实际上乃是卓有成效的。在策略上,“双轨

制”在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为增量改革领域的参与者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激励。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也极具竞争力。这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战略能够成功的基本原因。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改革并非孤立事件。且不说英美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现实的学习模板。近在咫尺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更是通过利用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对中国大陆来说可望而又可及的成功。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与欧美国家甚至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差别明显,因此经济改革容易成功而政治和社会改革至今迟缓。但是,当经济改革逐步深入,成为一项受制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庞大工程时,当原有的改革动力已经充分释放时,“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战略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并且其带来的改革成本开始超过改革收益。

二、“摸着石头过河”的弊端

“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会导致中央的承诺问题和地方及底层改革试验者的风险分担问题。改革契约是不完全的,事前无法清晰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无法定义改革试验的性

质,因而实际上拥有决定性谈判力的中央总是处于强势地位。事前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来源于当时领导人的认知局限,因为中国的改革是非常特殊的,没有先验的模式可以完全借鉴,当时国内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和知识也相对缺乏;另一方面来源于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因为在改革过程中中国高层一直面对“左”和“右”两股力量的平衡问题。

如果改革试验是成功的,那么中央可以在事后对地方的行为表示认可,同时分享改革的成果,并将改革模式由局部向全局推广。“昆山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江苏昆山原本没有经济开发区,但是当地政府私自引资搞开发区,后来经济快速发展,终于得到上级承认并最终变为“国家级开发区”。然而,一旦地方的改革试验是失败的,或者说虽然取得了经济成就但是不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中央可以在事后将责任完全推卸给地方,地方也可能将责任转而推卸给个别官员或者具体实施的个人(官员或企业家),总之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政府或改革的具体实施者将承担主要风险。例如,在姓“公”还是姓“私”、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中,很多改革派官员被调离关键岗位,很多企业家关闭企业。由于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和改革契约的不完全性,中央对地方进行改革试验的承诺往往难以完全兑现。

如果地方改革成功的收益将被中央分享,但是改革的成本却要自己完全承担,就会造成地方对改革试验的投入不足。为了进行改革试验,地方必须在宣传、人事、机构、资金和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进行筹备,一旦改革试验失败或者中途夭折,这些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投入都变成了损失,并且常常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在充满派系色彩的官场,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尤其是当改革进入深层次时,任何一个环节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失败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影响更持久。预期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减少改革试验的投入,甚至采取“不作为”的消极态度。

相对于前期的改革,深层次的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容易改的都先改了,而那些一时改不动的难题(例如城乡分割问题、收入差距和腐败问题)已经积怨颇深,因此深层次改革所

能释放的改革动力更少。另一个减少了改革动力的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既得利益者。这些群体从前期的改革中尝到了甜头,但是进一步的改革会削弱他们的利益,因此这些群体从过去的改革动力变成了改革阻力。典型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垄断行业的国企领导和员工,他们受益于国家对国企的“抓大放小”政策。但是,如果继续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就将使他们损失垄断租金。

总之,深层次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进行改革试验的收益更少或者成本更高,这是我们当前的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

三、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架起桥梁过河”

改革需要明确目标。中国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党的基本路线所规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富强”对应于经济改革,“民主”对应于政治改革,“文明”对应于社会改革。以这三个关键词为统领,深层次改革就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就相当于把过河的对岸方位确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组织过河。

由于中国改革的方式和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完成改革,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当出现不确定性时,为了减少“敲竹杠”或违背承诺等行为,应该将契约的剩余控制权赋予对投资更重要的一方。对于改革而言,剩余控制权是一种对改革试验的成败承担责任并享有相应收益的权力,准确地说是一种在不违背先行约定和法律的情况下处置不确定性情况的权力。地方政府的优势在于,由于中国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地方政府对改革试验拥有更多信息。例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中小国有企业的处置、开放民间投融资渠道等等,各地都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大胆探索,总结经验,逐步推进。但由于多个地区之间存在竞争,每个地区的政府都会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总体利益,这是地方主导改革试验的劣势。过去频繁出现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和市场分割现象正是这些劣势的真实写照。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的好处

是,改革试验是在政治集权下进行的,这保证了中央政府在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协调优势。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中央政府的协调优势不仅可以来自政治集权,也可以来自法律授权,还可以来自对地方的信息加总后的信息优势。

从理论上讲,最优的改革实施战略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信息优势相对更重要,那么就应该将改革试验的剩余控制权赋予地方政府;反之,如果协调优势相对更重要,那么就应该将改革试验的剩余控制权赋予中央政府。如果将改革试验的剩余控制权交给地方政府,这意味着中央要充分放权,一旦改革试验失败了,地方只需承担失败的后果,不应该受到中央的额外责罚,而一旦成功则应该得到高强度的激励,一种类似于财政包干制下的奖励。

一般地,对地方性的改革而言,信息优势更明显,因此应该由地方政府为主导,例如安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区域性的改革而言,协调优势更明显,因此应该由中央政府为主导,例如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然后再将成熟的地方性改革和区域性改革推广到全国,此时“试验”的性质不复存在了,中央政府的协调优势更加明显了,因此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推行,确保“全国一盘棋”。当我们根据中央和地方的相对优势分配剩余控制权时,不仅确定了改革实施的整体战略,而且实际上厘清了改革的次序问题。如果说早期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最优的改革实施战略就是“架起桥梁过河”,不仅明确了过河的目标,而且明确了地方“打桩”、中央“架桥”的职能分工。

这里还隐含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深层次改革的目标问题。深层次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全社会进行关于改革目标的大讨论,然后形成改革目标的共识,并进而根据未来的目标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确定改革的总体实施战略。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构建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格局,这涉及如何实现中央的承诺问题。只有分权才有承诺。因此,未来的深层次改革必然伴随一个中央向地方逐步分权的过程。在分权之后,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应该根据改革的类型进行法律上的界定,以确保中央的权威和地方的自主。因此,“依法治国”的理念和方针在深层

次改革进程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系统性改革不可回避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当经济改革日渐深入时,由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及时跟进,一些经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备受掣肘。当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政治领域还是波澜不兴,而社会领域则晦明晦暗。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进程的“短板”。例如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化的问题,还涉及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动和市民社会的构建,而这些有赖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推进。时不我待,系统性改革已经不可避免。

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决腐败问题,而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对政府的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政府的权力来源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全体人民,即作为委托人的全国人大与作为代理人的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政治契约。但政治契约是高度不完全的,它无法详细地规定政府的所有行政活动。从理论上讲,政府只能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一旦超出法律范围,其行为的决定权乃在全国人大。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应该拥有对政府行为的剩余控制权,而政府拥有的只是法律范围内如何行事的“自由裁量权”。当前,政治体制还不完善,突出表现在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实际上通过扩大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侵占了本属于全国人大的“法外”权力,并且实际上通过主导立法的形式赋予了偏向自己的“法内”权力。当然,有效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只是政治改革的必要内容之一。

我所说的社会改革包括重塑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配套的社会规范、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这方面改革的难度更大,时间更长,效果更迟缓。中国自古以来契约精神欠缺,强调的是实名的小范围交易,而现代市场经济则建立在匿名的大范围交易基础之上。写了合同不能执行,有了法律难以实施,不尊重游戏规则,都是缺乏契约精神和实施机制的表现。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中华文明,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政治体制改革躲不开绕不过

○ 虞崇胜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如此尖锐地提出改革问题，说明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然而，要深化改革，真正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不仅需要敢于改革的胆识和勇气，还需要有行之有效的改革思路 and 措施。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只是经济、道德或别的什么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农民生病不敢去医院是因为他们太贫困，环境污染至少部分是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黑砖窑、毒牛奶、染色馒头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因为窑主、店主太黑心，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是因为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政府官员的贪腐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力量不足以抵制权、钱、色的诱惑，等等。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症结：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了解决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世时就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30 多年来，我们从许多方面着手试图解决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许多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设想（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已经被束之高阁了。正如有的人所说的，从上世纪 80 年代提出政治体制改

革以来，没有哪次重要会议没有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开展起来，是所谓“只听下楼声，未见下来人”。

就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越来越突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出来。

1. 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总体上来说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面不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改革发展全局。所以，无论从发展的矛盾还是改革的实践来看，都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以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一些矛盾凸显。例如，行政成本增大、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人们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与表达渠道不相适应的问题；政府中的某些腐败问题与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利益多元化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的问题；现代化发展中公民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问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等，这些都对改善公共治理提出新的要求，必须通过改革完善公共治理结构，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和束缚，并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 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当下的中国，经过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已经建立和形

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当今中国发展的政治制度前提。应该说,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必须长期坚持和继续发展完善。问题是基本政治制度只是提供基本制度框架,基本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还必须依赖于构成和支撑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政治制度只是一套空洞的制度框架而已。

比如,30多年前我国选举制度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公民权利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迫切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不可能完善的。经济利益的调整需要政治权利的调整,没有民主权利的实现,不可能有民生的保障。要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民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发展民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根本着手。全面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创新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扩大和切实保障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已经成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首要途径。

3. 清除体制性障碍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性障碍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同以往的30年相比,新阶段政治体制创新的现实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迫切得多。这是因为:(1)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由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2)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3)解决腐败问题,重要的在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制约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解决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以使权力正确行使。(4)统筹中央—地方关系,其实质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一个合理的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格局,并建立

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

(5)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取决于能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一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由此,奠定公共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

4. 政治观念变革更新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观念是体制的先导,体制是观念的体现。没有体制创新,观念更新就是空话。最近一些年来,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中国的政治观念有很大进展。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三大政治理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又如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要使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等等。诚然,明确提出这三大政治理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重大突破。然而,如何才能使这三大政治理念落到实处呢?关键的就在于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如何内含着这三大政治理念,从而使这三大政治理念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又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问题。近来,习近平副主席在“权为民所用”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权为民所赋”,这可以说抓住了正确权力观的根本。但是如何实现“权为民所赋”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将赋权主体、赋权客体、赋权过程、赋权程序等确定下来,并且按照权力运作规律建立起科学的授权机制、行权机制和督权机制,唯其如此,“权为民所赋”才能落到实处。

再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问题。目前官员们之所以都有GDP情结,都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与我们的政绩评价体系相联系的。多少年来,我们考核和评价干部的政绩,基本上是以GDP增长作为硬指标的,而政绩又与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即所谓“能者上,庸者下”。于是,追求GDP增长就成为官员们升迁的首要途径。

因此,只要坚持以绩效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不变,只要固守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各级官员们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得到升迁,自然会去追求GDP增长。可见,官员们的GDP政绩观背后,仍然是干部体制和评价机制问题。

5. 法治国家建设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从1999年修宪开始,“法治国家”的理念已

经伴随我们走过十多个年头,中国法治建设也取得了许多具体的成就。但是,从根本上说,只有在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模式法治化之后,政府官员的行为才能受到法律的控制,地方政府才会有效监督当地的砖窑或煤矿,中央和地方才有能力联合治理正在恶化的生态环境,农民才能获得平等的政治和社会待遇,社会中下阶层人群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平等权利和尊严。总之,我们才能通过法治更有效地解决经济改革本身所不能解决的种种社会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都是建立在制度现代化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制度包含一系列共同的宪政要素:法治、民主以及对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防止政府以不必要的方式干预或控制市场、社会和公民的私人生活,民主保证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法治则要求政府去严格执行由民主政治程序通过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概言之,现代化的前提是政治和法律的理性化。在这其中,法治是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极为随意、社会资源大量浪费、个人活动空间受到极大约束、政府与私人行为的后果没有法律保障下的可预见性,那么现代化只能是痴人说梦。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政治和法律的理性化呢?唯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使之逐步内含政治理性和法律理性。

6.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和谐是指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有序性,即社会主体、社会活动、社会行为在社会规范体系内融洽协调。诸多社会问题产生或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根源还在于体制不完善。体制在社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政治体制对于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优化社会秩序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体制以规范的形式确定社会资源使用的主要原则,保证经济社会资源在一定体系内得到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完善,将减少人为因素不确定性的影响,使人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合理引导。并由此保障人们各居其位、各谋其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同时,体制作为对社会

交往活动的规范,以统一的形式要求人们普遍接受并严格遵守,对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予以支持,对违反或破坏社会运行的行为则严加惩处,把人们千差万别的行为纳入统一的轨道中,使社会生活保持一种预期的秩序。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凸显了法治化、民主化要求,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公共管理体制显得尤为迫切。

保障人民群众的社会权益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由体制所确定的社会规则体系,能够确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应有权利得到合理行使,并获得相应的利益。权利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广大人民当家做主,在公开公平的氛围中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进而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良好效果。如果体制不完善,人们合理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则会从根本上损害社会公平和稳定,也难以真正理顺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体制,便于社会成员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平等地参与劳动创造、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

协调社会矛盾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体制究其实质就是调节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的秩序安排,建立一种高效、有序的运转和协调体系。体制能够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从而有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体制完善有助于加强对日常利益矛盾的规范化监测和调控,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局部和基层,把冲突产生的负面后果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良好的体制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地进行创新,以此来保护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有效化解不断产生的新的利益矛盾,从而在动态中维护社会利益的合理格局。

7. 民生问题的解决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当下的中国,民生问题似乎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地方基层到处都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呼声。然而,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呢?其实,解决民生问题也要靠政治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

比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待遇问题,不是增

加他们的工资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靠建立合理的分配体制。只有建立起机会均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体制,让低收入者也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贫穷问题。又如,解决农村居民社会保障问题,不是建立几个福利院、养老院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再如,解决城市居民就业问题,不是提供几十个、几千个、几万个就业岗位的问题,而是如何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改善就业结构的问题。而要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改善就业结构,就必须调整政府的就业政策,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使就业问题成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自动解决的问题。再如,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抓几个不法商贩就可以解决的,关键还在于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食品流通管理体制机制。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

制机制和食品流通管理体制机制,对于有害食品实行“零容忍”和“一票否决”,毒牛奶、染色馒头事件才有望从源头上得到解决。

总之,民生问题是大事,是政治问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能解决的,必须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建立和健全能够充分保障公民权益的体制和机制,从而使民生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

综上所述,目前世情、国情、党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提出了深切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躲不开、绕不过”,及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掌握主动,可以避免社会危机总爆发时措手不及。■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1 年第 11 期目录

书屋品茗	诗来翩翩若蝶 独自徜徉在诗的长巷	高 智 柳士同
学界新论	春来如秋意转迷 民国有个翁文灏 伤残之树叶成荫 闲云野鹤——何兆武	周树山 危兆盖 王 鹤 肖跃华
编读往来	谁是《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的创始者? 闻一多遗属寓居地及其他 顾准重罚资本家并非事实	陈福季 王仁宇 胡实声
艺术天地	《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 达利的加拉 爱上死敌	吴 靖 余凤高 哈 米
说长论短	年鉴学派——玫瑰之刺 在记忆与想像之间 历史叙事的几种面相 人思,所以为人 思维工具的利器	关万维 苑容宏 梁卫星 马小军 黄鹤春
文化视点	文化杂交 广州的过去与未来 海南的历史年轮	张忠培 莫清华
人物春秋	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恩恩怨怨 隋唐人物小传 寂寥天地间	鲍牧松 周 实 罗 维
灯下随笔	网络时代的理性 我国最早假文凭来自国子监 度己以绳与接人以拙 “死”在句下	丁国强 魏羲之 张 克 韩立平
来稿摘登	辛亥革命抒怀	王 度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 3.00 元
地址 长沙市韶山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 0731-8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家庭保健报

让全家人都健康

全国优秀卫生报纸 全国百家优秀报刊

精彩看点

传播健康生活理念,倡导
科学生活方式,为读者提
供全方位实用的健康咨询、
医疗信息、保健服务和生
活知识。

家庭医生

验方集锦

健康咨询

疾病关注

邮发代号: 13-3 全年定价: 111元
月定价: 9.25元 周二、四出版
彩色印刷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演进

○ 郭道晖

执政党应该是宪政党

从 17 届四中全会做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议以来,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差不多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党面临四种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种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表明党的高层领导人已意识到危险临近的紧迫感。

这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集中到一点,可以说,现在是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今年 6 月我参加了在西安由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法工委和中央编译局联合举办的“关于人大制度和法治国家建设”的研讨会。会上着重讨论了执政党自身的改革问题。俞可平在小结发言中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在面临第三次大的讨论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第一次大讨论主要是围绕继续革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大讨论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从这两年可以看到,第三次大的讨论已经开始,其中党的领导与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宪政民主与公民社会等是热点问题。

我认为,这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主题就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

其实,这个主题并没有什么新鲜,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的任务,可是遇到 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而中止。

我认为当下最迫切的任务是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宪政党,

清除长期污染党的机体的封建专制和其他腐败的、僵化的守旧思想的余毒,努力实现党的民主化、现代化。

近年主流的提法是“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执政党仅是党的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没有明确“执”掌的是什么性质和理念的“政”。不明乎此,就可能仍然沿袭革命党的思维和制度去“执政”。

什么是“宪政党”?——简而言之,宪政党就是依宪成立、依宪参政或执政、致力于推行宪政的政党,而宪法则是人民权利与权力的保障书和约束政府权力的约法,宪政则是这种良宪的实施和实现。

近现代政党制度是在产生宪法、实施宪政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不是在中国有了宪法和民主宪政制度以后才据以产生的政党,而是在进行民主革命过程中创立的革命党。其成为执政党并非经由依宪民主选举产生,而是“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有其历史缘由,其好的传统也可以有选择地继承;但它在民主宪政思想方面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弊病良多,亟待改革。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领导人民革命和掌管全国政权这样两个不同时期。作为革命党同作为执政党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党的许多失误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认识这种区别和实现这种转变导致的。

譬如在革命时期,共产党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本应转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工具,缓和或否弃阶级斗争;可是,党在执政以后仍然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造成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高度紧张,演变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大灾难。

又如,作为革命党主要是代表国民中的一部分革命的阶级去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

后,成为执政党,必须经由全民直接或间接的民主选举予以确认,从而要对全民负责,为全民服务,要代表全民利益,而不能只是如我们惯说的“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或“95%的人民”的利益。把5%即3000万人(以上世纪50年代中国6亿人口计)或6500万人(以13亿人口计)打入另册,对这部分人的权利和利益以及做“人民”的资格排除在外,在共和国历史上不知造成了多少错案和悲剧,也与作为执政党的身份与合法性基础不相称。即使是所谓“阶级敌人”,他们也有基本人权,如果受到非法的侵犯而执政党和政府不闻不问,就会自毁国家法治,损害党执政的合法的、道义的基础。

在革命时期,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一贯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列宁所谓的“民主的”集中制,即集权制,“民主”只是一个形容词)。作为革命党,强调党组织高度集权和铁的纪律,以对付比自己强大百倍的敌人,容或有一定的历史理由。可是,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再讲高度的集中制(集权),就不像处于弱势的革命党时期有充足的理由。更重要的是,作为执政党,其所集中的不只是党内的权力和党员的权利,而是国家的权力。在中国,党的权力的集中,也同时就把国家权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各级党的领导人手里。而任何权力的过分集中,必然产生权力专横和权力腐败。这一“铁则”,共产党也没能逃过。因此,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民主集中制所要强调的重点,总体上应转为民主制。

民主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尊重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权力的多元化)和对权力的制约。毛泽东曾讲过要有意识地设置“对立面”,“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转引自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2页)但说说而已,真有敢唱的,马上被残酷打压下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核心是“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为此要使革命党、专政党转变为宪政党,要从严治党,从严制约党权。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必须改变以党代政,“党领导一切”而且“党权高于一切”的旧体制,要改变在党内设置一套与政府机构相对应、重叠的

而且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机构,直接向政府发号施令,干预政府管辖的事务(西方在野党党内设有与政府对应的所谓“影子内阁”,在平时是为了监督政府有关部门,在竞选胜利成为执政党后可立即转化为政府机构。中国共产党已是执政党,没有必要再设这套机构)。

执政党是建立在民意的选择基础上,要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人大和党代会要逐步实行公开的直选和差额选举。

在党内要厉行民主化的改革,改变斯大林式的“党专政”、“领袖专权”或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皇权专制制度,“一个人”或某个“核心”说了算的制度,建立对党权、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机制。要坚决克服党内行政化倾向,共产党既然是实行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各级党委中委员权利与权力平等,就不应当有行政化的首长负责制——所谓“第一”“第二”“第三”把手之分,和所谓“书记挂帅”、“第一书记拍板”等超越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惯例。

只有革除作为革命党的许多与宪政国家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才能真正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建成现代化的宪政党。

执政党的基本理念和任务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

西北大学一位年轻的副教授华炳啸出版了一本名为《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的专著,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放教授和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都给这本书写了序言。江平教授指出“宪政是压倒一切的利益考虑”以及“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的基本观点,高放教授强调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著名老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也提出“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宪政社会主义”。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先生说:“中国现在已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我是信奉社会主义和力主实行宪政的法学者,我赞同将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宪政社会主义”。但我信奉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

所倡言的宪政是新的宪政主义。二者的结合旨在突出和规限宪政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人民性。

1. 所谓“新社会主义”，是借以区别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形形色色、鱼龙混杂的社会主义

我认为新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社会至上即社会主体——人民至上。它的对立面是国家至上主义，或希特勒、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而不一定是资本主义。当然它同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即野蛮的资本主义是对立的，而现代新资本主义则孕育有社会主义因素，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某些经济与政治制度（如股份制和议会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我国现今实行的混合经济中就内含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我国宪法确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一国两制”也容许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表明新社会主义同新资本主义是可以兼容的。

新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主体——人民、公民、社会组织权利和社会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国家/政府的权力为本位，更不是以党权为本。因为历史的发展规律本来就是先有社会，后产生国家；国家权力是社会（人民）赋予的，国家权力要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执政党的权利或权力也是人民赋予的。现今党的高层领导人强调“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是合乎宪政党的理念与要求的。

2. 新宪政主义——以公民社会及其社会权力为基础和动力

至于新宪政主义，它有别于古典宪政理论。后者仅限于国家这架密封的权力机器内部的自我分权制衡，一般社会大众和普通公民难以参与。而新宪政论则将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转向社会。

迄今我国理论界在研讨“法治国家”或宪政国家的概念与意义时，一般都局限于就国家权力内部结构关系立论，很少放眼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一是忽视国家与社会日益二元化的事实，无视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还有公民社会；二是忽视

现代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现象，无视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还有社会权力。

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存在。它将分散的社会意志集中化，将个体的私人利益公共化，从而也使其诉求和活动政治化，使私人社会形成“公人”（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成为能通过同政府对话、协商、辩论、谈判，进行政治参与，支持和监督、制约和推动政府依法行使权力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这也是我一贯主张的“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它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也是新宪政论的基本立足点。

公民社会是社会权力的生发地，是实施宪政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动力所在。所谓社会权力就是社会主体以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支配力。离开公民社会及其社会权力对国家和社会日益增长的作用，侈谈实行宪政，是舍本逐末。行宪固然应当强调实现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与制衡（我国在这方面还远未达到），而没有公民社会的参与和支撑，就很难推行。现今执政党重新强调“联系群众”，我认为在当代应当着重联系的“群众”就是公民社会。脱离或排斥公民社会，就不能说是民主的宪政，更何谈社会主义。这就如毛泽东所曾批判过的：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号称实行“宪政”，是“挂羊头、卖狗肉”！

3. 宪政社会主义还要注入共和精神

我们是“人民共和国”，但“共和”思想理念却长期失落。讲共和，就要求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源，特别是公共权力为全民共有、共享、共治，追求共同富裕；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主张社会多元共生共存、互补互控；具有宽容并包、兼容兼善天下的政治胸怀与制度，建立共同幸福的和谐社会。

之所以把我们的愿景称为“宪政社会主义”，因为它涵盖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社会特性与追求。

“宪政社会主义”当然与“社会主义宪政”是相通的；之所以不以后者命名，因为宪政的核心价值是普世的，除可以有某些国情特色、时代特色乃至可能带有阶级烙印外（如中国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就其自身内涵而言，原则上并无姓社姓资和东西方之分。

（转下页）

章乃器 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

○ 胡治安

上世纪30年代,章乃器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备受国人敬仰与称道。而在50年代,却以中国第一号大右派而家喻户晓,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章乃器什么时候都是君子,即使在他被千夫所指整日挨批的1957年,抑或在被贬闲居的20年,也从不减君子本色。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

章乃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章乃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叫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他对这个阶级总的估计,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

章乃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意见和主张,在民族工商业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章乃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装潢、美化”资产阶级,抹杀阶级界限,否认阶级斗争的祸水,因此遭到责难、非议、批判。

对章乃器的批判,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当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工作报告时脱稿列举事实,赞扬工商业者,并提出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政党,引起争论,遭到批判。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议情况时说,“对有人在会议中夸大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宣传民建会是‘红色资产

阶级政党’的错误主张,会议也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掩盖与忽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企图模糊阶级界限……”1956年11月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上,章乃器就两面性、思想教育、对党的态度和理论问题,提出了成套的意见。而会议对章乃器的批判也几乎白热化,有人甚至主张撤销章乃器的民建副主委职务,开除民建会籍。章乃器不仅不服,还发表长文《如何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两面性》,着力批判教条主义,说教条主义者“关心的是经典著作成语的僵化的尊严,而不是革命的利益;是自己的进步面目和理论家的地位,而不是革命的现实”,迷信‘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剧烈’的错误论断”。

中央统战部对民建二中全会批判章乃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认为章乃器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只要鼓励,不要批判,愿意听独立自主,不愿听党的领导。但统战部的报告也肯定了章乃器,敢于代表资产阶级公开尖锐的批评和斗争的积极性,敢于和我们(中共)唱对台戏的积极性。对他的这种积极性,“不仅不应该打击,而且应该加以重视,对他的错误和毛病则必须进行适当的批评”。

毛泽东也于12月初复信黄炎培,从开展“党内斗争”的角度,称赞“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接上页) 不说是“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宪政基于民主也高于民主。宪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相通的,不过以“宪政”来规限社会主义,在命题上和内涵的广袤性上优于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也用以区别“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的局限性。

总之,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是使执政党成为现代宪政党的必由之路,是一个值得所有致力于宪政改革的党内外志士仁人加以研讨的课题。■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救国会七君子，左起：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

章乃器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在被批判中，不断加深研究，以期更加充实。他在形式上看来孤立，而实质上并不孤立，不仅许多工商业家以不同形式支持他，而且毛泽东也对章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时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照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这是黄炎培同年7月2日在民建会上传达的。章乃器自然听到了，他对过渡时期“剥削光荣”是充满自信的。

当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时，他不服，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直接问毛泽东：“我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错吗？”毛稍停片刻，说在中国不当红色资产阶级，难道当白色资产阶级吗？章乃器1956年10月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说：“毛主席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对我说：‘我很同意你这个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中国还允许有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1957年6月17日的批判会上，民建副主委胡厥文说：有一次，他说毛主席同意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我说，乃器同志，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我章乃

器一生从来没有骗过人。但实际上是骗了人。胡厥文说到这里章乃器当即高声反驳，“没有骗人！”可见红色资产阶级一说，毛泽东是认可的。章乃器的老朋友，同为民建副主委的化学工业家李烛尘对他说：毛泽东曾告诉李：说民建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不好，倒是很好，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红色的也不行呀！

但是，在毛泽东、李维汉等人心目中，章乃器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总代表。毛泽东在1957年1

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就说“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即把章的话当成应当批判的“臭屁”，应该锄掉的毒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工商业者问题”一节，“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的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等等。所有的批判就是针对章乃器的观点。李维汉在6月8日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总结讲话，就以章乃器为批判靶子。“有人反对思想改造”，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绝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李维汉明确表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迎接批斗

反右斗争开始了。有了毛泽东、李维汉的定性和批判，章乃器在劫难逃。章乃器直面大批学

者、“专家”，直面“金口玉言”，没有退缩、屈从，曲意检讨，而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地迎接批判，倔强反击。批判章乃器的部门，主要是两个：一是民建和全国工商联，一是粮食部机关。

在1957年6、7月间，民建和工商联连续召开多次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对章乃器进行批判。章面对群情激愤的场面，从容辩驳，甚至“顽固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

第一，不承认“两条路线斗争”。在6月15日与17日的会议上，他针对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进行申辩反驳。他认为说“两条路线斗争”是没有“区分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乱说”。“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大帽子。他公开表示不同意李维汉对他的批评，“李部长的讲话，没有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第二，不怕当右派。在6月17日，章乃器作了第二次发言，态度鲜明，说“人民日报说章乃器‘拒绝批评’，这四个字我不接受”。“我不承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再讲一句话，我这个人不能勉强争取作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可能实质上我还是左派”。两会（指民建和工商联）批斗之后，即做出决定，停止章乃器在两会的职务，检查交代。章乃器的两次发言，在报上公布之后，工商界一些人认为章乃器才真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他们这一阶级的英雄；有人说“下次选举时一定要选章乃器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吴大琨、黄炎培等人批判章乃器后，收到恐吓信，不同意他们对章的批判。

第三，可以不当代表、委员、部长，“人还是要做的”。

对章乃器批斗的另一场所，是粮食部机关。8月12日至16日，粮食部对他们这位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的第一任部长，进行了四个半天的批斗。12月，又开了三个半天的斗争会。粮食部机关干部对章并无恶感，倒觉得他很能干、很负责，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毛泽东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粮食部的党组书记陈国栋，是章乃器在安徽当财政厅长的下属，在工作中尚能较好的合作，章说他当部长是有职有权的。因此，粮食部对章乃器的批判，必须借助外力。民建的相关负责人挺身而出，在粮食部大礼

堂报告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后来又派人直接参加斗争大会，进行“揭发批判”。章乃器气愤已极，向部党组提出警告：如再任外间市侩在部礼堂上诽谤侮辱部首长，我将宣读宪法第51条条文，下命令解散会议。

8月16日，章乃器最后一次参加部党组会议，他对党组书记陈国栋说，我有三点是不能改变的：第一、我非常乐观，就是在黑暗时代也不曾悲观失望，解放后更加如此，自己感觉自己没什么。第二、我同旧的官僚政客不一样，投机取巧，拉拢人，我是不会的。我是靠脑力劳动吃饭的。第三、也是基本的一点，我曾经讲过，在旧社会反动派千方百计威胁我，甚至在安徽时方治（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威胁下，我坚决不肯反共，我到武汉时，蒋介石下手令，要我当三青团干事，徐恩曾（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找我参加国民党，我都拒绝了，我是经受了考验的。因此，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对灵魂判死刑，我是不能接受的！

他这种宣言式的讲话之后，自然受到批判，他又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人民代表可以不当，委员、部长可以不做，人还是要做的！”

对章乃器的批判，有一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章乃器不承认反党，更不承认反社会主义。章乃器对当时社会主义，确实有些什么批评意见，比如说“大党主义”、以党代政问题。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要求中共“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继而说：“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他还说：比喻可能不正确，“但，无论如何，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导，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积极性，显然是有利于把国家工作做得更好的”。

他建议“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而主要的应该按照职责和分工办事”。

章乃器在实践中发现,当时的社会主义有不少问题、缺点、失误,需要完善、改进。在整风运动中,他就以主人翁的身份、老朋友的口气,“开门见山”地提批评,作建议。他的本意在帮助共产党消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撤“墙”填“沟”,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设平等、民主、自由、高效的社会主义。而在当局和他的反对者心目中,章乃器就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坚持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有意见,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其方式和手段比章伯钧、储安平更隐蔽、更毒辣、更狡猾。批判会、斗争会,一场接一场,咒骂、呼叫一阵高过一阵,甚至将他11岁的小儿子也拉上陪斗。章乃器则回答:“威武不能屈!”“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活!”

三、“总理,我向您伸出救援之手”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这是金口玉言,“钦定”不移的了。

1957年6月1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出联合指示:《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指示》明确“章乃器就是右派分子的突出的代表”,“他无耻的宣传红色资产阶级的论调,鼓吹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区别,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他歪曲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品质的说法(指章批评斯大林说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的观点是错误的,是造成党与非党的‘墙’与‘沟’的思想基础——引者注)……就是要动摇共产党的领导。……把官僚主义说成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更是赤裸裸的诽谤社会主义,露骨的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号召民建全体会员和全国工商业者,都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层层深入”地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开展坚决的斗争。此后,一批重量级人物,黄炎

培、陈叔通、李烛尘、胡厥文、孙起孟、孙晓村,及两会中的大知识分子施复亮、千家驹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上发表文章,批判章乃器。

章乃器成了全国头号大右派,为了彻底批倒、批臭,民建与工商联编辑了《章乃器反共三十年》、《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批判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思想专辑》、《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前两本由新华书店经售,推向全国,分别发行两万册、十万册,其他两本内部发行,在民建、工商联及相关系统散发。在这些批判材料中,章乃器的形象被扭曲了。

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章乃器”三个字在全国报刊、广播中频率最高,名声最丑、“最臭”,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但个性倔强的章乃器,仍在挣扎。7月22日,他致信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说自己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意图,要求国务院进行检查,对他做出结论。

“两会”和粮食部进行轮番批斗后,章乃器于1957年11月12日致信周恩来,不承认历史上反共,不承认与章罗联盟有勾结,不承认“章记小集团”,他写道:“斗争已经五个月了,为了运动,我对任何的污蔑都不急于作公开的答辨。我现在所请求的,只是内部是非的答辨。我再一次向您保证,我是永远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是一个历史复杂,性格也很复杂的人,对古人敢言极谏的作风有所感染……这种性格和思想,使得我在整风初期自以为决不做百分之九十害怕鸣放的人,流于放肆狂妄,失了言,对领导大不敬。绝没有对党猖狂进攻之想。”

随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章乃器作《我的检讨》的书面发言,承认自己在思想路线是右派,但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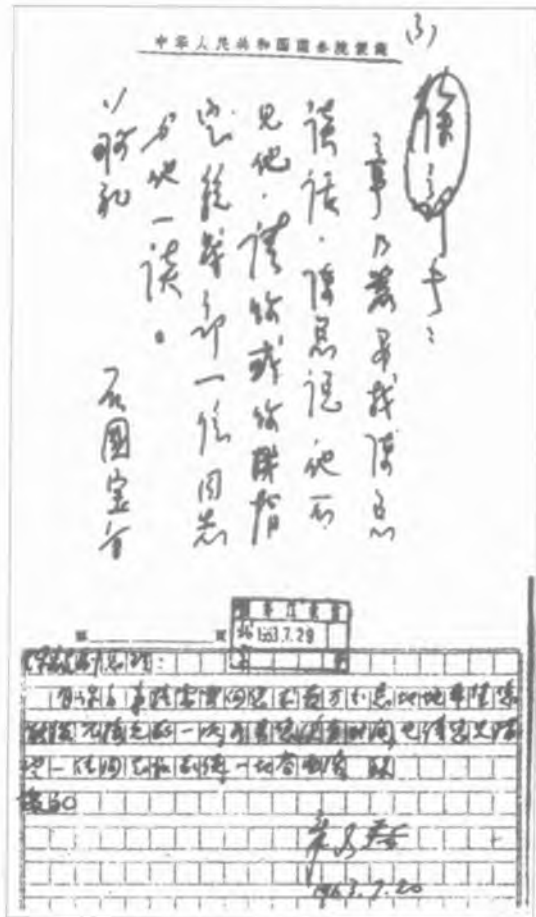
1958年1月,章乃器写出两万七千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全文分七部分,对自己被批判的问题,一一加以辩解。认为他的言论在“彼时”说来:“尖锐的程度只能算中间偏上”,还比不上张奚若、沈雁冰、黄炎培等的发言。之所以被划成右派,是因为有人在“制造典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我进行阴谋陷害”。他认为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界线很难划。对把他的论

点批判为修正主义不服。说某些正确的思想,往往当成错误思想批判。在这篇检查的最后说:“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受处分)。一个只能受褒奖,不能受处分,只能升职,不能降职,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担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

经过半年风狂雨骤的斗争,章乃器嘴上说“轻松愉快,心安理得”,精神痛苦却是外人无法估计的。他有了受处分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打击来得这样突然,这样严厉。他被撤销粮食部长职务,撤销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行政级别由四级降至十级,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的《七十自述》中,对撤职有如下描叙:“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的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决不是。总理问我做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

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的破产;我决不作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据章伯钧说,那天周恩来总理找他们三人谈话,章乃器没有谈完,就扬长而去。这反映了章乃器的个性。在回家的路上,他也感到不该如此造次。之后他又致信周恩来“请求原谅”。信中说:“您告诉的决定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从而我昨天的态度又有些生硬,有些情绪,甚至可能有些狂妄。这点请您原谅。我总以为二万五千字的根据事实的叙述,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您所说的‘组织服从,思想保留’我是这样理解的:处分是‘利害关系’、‘得失关’,是不应计较的;人们强加于我的右派帽子,是‘荣辱关’、‘毁誉关’,是应该尽量忍受的;但我自己承认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是‘是非关’,那就决不可含糊,我不愿意颠倒是非以对人,也不能泯灭是非以对自己”。“我仍然相信,我的冤枉可以昭雪,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是



章乃器要求见陈毅的信

非最后一定可以大白……总理,我向您伸出救援之手”。

次日,又给周恩来一信,大意是:“今晚八时听广播,知道我们撤职事已公布,谨报告感想如下,给我处分,我仍然感激党,能做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公民就是出于党之恩赐,就应该感激不尽。……过去九年间,党给我许许多多效劳的机会,更应该感激党……我将继续效忠于党,效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至死方休”。

在铁案已经铸成后,章乃器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感激”一番之外,表白“至死方休”地跟党走。但他对“是非关”是看得很紧的。3月10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停止章伯钧的副主席职务,停止章乃器、陈铭枢、罗隆基、黄琪翔、钱端升、叶恭绰、刘王立明、王葆楨的常务委员职务。为此,章又致信政协主席周恩来,说自己受冤枉,民建的“阴谋家”对他进行诬陷,请求党检查民建和工商联的反右斗争。并说自己是一个“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人”,但是“得不到党的谅解”。要求给他“详细申述”的机会。

章乃器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向周恩来写了三封信,都如泥牛入海。他紧守的“是非关”,只得像“得失关”、“荣辱关”一样在委屈中忍受了。

四、“四十万右派中的硬汉子”

“章乃器很深沉,很能动脑子”,这是李维汉对他的深刻印象。章乃器从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凡事他都要问个为什么,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他也恃才自傲,有时目空一切。他讥讽民主党派有股暗流:争权夺利(提名单最积极),趋炎附势(爱捧场),阿谀奉承(见了共产党员就觉得自己低一等)。他鄙视官场上曲意奉承、投机取巧的人。自视清高,难免孤立。他被撤去部长、常务职务后,更加孤立。当年政协工作人员汪东林的回忆文章说:1962年在政协礼堂数次见过章乃器,“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绷着脸,没有见他笑过,他听别人发言很认真,自己讲话也很认真,仿佛一切胸有成竹,有着明显的自负的派头”。

1959年章乃器在政协礼堂见到周恩来,握

手之后,周恩来说:“乃器你还有点自负吧!”章说:“我哪敢自负啊,是朋友们都不理我,都不跟我接近,我有话无处说!”显然,这是对周的意见,因为多次写信,要想向他“详细申述”,周没有回音。周恩来不愧为谈判高手,一下就把球踢出去了:“李维汉部长在这里,你可以说么。”李维汉插话:“乃器是自己孤立自己。”这次短短几句对话,章乃器却兴奋了一阵子,他认为周恩来说他自负是党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思想作风上的骄傲自负。此后,他常到政协礼堂跳跳舞,看看电影,听听报告。他又“反思”自己,说他从旧社会带来了两个毛病:一是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搞不好团结;另一个是男女作风问题。这倒说得很实在,也很虔诚。拈花惹草的事,确实不少,并因此而吃过不小的亏。他说:“我是五四时代的人物,这一代人谁能免了一点点浪漫主义?民主人士中真正干净的有几个?”

保留政协委员,就保留了他的活动舞台和讲坛,章乃器就利用它发表意见。1958年至1960年分别去了河南、福建、湖北参观考察。1962年1月6日至2月1日,章乃器又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参观考察。回京之后,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他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活动、民主法制等问题侃侃而谈,说出许多人想说不敢说或不会说的话。正是这些意见被认定为再次向党“猖狂进攻”。

(一)“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

章乃器说:“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可以说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机关工厂无管理。”

“对我五次围剿,我不死,是我坚强。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一亿五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二) “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他说,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打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受了委屈的人不能喊冤,“喊冤有罪。”看戏中,老爷出来,拦轿喊冤的,先打四十大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还有不许喊冤的。他对人表示,政协大会时他将提三个提案,矛头直指黄炎培等民建中央领导人。他估计,这样做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三) 不是我认错,而是党要纠偏

在座谈会上,章说“毛主席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消极一面是软弱性,但反右斗争中,忽然说资产阶级右派造反了,说造反应该是动刀动枪。谈谈,批评批评是动舌头,怎么能说造反?中国自古就鼓励批评,叫忠谏。如果说资产阶级软弱性居然敢造反,那应该是反动的坚强性,不是软弱性。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敢领导或者说领导不好,现在社会主义了,资产阶级消灭了,怎么敢造反,说资产阶级造反是违反常识的”。

“反右整风时,浮夸风到了绝顶。对许多论点的武断就是浮夸的典型。说我反共30年等等。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

(四) 开展“恢复常识”的教育

他说,这些年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师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地,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

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章乃器说:有位经济学权威说:“我国现在政治思想上资产阶级未被消灭,但从经济上看,资产阶级是被消灭了”,这是缺乏唯物主义常识,照此说法,现在有些人还有封建思想,是否封建阶级还存在?……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总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章乃器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右派头子”们听了章乃器的发言,个个暗自欣喜,支持夸赞。章伯钧称他这位宗兄“有一股正气,很有骨气,连共产党员听了他的发言也要暗点头”,“四十万右派分子也应该有一个硬汉子,应该支持他!”“千百年后对他的看法,不会和今天一样。”陈铭枢说:“章乃器发言很好,中共应该下罪己诏。”罗隆基通过刘王立明向章妻子杨美真打招呼,表示支持同时要章乃器小心点。

五、“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

同章乃器的预料一样,他在政协会议提出三个提案后,吃到了苦果,加重了打击。

(一) 解除政协委员,生活“又打折扣”。1963年1月20日,章乃器被开除民建会籍,同年3月7日民建建议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提请政协常委会通过。那次政协常委会,对章乃器缺席“审判”。常委们“一致通过”决议,将“政治上反动的右派分子”章乃器逐出了政协大门。在生活上,先是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后又增加了50元,但文革中降到了每月50元。有时候,章乃器自己上自由市场买菜,将帽檐拉得低低的,“破帽遮颜”进闹市,买些猪下水、猪头之类,自己动手,加工细作,成为“美味佳肴”,他说“钱少了,营养不能少”。1947年,章乃器在香港曾创办港九地产公司,获利丰厚,后应中共电邀,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将产业交给了王宽诚——后来成为香港巨商。1963年12月王宽诚来北京,章乃器与之促

膝交谈了两个晚上,但向王宽诚借钱未果。

(二)妻离子散。一个温暖的家庭,在政治风暴中破裂。妻子杨美真于1957年10月离开家庭,到1958年春,才敢每隔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尽管如此,她仍然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被打成“右派”。1959年末,杨带着一个星期的安眠药回了家,自己写好了离婚书,逼迫章乃器签字,并说,如果不签,就死在家里,章只得签字同意离婚。章乃器有五个在大陆的儿女,直到1962年,最小的儿子才回家看看。在这样的逆境中,章乃器写下了“名败身不裂,家破人未亡”的诗句,反映了他的境况、意志和毅力。

(三)“文革”中死里逃生。“身不败”,“人未亡”,更聚焦在“文革”的惨痛中。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冲入章乃器住宅抄家,他本人则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并不“吉祥”,上演的是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红卫兵正举行鲜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来的“黑五类”分子,惊恐不安地走进来,血肉模糊地躺着出去。章乃器周围的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唯有他凭着意志和武功的功力硬撑着,不久也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他命不当绝,恰在此时有一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成为这场惨剧中的幸存者。但当他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拒绝。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救治后被送回家中,但他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请看他的《七十自述》中的血与泪的记述:“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我居然没有死……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

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们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六、对章乃器加重处分的个中奥秘

章乃器是民建的真正创始人,却被开除出了民建,他是新政协的筹备者之一,却被逐出政协大门,被撤职降级后的工资变成生活费。出入“天子堂”的权贵,变成了“泡大澡堂”的平民。“右派分子”帽子摘了几批,他却被加重打击,这全是中共制造的悲剧吗?答案是复杂的,有中共极“左”路线,有民建内部的宗派斗争和感情纠葛,也有他本人倔强的个性。

从1962年章乃器向政协大会的三个提案可以清楚看出悲剧的根由。在写提案前,他决心挑起一场斗争,自称“公愤私怨集于一身”,要利用政协舞台,将中共的军,他说“人家把我当敌人打在地下,我为什么还把他们当朋友,这是私怨。讲到公愤,各处工厂停的那么多,人死那么多,违法乱纪情况那么严重,对这些坏人坏事,有责任心的人不能不闻不问”。一个提案是针对中共的《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他引用宪法条文,列举出种种违反宪法的事实,如“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著的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他说:“如果党在国家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中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

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 87 条、第 89 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十二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

他说：“不能儿戏国家大事，作为一个统治集团，费了极大的精力制造成一架属于自己的、相当完善的国家机器，为什么不好好地把它运用起来？”他认为“是因为受了教条主义的欺骗！大浪费，是迷信教条主义的代价”。

他举例说：“1957 年下半年，教条主义者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一句话：‘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这句话来自《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是 1918 年 10～11 月写这篇文章的。显而易见，1918 年 10～11 月间苏联的实际情况和 1957 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作风。但它却确实确实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局势，使得我们走上了背离宪法，违反党章，违反政协章程的错误道路”。

这个提案，击中了当时错误路线的要害，有关方面自然恼羞成怒，加重对他的打击。更重要的，1962 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章乃器自然成了阶级斗争的天然靶子。

另一提案是针对受中共支持的黄炎培的。章说我就打他，他的后台出来，连后台一起打。提案为《请彻查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孙晓村宗派对于提案人的诬蔑陷害，做出应有的处理，以申冤屈、明是非，而利统一战线工作的健康发展》。把民建内部多年来的宗派纠葛公开化，它揭露黄炎培的历史和反右斗争中的“右派”言论，说黄和孙晓村共谋“贼喊捉贼”的妙计，把“右派”帽子扣到章乃器头上，“既开脱了自己，又拔去眼中钉”。

民建是由章乃器、黄炎培、胡厥文等共同发起组织的。章乃器起草了民建的有关文件，黄炎培推为主要负责人。1949 年后，民建中央由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三人集体领导。由于个人经历、背景、个性的差别，常常存在意见分歧；对民建的性质、任务、工作方针、组织结构等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冲突。

不用讳言，黄炎培确有辫子供人抓，但他权位高，后台硬，有事就向毛泽东写信。自 1949 年至 1960 年毛泽东给黄炎培的复信就有 17 件。章乃器 1963 年 8 月在中央统战部约谈时说到双方的过错：“过去自以为理直气壮，就难免盛气凌人，但对方作威作福，仗势欺人，岂非更错？如果我应该检查盛气凌人，对方就更应该检查仗势欺人！”

黄炎培说民建对章乃器进行了三次斗争。章乃器说，是对他进行了五次“围剿”。

在几次“思想斗争”中，除了理论上的争议，也不排除宗派斗争的情绪。到了 1957 年反右斗争中，宗派主义的味道就更浓了。据章乃器在提案中说，粮食部“党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党对我没有意见了，现在问题在于党外的黄炎培和某老，他们不能满意’，‘粮食部的斗争就会以不了了之’”。

章乃器将他的“右派”问题，完全归结为宗派陷害，有失公道。但，加重对他的处罚，开除民建会籍，同民建内部的宗派斗争不无关系。

七、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成了右派以后，撤销了一切行政职务，整天无所事事，对章乃器是莫大的打击。满腹学识，一腔热情，不能使用，不能发挥，爱国有心，出力无门，是何等痛苦！自 1958 年 1 月到 1963 年 12 月，章乃器先后向周恩来写了 13 封信，除陈述对国内外大政方针的批评意见，对本人冤屈的申述外，也不断提出工作要求。但是，从我找到的资料看，直到周恩来辞世，没有一字的回音，直到章乃器告别这个世界，也没有一个“为党为国出力”的工作机会。

章乃器虽被驱逐出政治舞台，失去了发表意见的讲坛，也没有了施展才华的场所，但他仍手

不释卷,读了大量书,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反右斗争后,党和国家在极“左”路线上渐行渐远,他致信周恩来“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误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他于无声处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

1962年底,章乃器根据他接触到的材料和事实,结合自己的处境,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经验教训,他称为“总结经验的尝试”,共十六条,其中包括“党制造了完善的国家机器而让它闲起来,事事以党的名义去做,是赤膊上阵,有点回到原始时代去了,在理论上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不尊重自己国家的法律,专靠发指示,搞运动过日子,这样必然会造成上下交困的局面;没有严格的法律精神,党纪也一定废弛;无法无天的情况是危险的,今后发指示,搞运动都必须根据法律。等等。

他甚至继续批评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章乃器对人说:“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旁,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

章乃器还赞同议会道路,认为阶级斗争是无穷的放矢,文化大革命是发神经病。章乃器虽被贬谪居,但他仍不失爱国君子的本色,发出了穿透历史、警示后人的声音。

在狂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章乃器被卷入浪底,他虽然拼命挣扎,未能浮出水面。但他始终不服,坚信“政治上还我清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当他划为右派,受到处分后,就在家挂上自撰的对联:“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他期待实践和时间,来证实自己的清白。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然而,时间老人,步履维艰,公正裁判,迟迟难决。待宣布为其改正平反时,章乃器已离开人世三年了。由摘帽到改正也经历了五年的纷纭

复杂的过程。

(一) 毛泽东:人无完人,为他摘帽

1974年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想到要特赦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同时也想到了右派分子,首先想到了章乃器。1975年4月毛泽东指示摘掉章乃器右派分子帽子。周恩来批示“摘掉帽子,如承认错误很好,不承认坚持原来意见也可以,继续当反面教员。如要去海外,我们欢送,如留下,我们安排。1975年4月27日,陈云、张劲夫、李金德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室找章乃器谈话,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谈话中指出,1957年以前他为人民做过好事,解放后的安排是适当的……1957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向党进攻,而且长期坚持右派观点,错误是很严重的,戴上右派帽子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希望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坚持右派观点,可以当反面教员,愿意到海外去,可以送出去,愿意留在国内,可以安排好生活。章乃器说,我当了17年反面教员,不想再当了,也不到海外去,五七年犯了错误,是个很大的教训……表示愿意检查错误,吸取教训,继续为人民做好事。陈云最后说,你今天表示承认错误,还要检查错误,我很高兴。检查要准备好,要很好学习,把自己的问题整理整理,不要急。毛泽东看了谈话简报,又问:“还有个林希翎呢?”

1975年国庆宴会名单中,原有章乃器、梁漱溟、周扬、夏衍,但未实现。国庆后,当时的学部,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简报,反映知识分子对一批文革中被靠边站的老知识分子参加国宴欢呼雀跃的情况,毛泽东看了批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周扬、夏衍、章乃器、梁漱溟参加就更好了。如鲁迅还在,他也不会同意把夏衍、周扬关这么久。”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为“右派分子”章乃器平反,只是从“人无完人”的视角,想到了他当年表扬过的粮食部长,在国民党内帮共产党做事的第一人。自此之后,章乃器的日子好过多了,生活费也由文革中的每月50元恢复到150元,还准备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为财政部顾问。但因当时党内斗争尖锐复杂,“四人帮”的横行肆虐,所有安排,均未能实现。

(二) 由不予改正的第一人,变为改正的第一人

197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了关于处理27名上层爱国人士右派改正问题的请示报告报请中共中央审议。报告提出,27人中,拟不予改正的有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6人,其余21人予以改正。

同年11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中央统战部的报告上批署意见:“此件影响较大,还有个别人的问题有争议。建议常委同志仔细看看,改正时要注意什么问题,也需考虑一下,是否要提交常委会或政治局议一议,请华主席、邓副主席酌定”。

1980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耀邦同志:我赞成对二十七人的处理意见,对不予改正的六人,也要说一两句好话。特别对亲属一视同仁。此件在我处四个月,因为我考虑这个问题迟几个月处理较好。现在五中全会开过,可以处理了。邓小平,三月二十二日”

胡耀邦签署意见中的“还有个别人的问题有争议”,这个别人,是谁?就是章乃器。什么问题上的争议?不用说,就是改正还是不改正的问题。谁提出争议?胡耀邦没有说,也无从查考。据传是陈云。他坚持认为章乃器不应划为右派。这些传闻是有根据,有道理的。陈云不仅管经济,对章乃器在解放后的工作情况很了解,而且历史上就与章乃器有较深关系。章乃器弟弟张秋阳与陈云是商

务印书馆的同事、同志,一起参加上海的武装起义,陈云从长征途中撤退到上海,首先找的是章乃器。从历史到现实,陈云对章乃器是心中有数。邓小平虽然批了“赞成对二十七人的处理意见”,即章乃器维持原案,当得知陈云意见时,也就批准改正了。这样,到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章乃器由原来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第一人,变成予以改正的第一人。

非常遗憾的是,章乃器没有盼到这一天。一纸改正右派的决定,他没有得到手,却于1977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他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金融货币理论、理财思想,仍是丰富的宝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值得借鉴、挖掘。他关于党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在现实生活中更有重要意义。

1982年5月,中央统战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举行章乃器“骨灰安放仪式”,将章的骨灰由八宝山骨灰堂第三室移入第一室。同时由《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章乃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7月予以改正”。这就向世界证实了章乃器18年前说的那句话,不是他认错,而是中共纠偏。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欢迎订阅2012年
《同舟共进》月刊

邮发代号: **46-56**

可直接汇款到本刊发行部或到当地邮局订阅

订阅价(含邮费):
每期10元,全年120元(港澳地区300元)

地址:广州市明华一路66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编:510600
电话:(020)38308908
传真:(020)38308918
电子邮箱: tongzhongjin@163.com

专题策划 · 民富:中国新思路 ·

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再穷不能穷百姓
——重视治国不可行
“国富”如何变“民富”
“小河有水大河满”
——对话江平教授

历史上的中国为何没有“富民”传统
中国的问题是钱怎么花

焦点关注
最聪明的官员也做不到的事

公众话题
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教育应告别封建思想
我为自己的女儿忧心

灯下话旧
蒋氏父子在溪口的最后日子
林彪夺权海军内幕

人物春秋
胡适: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1980年代的曹禺与巴金

以史为鉴
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得与失
1922:苏俄知识精英被逐出国门

文化广角
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恩怨”
舟边絮语
忽然想到——关于口号
商鞅改革的启示
腹无良谋的晚明“智库”

十年砍柴
丁学良
陈季冰
崔永元
王长乐
杨建业
王凡
吴殿卿
李开林
李辉
陶短房
徐元宫
张扬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安立志
陈鲁民

· 以上为《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部分目录

张执一与隐蔽战线工作

○ 张惠卿

今年5月5日是张执一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领导人，也是我十分敬佩和敬重的老革命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张执一奉中共中央华中局之命，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以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形势变化，党中央取消了起义计划，执一就留在上海和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张承宗等一起领导上海和江浙地区的地下党，展开一系列活动。他机智无畏，为解放战争，特别是渡江战役和京沪地区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7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后，张执一先后领导了上海局所属的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和策反工作委员会，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我当时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名普通成员，组织关系开始属外县工委，后转入策反工委。李正文、周克、王锡珍（当时化名陈约珥）等同志都曾是我的领导，而他们的上级领导人就是张执一。他们组织实施的所有重大行动，都是在执一的直接指挥和亲自领导下完成的。

从1948年秋天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已完全处于劣势，国民党中的许多军政人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寻找出路。他们有的就通过至亲好友，秘密和共产党“搭线”，准备弃暗投明。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为书记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王锡珍、田云樵三同志为委员，周克原是外县工委的副书记，同时也参加策反工作，他们分别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开展秘密活动。

虽然时间已过去六十多年，但我回想起当年的许多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1948年底，张执一得知一个重要信息，以段伯宇为核心的一批国民党将领准备反蒋起义，急于想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段伯宇当时是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的少将高级参谋，1938年加入我党，由负责军运工作的王兴纲派去国民党军队工作，后和组织失去联系。1942年考入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在校内结识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同学，经常在一起秘密讨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他们结业后先后分配到了国防部和其他军事机关，都握有一定的军权，彼此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定期集会，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痛恨蒋介石连年不断打内战，搞专制独裁，深感在这种腐败的政权下，不能为中华民族做任何有益的贡献，毫无出路可言，最后决定弃暗投明，倒戈起义。在段伯宇的引导和倡议下，大家一致同意寻找共产党的领导，投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段通过他的表弟中共党员温尚煜联系到党的关系，反映到策反工委，张执一作了详细了解后，决定派李正文以党代表身份和他们联系。

李正文和段伯宇一见如故，通过段伯宇，李正文陆续会见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干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淞沪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上海铁路指挥官段仲宇（段伯宇的弟弟），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峻，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峤，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樑，少将参谋长宋健人等人。

李正文和他们接头的地点，在虹口宝山路的段仲宇公馆，一栋小白楼的楼上，段伯宇也住在那里，楼下有国民党士兵守卫，十分安全。开始一段时间，李正文几乎三天两头往那里跑，回来后就和张执一同志汇报商议，根据张的指示，再和

他们反复磋商起义的计划和行动步骤。

段氏兄弟、贾亦斌、刘农峻他们原来的起义设想是联合熟悉的所有部队在江浙皖三省，主要在宁沪杭三角地带同时起义，时间选在解放军渡江作战时，起里应外合的作用。

他们已经约好准备起义的部队有：贾亦斌的国防部预干总队，刘农峻的伞兵第三团，段仲宇的港口司令部附属的汽车队三个团，王海峤的工兵第四团，齐国樑的江苏保安总队，宋健人联系的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王修身的第一零六军，青年军方懋锺的二零九师和刘卫的四十一师，以及江西省的保安部队等共有六、七万人。

在段伯宇的陪同下，李正文去了这些部队的驻地，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委和这些要求起义的将领——见面谈了话，实地了解了他们的实力和情况。然后张执一以策反工委的名义派遣党的联络员张文藻、周其昌、汪声明、陈景明等同志分别进入贾亦斌、刘农峻、王海峤、齐国樑等部队。

1949年2月间，上海党组织恢复了段伯宇长期失掉的组织关系，随后又批准贾亦斌、段仲宇、刘农峻、宋健人等人的入党要求，对这些新党员和联络员，都按地下党的特殊组织原则，由李正文单线联系和领导。

但是对于他们的联合起义计划，策反工委和上海局各位领导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研究后，认为条件不成熟不能实行。因为即使加上我党所掌握的其他所有起义部队一起联合起义，也会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而难以成功，只有各自利用有利时机单独起义、分别行动比较合适。上海党组织对贾亦斌所领导的预干总队特别重视，认为驻在嘉兴的这支部队虽然受到蒋军的重兵包围，起义难免失败，但也应该起义。因为这是蒋家父子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王牌“太子军”，是专门训练素质较高的青年干部，用以配备三十个现代化新军来支撑蒋家王朝的擎天柱，可说是嫡系中的嫡系，如果它一旦起义或瓦解，对整个蒋军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必能达到动摇蒋介石总后方基地的作用，其政治影响无可估量。

张执一要李正文向他们传达上海局的这些考虑和意见，并帮他们分析当前局势，重新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们很快取得了共识，完全接受党

组织的这些主张，同时对预干团第一总队的起义时机和方法等作了详细研究，并立即行动。

贾亦斌回嘉兴后，在联络员张文藻的协助下，在预干总队官兵中秘密开展了准备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队长李恺寅、刘异等一批进步军官也积极配合贾亦斌，在学员中展开活动。

预干总队约有近四千名学员，都是一些有文化素质和思想抱负的青年，他们早就对专制腐败的蒋政权极为反感，绝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因此当得知他们一向爱戴的总队长贾亦斌领导他们准备起义时，不禁欢欣鼓舞，热烈拥护。

但是预干总队中也有少数思想反动的军官，他们得知有变，副总队长黎天铎很快向在浙江溪口的蒋氏父子告了密，蒋经国命贾亦斌立即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贾估计去后凶多吉少，不知会被如何处置，但如不去，则将完全失去率兵起义的机会，去后也许还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取信于万一，因为毕竟他和蒋经国私交很深，事情尚未完全败露，尚有回旋余地。经考虑再三，贾亦斌决定还是冒险去溪口，他请示李正文，李和张执一等领导同志研究后，同意贾去溪口。

几天后贾亦斌从溪口安全回到嘉兴，但被蒋介石撤了职，总队长由黎天铎取代。贾亦斌到上海和李正文、段伯宇等同志商议对策，决定尽量拖延办理交接的时间，以待完成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拖延几天可以，拖久了必然引起怀疑。于是贾亦斌就日夜留在嘉兴部队里活动，同组织上的联系，则由李正文去嘉兴和贾见面。

1949年4月5日，李正文在嘉兴南湖游艇上和贾碰面，贾说：这些天整个预干总队沸腾了，群情激动，除少数反动军官外，几乎全体官兵都对贾坚决表示，听他的话，死也跟着他走。看形势这两天不能不把部队拉出去起义了，否则就会丧失时机。李正文代表策反工委同意了贾的行动计划，并立即返回上海向张执一报告。

4月7日凌晨，贾亦斌毅然决然地率领了三千多名学员官兵，制服了黎天铎和其他几个反动军官，以去莫干山行军演习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起义了。他们准备和浙西游击队会合。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后，南京国防部和溪口方面同时接到急电：“贾亦斌叛变，黎天铎下落不明”，这对蒋政权犹如一声惊天霹雳。为除此心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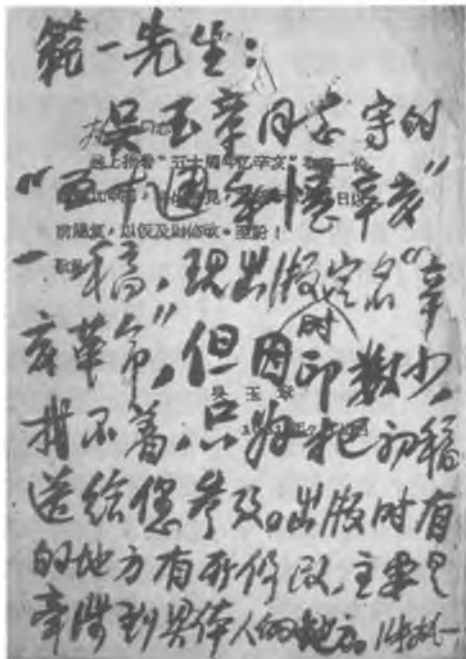
大患，蒋介石急调四个整师和一个军的一部分，以及江浙皖三省的保安部队、交警部队，甚至不惜动用防守“长江天堑”的陆军和空军，以几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设下重重包围圈和堵截线，并悬赏五万银元缉拿贾亦斌。蒋军从空中到地面把起义部队团团围住，拦击在半途上。

起义部队在贾亦斌、李恺寅、刘异的带领下，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牺牲惨重，最终被打散、打垮。贾亦斌逃出重围，身负重伤，进入山区，历尽艰险，最后在当地群众和游击队的救助下，安全脱险。国民党的报纸则大肆宣传，说他“已被击毙”。当时张执一和李正文得知后，信以为真，极为悲痛，直到南京解放后，李正文和贾亦斌重逢，真是惊喜莫名，百感交集。李恺寅也死里逃生，回到了人民的队伍。刘异则不幸牺牲。预干总队全军覆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蒋家的这根“擎天柱”倒塌了！这一“从心窝里反出来”的正义行动，震动全国，在蒋军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是对蒋家王朝的沉重打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

驻扎在浦东的伞兵第三团装备精良，共有三千多名官兵。国民党一共只有三个伞兵团，第三团是最精锐的，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信任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断失利准备逃往台湾的前夕，曾亲自召见刘农峻，对他说：“我本人在黄埔，就是依靠一个团起家的。将来到台湾后，就以你这个伞兵第三团做我的卫队，作为收复失地、打败共军的基础”。因此蒋介石三令五申，要调伞兵第三团到台湾。

伞兵第三团的起义工作，早有准备。李正文和刘农峻联系后，发展他入了党，并派去联络员周其昌，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团副李贵田、副排长孟虎、参谋陈家懋等都是党员，协助刘农峻积



张执一手书影印件

极开展起义活动。

起义原准备在解放军解放上海时里应外合，但蒋介石已多次催促该团立即撤往台湾，不能再拖。李正文和张执一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让刘农峻打着奉蒋介石之命撤往台湾的幌子，一出海就调转航向，直奔我解放区连云港。

但连云港和台湾的基隆港不同，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只能用登陆艇。于是策反工委就请段仲宇利用职权调拨了一艘三千吨的美式大型登陆艇给刘农峻。除可以运送该团的三千多名官兵外，还有数百人的空余舱位。伞兵司令部就又

装了一批武器和通讯器材，要他们带到台湾。

就这样，1949年4月15日伞兵第三团的起义，不仅给解放军增加了全副武装的三千多名伞兵（解放军原来没有伞兵，后来我们的伞兵部队就是以刘农峻这个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还凭空得到了这批武器和通讯器材。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起义行动。他们在连云港受到了以谷牧同志为首的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给他们发来了贺电。

王海峤的工兵第四团是蒋军中配备最完备的重型工兵团，全部是美式装备。蒋介石和国防部多次命令，要该团撤往广州。在张执一的指导下，李正文和派去该团的联络员汪声明多次和王海峤商讨对策，最后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声言服从命令向广州撤退，先是制造借口一再拖延，然后在段仲宇的配合下，把工兵团的装甲列车和一批重型机械设备用火车从上海运到浙赣铁路金华以南地带，便佯称机车发生故障，必须停下来修复后才能南下，故意东一辆西一辆地停散在好几条铁路线上，不仅使工兵第四团再也动弹不了，还堵住了浙赣铁路的好几条路段，使蒋军南调部队无法通过。

国防部开始没有弄清情况，一再催促，毫无结果，才发现有变。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下令撤了王海峤的职，并派特务

到处缉拿他。王海峤和联络员汪声明一起跑到香港,转道去了解放区,下属官兵则分散隐蔽起来。这批车辆和装备就这样在浙赣路上躺着,直到人民解放军到来全部接收。

在协助伞兵第三团起义和工兵第四团堵塞浙赣铁路阻挠国民党军运的重大行动上,主管上海一带水陆交通运输的段仲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段仲宇还保护了地下党的一座电台安全转移。当时我方秘密电台遭到敌人破坏,情况紧急。李白电台失事后,有一部备用电台必须火速转移到安全地点暂时存放。张执一又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李正文。当时沿途军警特务检查极严,李正文拎着一只装着电台的大皮箱,雇车、手提都十分危险。他求助于段仲宇。段身穿少将军服,亲自驾一辆贴着港口司令部通行证的军用吉普车,带着李正文和那只大皮箱开到旧法租界吕班路一个约定的党员家中,送到后谁知女主人害怕,哭着不敢收存。段仲宇毫不犹豫地把手只大皮箱拉回宝山路自己家中,放在卧室的床底下,关照妻子:“看好它,无论如何不能动。”不久,又根据李正文的指示把电台送到新的发报地点,使党的通讯联络再次畅通。

段仲宇还会机智地保护了铁路职工的大罢工,使他们得以避免特务头子毛森的血腥屠杀,并对许多地下党领导同志进出上海火车站提供了保护性措施。特别是在解放上海战役期间,他率领了辎重汽车团起义,加入了解放军,并集中大量汽车组成追击部队,输送解放军追歼蒋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上海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件重要工作是联络国民党海军部办公厅少将主任金声,金声也是一位爱国将领,坚决反对内战,革命热情很高,和宦乡是好朋友。他要宦乡为他沟通中共方面的关系。1948年12月宦乡在香港见到张执一时谈起此事,张就要李正文到南京海军部去见金声,并请宦乡将此事通知金声,告知了接头暗语。

当时局势已相当紧张,国民党一些重要军事部门警卫森严。李正文到南京海军部时,只见海军部门口有几十个卫兵拿了上了刺刀的步枪守卫着,门内也有许多海军陆战队士兵全副武装在走廊两旁站着。

李经过传达室通报后,就大摇大摆地在他们中间走了过去。金声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专用的小会议厅和李正文亲切晤谈,并把桂永清的上校机要秘书游侠叫来和李正文见面,说游侠是自己人,早就有意参加革命,苦于找不到关系,他对海军部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可说是一部活字典,海军部的机要都掌握在他手里。

当晚,金声还把驻浦口的某师长李西开带到海军招待所和李正文见面,李西开师长早已决定起义,他非常高兴接受上海局策反工委的领导,要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起义都可以,他还提出愿为解放军提供渡江的船只。策反工委很快就派了一位联络员(复旦大学的学生党员)到了李西开师部。十分可惜的是,我军发起渡江作战时,上海局因未接到中央通知,策反工委未能及时告知李西开和联络员,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前一天清晨就解放了浦口,并立即占领了李西开师部指挥所。李西开和他的部下一枪未放毫不抵抗就缴械投降,和联络员一起当了俘虏。后来经策反工委和李正文证明,李西开师长才作为起义人员对待,这是后话。

金声和游侠在同李正文联系上以后的几个月内,两人经常带着有关的重要情报,从南京到上海约定地点和李见面,这些情报都经由他们两人作过精心整理和分析,详细而具体地把蒋介石整个海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特别是沿海和沿长江的布防计划,包括炮台位置及其兵力、火力配备情况,还有海军部所掌握的其他兵种,如陆军、空军的调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等都一一列出,有的还用地图和图解形式标出来。这些情报立即由上海党派人送往苏北解放军总指挥部。张执一当时对李正文说:“他们这些情报非常重要和宝贵,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特别是他们提供的蒋军沿长江的炮台位置和兵力、火力部署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将起到重大作用。”

张执一通过李正文、段伯宇联系的贾亦斌、段仲宇、刘农峻、王海峤、金声、游侠这些原国民党的进步爱国将领,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朽的。■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王实味在开封女中

○ 沈志平 沈建平

母亲去世已经 35 年了。最近,在翻阅组织部门退还她生前写的文字材料时,我们看到一份母亲写给组织上的自传。自传是 1951 年 1 月 27 日写的。

从自传中了解到,母亲原名叫邓静真,参加革命后,改名叫“叶彦明”和“叶明”,大约是在 1935 年考入开封女子中学,她的英语老师是王实味。这让我们感到吃惊和意外,母亲怎么会是王实味的学生呢?而且母亲走上抗日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王实味的影响。带着好奇,我们走访了昔日开封女子中学(今天的开封第二十五中学),也走访了当年曾在开封女子中学读过书,后来参加革命的老前辈。从她们零散、不完整的记忆片断中,了解到了王实味在开封女中时的情况。

一

河南省开封市省立开封女子中学是 1919 年成立的。据说,这所女子中学最初是由一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出资创办的。1924 年,河南省教育管理部门接管了这所女子学校,更名为河南省第一女子中学。1933 年,学校再次更名为河南省立开封女子中学。

大约在 1936 年初,王实味从上海来开封女中担任英语老师,任教的时间近两年。就是这不到两年的时间,王实味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改变了一些学生的生活道路。

王实味(1906~1947)是

河南潢川人。1923 年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河南省留美预科学校。虽经过一年的英语培训,却因故留学未成。1925 年,他考取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1927 年暑假后,又因故再次被迫辍学。这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他在北京大学结识了女大学生刘莹。他们由恋爱而结婚,一起到上海寻求发展。不久,刘莹生下一对儿女,家庭生活顿时变得拮据起来。王实味依靠翻译作品获得稿酬来维持家用。微薄的稿酬难以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在好友徐志摩的帮助下,他开始为几家出版社翻译图书。这个时期,他译有都德的《萨芙》、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等五部世界名著和《世界文学全集》等。这些翻译作品,均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约有百余万字。由于这些作品的问世,并受到好评,王实味在上海文化圈

开始小有名气。然而,翻译稿酬无法维持全家的生活。

无奈之下,他先北上辽宁,后又两度去山东,一方面靠教授英语,一方面坚持写作维持家用。沉重的家庭负担迫使他不停地奔波旅行,再加上出版社的约稿翻译,困窘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不到 30 岁,他患上了肺结核病,开始吐血。在身体每况愈下,无钱养活妻儿的情况下,不得不把妻小送到刘莹远在湖南长沙的娘家,独身一人留在杭州,一边养病,一边继续翻译作品。穷困潦倒的王实味心里明白,他一刻也不能躺倒,更不能停下来,因为远在长沙的妻小,生



王实味翻译的《奇异的插曲》1936 年初版封面

活需要钱。窘迫情况下，他只有寻求朋友帮助。1936年初，由河南省教育厅的同学引荐，他来到开封女子中学。校长鲁鸿瑾接纳了这位河南同乡，把学校教授英语的工作交给了王实味。由于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一切就绪后他便把妻儿接来同住。

二

在学生的记忆中，王实味是个有学问、有思想的老师。他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还特别熟悉历史、地理和文学。课堂上他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时而谈论时政，时而传授哲理，常常或用英语，或用汉语，把原来枯燥的英语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母亲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学校中，当时最喜爱的教员是王实味，他是我班主任，又是英文教员。因他很聪明，又常谈些旧社会里的黑暗，‘失学’，‘失业’。在抗日战争初期常谈到一些进步言论，故当时他很能吸引一部分进步同学之同情。他对我们说‘青年人应在此时期献身祖国’。鲁迅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谈到红军打游击情形，谈到共产党打富济贫等。我之参加抗战当时受他影响不小。”

王实味教的是英语课，可他非常注重时政。学生们回忆说，他在讲英语之前，总要拿几分钟讲一下时政要闻，然后再转入正题开始上英语。这在当时的老师中是绝无仅有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同学最早是从王实味的英语课上听到的。又如，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挥军南下，入关侵占华北五省的消息，也是王实味课堂上告诉学生们的。每每讲述这些，他都要把自己的看法，通过时事点评告诉学生们。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到开封，开封的几所大学学生奔走相告，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开封女子中学的学生不甘其后，上百名学生自发集会，冲上街头，汇入游行的行列，前往开封火车站展开声援。学生们冒着寒风，有的占领客站，有的和大学生一道，卧轨请愿。这次闹学潮，坚持了四天。运动过后，学生们返校复课。对此举动，官方不予支持，校方又多有微词，似乎学生们做了什么“出格的坏事”。王实味虽然没能赶上和学生们一道走上街

头，声援北平同学，但他一开课，便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们的勇敢行为，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站在学生们一边。王实味的行动，对同学的革命热情是一种鼓舞。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攻击面前节节败退。侵华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国破家亡之际，开封市的大学、中学以及进步青年，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群众斗争中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开封各校自发成立。一时间，歌咏队、剧社在各校纷纷组建。人们通过抗日歌曲、话剧等形式，在街头演出，宣传抗日主张。在这种形势下，王实味也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至今，留在学生们记忆中的是，王实味用很短的时间，写出一部话剧《要落的太阳》。话剧的剧情并不复杂，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告诉人们一个道理，那些举着太阳旗的日本侵略军，不论他们今天多么猖狂，最终是要被中国人民打败的。日寇在全中国人民的抗战声音中，必定是“要落的太阳”。这部话剧很快被同学排练起来，开始在开封街头演出。之后，有的同学把这部话剧带到了北平等地。据当年参加演出的同学回忆，话剧演出后，人们群情激奋，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回去！”……

三

1937年，学校发生两件意想不到的事，使王实味不得不离开开封女中。

一件事是省教育厅给开封女中派来了一名新校长。校长名叫朱纪贲，作风专横，不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采取弹压硬管，对那些有进步思想的学生，竟然采取盯梢、跟踪等特务手段，甚至在学生不在的情况下，私自检查学生的日记和私人物品。新校长对王实味在课堂上先讲时政、后讲英语的做法明确表示反对，甚至提出警告。新任校长的做法激起学生的抗议和反对。但这位校长自有后台，完全不把学生的抗议放在眼里。在这样一位校长手下教书，王实味是无法忍受的。

第二件事是年初，一位教生物的老师，叫阎有训，突然被国民党宪兵从学校带走。学生们并

不知道宪兵抓走阎老师的原因,但是,王实味是知道的。此时,王实味脱党后准备重新入党,他当然知晓,抓走阎老师对于他和其他倾向共产党的老师意味着什么。愤怒之下,王实味竟然在课堂上痛斥国民党当局:“这样的政府,即使日本人不打来,也会自己垮掉的。”当年在课堂上亲耳听到王实味义正词严发言的学生牛凤菊(现名何真)老人说,那天上课,同学们听着讲台上王实味的发言,激动不已,王实味讲到激动时竟落下眼泪,许多学生都跟着老师一起痛哭起来。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王实味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师。那时,王实味刚刚30出头,风华正茂,知识渊博,且上课认真,待人热情,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学生们都把王实味视为学习的楷模。

随着形势的发展,王实味继续留在开封女中教学变得越来越艰难了。他向党组织提出去延安的请求。那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经常被党组织通过半公开的方式介绍去延安。开封地下党批准王实味前往延安。王实味要离开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与老师比较亲近的几位学生,曾主动要求,想随老师一同去延安,王实味没有答应。王实味悄悄离校,先把妻子和孩子送到郑州,后转而南下到长沙,待一切安顿好后,便带了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悄悄离开开封,先到西安,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顺利到达延安。

当母亲得知王实味离校去延安的确切消息后,很不死心,她决心追随老师,参加抗日。母亲的自传中这样记述:

“我校教员王实味在学潮结束前即率领一部分同学到太原去了。当时他走时告诉我们去参加八路军去了。在学校(业)结束后,我曾和母亲商讨打算去找王实味,但母亲说,我年纪太小,应当去上学,把初中的半年读完找工作也不迟。这时,我即和同学伊景云二人于12月初私自背着家里外出跑到新乡,后到晋城(这时的石家庄太原前线已经打得很激烈)。那时很多溃兵,抢、奸,无所不为。再一方面,因交通不便,我们所带路费(二人共带5元)已快用尽,前面的情况又不了解,有人说‘八路军现在还在太原以北’,‘太原很混乱,找人不好找’等。当时我们考虑不知能不能到太原,即使到太原,找王实味也不知一定能找到与否,故发生犹豫。后经商讨先返回开封,找过去的

同学再找线索,参加抗日工作。故在12月16号又南返开封,经过我母亲劝说即到当地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开封服务所投考,结果被录取。在开封进行宣传演剧及慰问前线回来的伤兵等工作。”

事实上,母亲想随王实味去延安的要求始终没有被答应过。因为当时母亲的确年纪小,个头矮,所以,每当母亲对老师提出要求时,王实味总是耐心地说:“你年纪还小,应当多读书,等长大些,学到了本事,再去延安也不迟。”

王实味离开开封女子中学后,母亲参加抗日的决心已定。在学校里,她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到达河南信阳,参加军委会的战地服务演出剧社,后做地下交通员。根据组织安排进入中原新四军五师抗日根据地,后在湖北云梦地区坚持敌后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随部队解放天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她一直从事《天津日报》、《河北日报》、《渤海日报》等报纸负责农民部的工作。60年代后,担任过天津地委档案处长、天津地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务。

王实味在开封女中担任英语教师的时间并不长,从1936年初到1937年9月,满打满算,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是在这短短的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给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过王实味讲课的学生们,都深深地被他那充满革命主义的激情和渊博的知识所感染。可以说,王实味启蒙了许多同学的革命思想。据后来统计,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开封省立女子中学先后有30多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在当时是罕见的。

在延安审干中王实味受到了批判。以后,他的学生常常带着复杂的心情,向组织交代与王实味那段特别的师生关系,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母亲在自传中关于“入党前的思想转变及入党动机”如实地写到:“在抗战初期,由于我校英文教员王实味的介绍,对共产党、八路军发生了好感,及至参加了开封青年战时工作团后,感到那团体中的民主气氛较好,对女同志也不是像军委会服务团那样歧视,自己感到很好。”这或许是母亲被带上革命道路的最初动机吧!■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质疑“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期”说

○ 张光明

2011年第7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何方先生的《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一文。我完全尊重何先生写作此文的良好用意，对他以年迈之身大力呼吁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深感钦佩。但很遗憾，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硬伤”，笔者踌躇再三，本着对历史、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写下后面的文字。

第一，何方先生提出：“按照恩格斯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为代表，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主张暴力夺取政权。”

恩格斯是否有过“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期”的说明？这个问题暂且放下，稍后再谈。我首先想指出的是，何方先生所列举的“马克思主义前期”“三大名篇”，便已经与事实不符了。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全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发表于1850年）。写这两部著作时马克思不过30岁出头，如果一定要依照何先生的“前后两个时期”划分法，这两部著作大约还可以算做前期作品。

《哥达纲领批判》呢？这是马克思于1875年4~5月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的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批注，此时他已经57岁。该文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之下，直到1890~1891年才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第一卷第18期。马克思其时早已去世，恩格斯的生命也只剩下最后四年多（1895年逝世）。所以，这一著作历来被公认为马克思的晚期作品，怎么会被划入马克思主义“前期”的“代表”之列呢？

再，读过《哥达纲领批判》的人都知道，其中没有一处直接使用“暴力革命”的字眼，此文的主

旨也根本不在这里而在别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讲暴力革命的文字多得很，但这篇文章却并非谈暴力革命、“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的代表作。

第二，紧接着，何方先生断言：“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按：指‘前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用一句著名的话给否定了。这就是他说的，‘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不错，马克思晚年确实说过这么一句话。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1页）

马克思的著名传记作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有进一步的解释：马克思在去世前一年“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满：‘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脱口说出了一句后来常被一切庸人们所利用的话，即：‘他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973年重排本，第675页）

显而易见，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用来讽刺那些对他的理论不求甚解，却到处拿来胡乱套用的追随者们的，何先生却把它拿来当作马克思否定自己前期“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主张暴力夺取政权”思想的证明了。

第三，现在来看看恩格斯是否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前后两期”的问题。我不知道何方先生是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反正我自己从恩格斯的言论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说法。

近年来学界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依照这

种说法,恩格斯晚年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革命转向改良,放弃了先前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从而开辟了日后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何方先生下面的话即是对这一说法的简略概括:“另据恩格斯的解释,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其中明确宣示放弃共产主义理念,可惜列宁生前没有能看到这一重要文献)。”

这样说来,恩格斯是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导言》中作出这样的解释的?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恩格斯写于1895年的这一《导言》,在总结1848年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关于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的道路和策略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严格说来,也并非新的,此前他已经在不少文章中谈到这些看法),对利用议会和合法斗争的策略寄予了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和更高的评价。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仍然不止一次地谈到未来的“决战”,并宣布说“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2页)。他只是根据新的条件看到,对于准备这一决战来说,合法斗争的策略要比不问时机冒冒失失地诉诸街垒战更加有利。他预测,合法斗争的成就将会越来越大,发展到最后,统治者将会被逼得走投无路,从而自己起来破坏合法性。那时无论在实力上和道义上社会主义政党都将占据上风,在决战中获胜的希望将会更大。恩格斯的全部意思就是如此。只要不是预先就抱定为己所用的目的,完全可以看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添加了一些东西,但从根本上并没有放弃原来的东西。

既然连革命的“决战”也没有放弃,既然连夺取政权也没有放弃,“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之说,在这篇《导言》里更是找不到证据的。

何先生也可能把恩格斯的另一篇序言与这篇《导言》混淆了。因为近年来有论者宣布说:恩格斯晚年在给他自己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中,曾声明说“共产主义学说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由此可以证明他放弃了“共产

主义理念”。何先生多半是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却把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的有关文字讹误为1895年《导言》的文字了。

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恩格斯的误解。事情的真相,现在让我们也来考察一下。

恩格斯在1886年为美国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附录、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导言里和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中都讲了这样一段话: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里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们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阶级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3~424页)

这段话对许多学者来说并不陌生,我本人也很早就读过它。但它传达给我的并不是恩格斯晚年“改弦更张”,提出了什么“共产主义有害无益”的新论点,而是如下信息:晚年的恩格斯对他自己的早期作品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把共产主义解释为一种超阶级的普遍解放事业,这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有害无益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原作里,“共产主义”通常指的只是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公共所有,这与我们后来关于共产主义是遥远的未来之美好大同理想的解释在意趣上是不同的)尽管在抽象意义上的确是把包括统

治阶级在内的一切人都解放出来,但它在实践中只能由工人阶级通过与有产阶级的斗争去实现,原因很简单:有产阶级出于自己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这一事业,而工人阶级恰好由于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地要去推动这一事业。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情况很清楚了:恩格斯晚年“明确宣示”的是批评自己早期的“抽象人道主义”,主张的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阶级斗争思想,也就是说,他和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以来的一贯思想。我们的一些论者对恩格斯这段话的整体思想未能深察,只是掐头去尾,置上下文于不顾,抽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的字样,解释成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理念”,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全新的发现推荐给读者了。(这个新观点近年来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并获得了不少呼应,却很少有人指出其中的误解)何方先生这里所讲述的,也就是这个与恩格斯的本意截然相反的“恩格斯晚年思想”。

所以,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前后两期之说,无论从哪里寻找,都是找不到证据的。

第四,“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是根据“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吗?

第二国际建立于1889年。此处不必详细援引有关的文献,只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够了:在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上,会场上悬挂着的标语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从政治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权,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前期思想”代表作中的主张吗?

至于说到“欧洲社会民主党”,我愿指出当时最重要的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这一纲领经过恩格斯的审核和肯定,被公认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纲领的范本。只要稍微读一下该纲领的理论部分(由卡尔·考茨基起

草),就完全可以明白,其中阐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要求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革命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总体而言,曾经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换言之,当时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所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放弃共产主义理念,主张和平过渡”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而正好是主张工人阶级必将通过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一“主义”——按照何方先生的说法,这应该属于前期马克思主义。

第五,何方先生说,列宁生前没有看到过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言外之意是列宁由于未能了解“后期马克思主义”而使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此说在我看来同样是得不到史实支持的。

恩格斯的《导言》在写完后不久就发表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期和28期上,随后又收入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中。为防止被德国政府利用来当作制定新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口实,经过恩格斯的同意,编辑对该导言作了一些删节(全文直到1924年才由梁赞诺夫发现并予以发表),其中最易引起革命联想的地方的阐述有所削弱,但通过合法斗争以准备革命决战这一总的思想脉络仍然是不难看出来的。1895年时列宁25岁,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当时他对德语已经掌握得相当好了(除了听说能力还差一些),是完全有条件迅速读到这篇导言的。有什么根据断定列宁不但当时、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读过这一文献呢?

所以,恕我直言,何方先生引用来支持自己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之说,是无法得到史料支持的。而任何不能立足于可靠事实的主张,都是很难经得住检验的。何先生的意图固然值得特别敬重,但在柏拉图与真理二择一的时候人们当然只能选择真理。民主这个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是不能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的。

附:何方先生给张光明教授的复信(通过郑异凡教授转交)

非凡同志并转张光明教授：

我完全同意张教授的批评和说明。我在受命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用点马恩学说以增强说服力。糟糕的是，并没有查阅马恩文献，包括恩格斯的《导言》。而只是靠六七十年前在延安学理论留下来的一点印象，就是‘马恩学说与时俱进，后期对前期有很大发展，也有不少修正。这种靠多年前的印象谈理论问题，既不严肃，也必说错。为

正视听，建议张教授的文章公开发表。专此奉达，并盼珍重！

何方

8月14日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代购代邮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本书向读者揭示在绝密档案背后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内容涉及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档案机构解密的档案资料，通过解密尘封档案里隐藏的人们不曾了解、不能想象的真相，这些真相有的惊心动魄，有的曲折跌宕，有的委婉悲情，有的扼腕叹息……。

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历史，用独特的方式为读者提供留存的真相。引人入胜，不愿释卷。

杨继绳著《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版再版，对社会阶层固化、阶层冲突、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大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新的剖析。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吸毒者、性工作者、罪犯等社会群体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了改革前后三十年来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利益诉求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变化发生，还指出了这些群体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本书批评了当前种种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指出了走向社会公正之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为了达到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目的，就得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即：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作者以极为新颖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历史，——通过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参加者——那些动荡事件和受其影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叛逆者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本书选取了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沈从文、梁漱溟、徐志摩、丁玲、老舍等，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富强中国的不懈追求，揭示了他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本书被费正清教授誉为“西方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亲历民主：我在美国竞选议员》作者为美籍华人，2009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与弗吉尼亚州议员竞选，她亲身经历了西方民主选举的全过程，为读者展示了美式民主最为真实的操作细节。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一位英国记者亲身经历的辛亥巨变，这是一位在华普通的外国人对当时时局的切身感受，作者第一时间采访黎元洪、唐绍仪、萨镇冰、张彪、胡瑛等辛亥风云人物，最真实客观的记述那段人所共知的革命历史。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四套)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目《档案》栏目组编	114.00	12.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8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	58.00	8.00
文人陈独秀	石钟扬	39.00	7.00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	金 雁	48.00	8.00
普列汉诺夫·陈独秀·顾准	靳树鹏	30.00	6.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帝国崩溃前的影像——晚清连环画中的晚清社会	荆诗索柯岩	55.00	9.00
聆听历史细节	王 凡	36.00	7.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译	58.00	8.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缅怀——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访	38.00	7.00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著	32.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大学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张闻天在 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 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

○ 胡新民

《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刊登了茅于軾先生《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一文（以下简称茅文），认为“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我引用的资料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和美国华裔学者、中国近代史权威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这两本书在中外史学界享有盛誉。特别是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可谓权威之作。另外，还引用了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的有关内容。

茅文认为“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其主要事实是“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在笔者看来，只要了解上述事实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发现，这并不能算是中国站起来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个积弱积贫贪腐无能的政府。之所以能取得茅文中所列出的“辉煌”，尽管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站起来”这个国际地位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当时国际上强权政治交易下产生的副产品，也更是被美国作为战略棋子摆弄的成果之一。这种靠强国，主要是美国双手扶持起来的站立，一松手就

会跌倒的，能算站起来了吗？

先看郭廷以关于上述事实的有关论述：“中国虽为同盟国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美国惟望中国无条件追随，英国对中国的轻蔑与妒忌，兼而有之。”^{注1}“中国沿海沿江条约口岸及要城，为日本占领后，美英在中国原有的特权实际多已不能享受，复以日本声言愿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间，英美亦宣布，战后将与中商谈取消在华特权，尚不肯立时废止。中国要求改善在同盟国的地位不遂。一九四二年五月，熊式辉主张中国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宋子文反对，胡适不甚热心。六月，熊改向白宫行政助理居里献策，谓美国对华援助物资有限，正应取消不平等条约，给以精神鼓励。美国政府认为这是惠而不费之举，经与英国交换意见后，十月九日，国务卿赫尔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准备与中国谈判放弃在华特权及有关问题的条约，另订新约。同日，英国亦有此表示，继之为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注2}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表述：“未能受到平等待遇”，“惠而不费之举”，“精神鼓励”。接下来“（一九四三年）十月，美、英、俄外长会于莫斯科，发表战后共同建立国际机构宣言，中国因美国的支持，亦得列名。美、英、俄曾商定三国领袖会议，罗斯福邀蒋委员长参加。斯大林藉口苏俄未对日本宣战，未便与蒋相见，于是改分两地举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会于开罗，这是中国参加的仅有的一次同盟国首领会议。”^{注3}

蒋介石参会，看似风光，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看出这个风光基本上算是徒有其表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会于德黑兰，斯大林力争开辟欧洲战场，待击败德国后，苏俄即对日本作战。丘吉尔劝罗斯福收回对蒋的诺言。罗斯福

以为如获苏俄的合作，不惟可早日结束战争，战后一切计划，亦可顺利实现，中国地位无足轻重。”^{注4} 这里最后一句就是列强们，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由此也就随后产生了三巨头做交易，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私自成立谅解，将中国出卖，雅尔塔协定，中国再被出卖，罗斯福忘记了四年前他与丘吉尔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中的未得有关人民同意，不得改变领土的原则。斯大林更不顾一九一九年苏俄对华宣言中的放弃帝俄在满洲及其他地方掠夺的利权与租借地的诺言，且将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中的苏俄承认外蒙古为中国的一部分，中东铁路主权概由中国处理的条款置诸脑后。中国虽为同盟国之一，命运依然由强国决定。”^{注5} 由别的强国决定命运的国家，是难言站起来的，不是吗？

再来看看徐中约的有关论述，你就会明白，中国是怎么被美国作为战略棋子，“恩赐”给了中国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从1937年7月战争爆发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中国都是独自进行抗战。尽管它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了同情、道义支持和一些小笔贷款，但唯一给予中国实际援助的国家是苏联。”^{注6} 而当时的美国热衷于和日本搞市场经济，因此“毫无疑问，日本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它在中国的战争行动。”^{注7} 后来日本竟然向美国开了战，美国自然也开始大幅援助中国。美国还同意“给予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较高地位。罗斯福总统感到，通过给予中国体面的奖赏，中国会加强对敌作战。”^{注8} 美国对中国的奖赏，一直是基于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的。

徐中约对此作了深刻的解析，他写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放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更大背景中、特别应根据美国对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态度来进行考查。尽管在公开场合大讲中国的友谊，但美国政策的长期目标，肯定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或依恋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国对战后东亚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实际考虑之上。华府想要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美国在其中将占据支配性的地位。然而，由于欧洲是战后全球关注的核心，美国人便想到用最低限度的

资源投入来达到他们在东亚的目标。这样一种政策要求与该地区的一个大国结成坚强的同盟。1944年，国务卿赫尔推想中国将占‘任何安排中的中心位’，但他也认为中国只有一半的机会成为一个大国。随着赫尔从国务院退休下来，以前担任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怀有公开的亲日情绪的格鲁（Joseph Grow）出任代理国务卿，他倾向于将复兴的日本看作是美国中意的选择对象，如果证明中国不能充任它在美国战略中指定的角色的话。”^{注9} “如果中国能够符合他们的设想，就值得美国予以支持，如果不符合，一个复兴的日本也可以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支撑者。”^{注10}

“美国的长期目标，是鼓励发展一个有能力抗衡苏联，并对美国资本渗透开放的相对强大而友好的中国。华府认识到，无论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还是一个将招致俄国渗透的虚弱的中国，都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因此，罗斯福总统推动让中国成为大国之一的构想，而国务院也鼓吹帮助造就‘一个统一的、民主进步的和合作的中国’之政策。正如国务院在1945年指出的那样，这个目标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中国将‘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事实上，早在1939年，财政部官员便声称，中日战争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在未来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的大好机会，我们将获取中国战后重建工程的大头……处在和平状态下，并由一个复兴的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美国商品和企业的大好市场。’”^{注11} 由此可见，没有美国这个棋手动子，中国这颗棋子想要自主动弹一下也是难之又难的事情，又怎么能独自站起来呢？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中说得更直白：“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一大国。它在1943年8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年12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

“毛选”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吗？

○ 阎长贵

近年来,在网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经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现藏中央档案馆。该意见称,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这个说法,也被一些研究者采信,比如《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一文的注释中就援引了此说法。

必须指出,这完全是一个谣言。中共中央有

关部门已经发表声明,表示了态度。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2011年)5月25日电(记者刘倩):近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就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的提问。

记者:前一段时间,一些网上流传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文中说,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就《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书面报告。请问有此事吗?

新闻发言人:你说的这篇文章,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全篇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注12}

这里或许引用得太多,但是如果只引用了片言只语,恐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只能请读者谅解。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史学研究是相当有主观性的,不同的史学家有自己的主观标准,但史学界公认的权威人士的著作应该还是代表了主流的观点。就像茅于軾先生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撇开抗战后的中国国际地位实质问题不说,再来讲讲这个人民是否站起来了。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徐中约一针见血地写道:“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生

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注13}在人民的主体被“抛弃”的时代,恐怕不能说他们站起来了。

注释:

注1至注5分别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475页、475~476页、477页、478页、489页。

注6至注11、注13分别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1月第一版(注:该版本关于抗战期间的内容与港版一致)第481页、481页、483页、511页、512页、512页、517页。

注12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324页。■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就《毛泽东选集》的原稿审核、考证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

可以看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三个单位的新闻发言人,已经说清楚根本不存在。

毛泽东作为活跃于中国革命历史和政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领袖人物,不管他犯有多大错误,包括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无疑应该和可以批评、批判,甚至严厉的批评、批判,但没有能否认他会写文章,并且是写文章的高手即大手笔。就毛泽东会写文章和勤写文章说,在同辈的诸多领袖人物中恐怕无出其右者。编造毛泽东不会写文章,而贪他人之功,掠别人之美,来贬低毛泽东,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基本尊重。

关于写文章(以及怎样写文章),毛泽东不知讲过多少次,做过多少次指示。就拿他自己写文章来说,1964年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曾经讲过:“有的人,自己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写了我又改,改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我们的一切都要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这也是劳动,要亲自动手。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周总理出国,一出三个月,到哪个国家也要发表公报,都叫他写不行,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转引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谁都知道,毛泽东1948年1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其中就特别要求:“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不能否认,在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也有例外,虽然那是比较个别的。比如,毛泽东在“八大”所作的开幕词就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在“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所致开幕词,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篇幅只有2000多字,多次被掌声打断,会议中间休息时,许多人都还对开幕词啧啧称赞。毛泽东高兴、坦率地公开告诉大家:“开

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也有文章,如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毛泽东在延安和几个同志合写的,这在该篇题解中有说明。毫无疑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文章绝大部分(恐怕还不止六分之五以上)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或起草的,或根据他的报告和讲话整理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文章(不说编辑出版问题——众所周知,有个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成员包括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不少人;现在我们只说文章本身),不能说每一篇,但无疑有很多篇都是吸收很多人(包括中央负责人)的意见写成的。比如,毛泽东自己前面说过的收入第四卷的1947年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因为他生病,他说别人记的;他还说:“写了我又改,改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应该说,文章的这种写作过程,是所有写文章的人都懂得的。同时,应该指出,一至四卷《毛泽东选集》收录的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并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和基本的著作,是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结晶,但现在(特别是现在)看来,并不是每篇文章的观点都正确,还可能有写作方面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过要说,这和毛泽东会不会写文章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谣言的流传告诉我们,搞研究,写文章,在使用资料上,不论国内的,还是境外和海外的,都要慎重审视和辨别,看它是不是接近和符合事实;如果拿不准,宁可不用,千万不要上那些花言巧语的当。我觉得有的严肃的学者有时在这个问题上也做得不够谨慎,轻信这样的流言和谣言,这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记取。■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我和辛亥革命的缘分

○ 李 锐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虽然我晚六年才出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人物留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不解之缘,也可以说给我不少影响。这个话题要从我的父亲说起。

一、父亲与凌容众

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抽屉和小柜中有许多书籍,还有几张照片。我印象深的除《饮冰室文集》、《玉溪生(李商隐)诗集》(三种颜色字体线装本)外,就是黄兴、宋教仁、秋瑾的《荣哀录》;一张较大的黄兴照片,父亲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有一本很厚的大型精装本《民国之精华》(1916年由日本北京写真通信社出版,日人佐藤三郎编),内收民国初年参众两院443位国会议员的小传,每人占一页,中日英三种文字,有照片,前面有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照片、传略,以及日文中华民国议会史。约三百字的李积芳(父名)小传,开篇是评语:“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谏言。”后半是简历:“前清时,以湖北仕学馆学员,由张文襄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经纬学校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归国应学部试,授法政科举人,辛亥武昌起义,回湘任法制局参事,筹办地方自治,旋组织湖湘法政学校,兼充公立法政各校教员。二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当年参议院议员代表地区,每省选十名;众议院议员代表人口,八十万人口中选一名(湖南27人当选)。

关于父亲去日本留学的情况,1980年出版的《黄兴年谱》援引和《湖南文史资料》第十辑刊登的“凌容众日记”,有较详细记载:1905年1月间,平江四人同长沙一批人,“于武汉会齐,九十三人去日本。16日乘轮离汉度过阴历除夕,4日

抵神户,5日抵东京。”1905年2月11日记有除辫事:“早起改装剪辫,小溪(父亲号筱溪)继之。”“未初,偕小溪赴富士见楼,因开会欢迎孙逸仙也,不期而会者千余人。警察原限准三百人,继许九百人。楼中只能容千人,踵门而退者殆又数百人。……日本之白浪滔天演说云:吾倾家以谋中国之革命,不成,无以为生,为优人以求食。所以不忍饿死者,欲留一命以见支那之革命也。”当年除辫是一件大事,在留日学生中也只有少数人做到,这表示革命精神,同清廷的决绝。凌容众和先父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到日本,还没有上学,就先除辫明志,这说明他们在国内早已接受了黄兴、陈天华等的反清革命思想。因此,同盟会成立后就加入了,成为第一批会员。(头两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863人中,湖南籍最多,有157人)他们的生年都差不多:黄兴、凌容众1874年(31岁),陈天华1875年(30岁),宋教仁、李积芳1882年(23岁)。父亲一生重视教育,在日本安心读书七八年。当年留日学生万余人中,因多入速成科的学校,进大学而毕业的为数较少。

1905年冬,日本政府循清廷之请,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陈天华蹈海自杀,以绝命唤醒国人。(陈是1903年从湖南到日本留学的,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革命白话文小册子,影响较大)一批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其中湖南来的有凌容众、秋瑾(她的丈夫是湖南人)等十多人。随后大批留学生都回国了。1906年凌回到家乡,宣传革命,毁家兴学,创办启明女校,第一班8个女生中,有我的母亲和李六如的元配夫人钟桓英。父亲从官费中省出钱来,帮助妻子上学。我母亲可说是辛亥革命前受过现代教育、有思想的女性,父亲的为人处事和他的朋友交往,童年时就常同我们三姊弟谈,尤其谈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友情,启发我们如何求学做人,

向父亲学习。回长沙居住时,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湖南督军兼省长赵恒惕,同吴佩孚勾结,委父亲以重任,他坚辞不就,过年过节送巨款也退回去,常同母亲谈寄希望于广东出兵北伐。

二、我家与黄兴家

辛亥革命,黄兴居功至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直到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多次起义的直接领导者,黄花岗之役负过伤。当年孙中山、黄兴是并列齐名的。讨袁(世凯)失败之后,孙黄之间曾有意见不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强迫入党的人按手印,服从他的领导,黄兴拒绝加入,以致国民党当政时,曾长期“扬孙抑黄”,不宣传黄兴的革命事迹。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开黄兴纪念会时(大概是因湖南黄兴故居修建开放而召开的),我将这个情况谈了。父亲加入同盟会后,同黄兴、宋教仁等成为好朋友。母亲同我谈过,黄兴1916年去世时,父亲悲恸不已。后来同黄的大儿子黄一欧常有往来。1949年回长沙时,我去看望过一欧兄。我进米龄(88岁)时发表过“仰怀黄公”绝句两首:

壮志未酬公不言,遗容常伴书案间。

儿时岁岁麓山顶,好友相携谒墓前。

民主先驱世仰瞻,恨无实践替公传。

我心一事差堪慰,两代知交过百年。

黄乃(原名黄一寰)是黄兴的遗腹子,我的终生好友。我们在长沙著名的楚怡小学同班,都是高材生,跳过班,毕业时他第一名,我第五名。大革命时我们都是学校童子团活动的头头。每年春天,学校安排学生一天郊游,总是到长沙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爬山。黄兴的坟墓在山顶上,我同黄乃年年必到此拜谒。他1936年到日本留学,重走父亲的路,参加左派留日学生的活动,1937年6月被日本警署拘捕,由父亲的日本好友营救出狱。1938年他就到了延安,毛泽东还接见过他。我是1939年底到延安的,当晚看《日出》预演,在礼堂门口碰见了,真是喜出望外。在延安六年,我们无话不谈,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他在总政敌工部,冈野进(野坂参三)领导他编《敌情》、《解放日报》的副刊。他会写文章,精通日语和世

界语,还会吹口琴,跳舞时参加乐队。抢救运动中,我被关在保安处,博古并不同意逮捕我,问过黄乃对我的看法,黄认为我绝对没有问题。他是高度近视眼,1949年后就失明了,负责盲人福利会工作,专心研究并创造新的盲文。晚年我们同住一栋楼,他的客厅中悬挂着他父亲写的两个大字:“笃实”。1988年他70岁生日时,我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少小同为童子团,毗邻共度古稀年。

六秋相饮延河水,廿载睽违冻雨天。

依旧镜心观世界,革新盲字吐叽篇。

常叹大器才难展,却有精神海内传。

黄乃去世后,我为他的文集出版写过一篇长文。

黄乃的大儿子伟强是油画家,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他画了当年近百人物的头像,从加拿大回国,同百位将军写的字幅一起办纪念辛亥百年的书画展览会。9月10日在世纪坛开幕,请我参加并讲话。我讲了父亲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关系,他们都是追求民主和宪政的先辈,我念了为《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写的那首七律,最后高呼:辛亥革命一百年,宪政施行依旧难。

三、父亲与宋教仁、谭延闿

父亲同宋教仁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同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同班,宋是法律科。1987年宋教仁诞生105周年时,他的家乡湖南桃源县政协出纪念专辑,让我写篇纪念文章。我在文章中谈到,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顽固派曾屠杀湖南维新人士一百余人。随后黄兴、宋教仁创建了华兴会,以后和兴中会、光复会合并到同盟会。1903年他在武昌读书时,即致力于组织革命团体。辛亥革命以后,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醉心于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以争取国会议席的多数,成立责任内阁。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力量太弱,迫于形势,让位给袁世凯。宋教仁作为追求“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这一理想的代表,想利用宪法和议会去约束“独夫当国”的袁世凯,实现中国破天荒的民主政治。宋教仁学识渊博,尤长于写作。间岛问题发生时,立即出《间岛问

题》一书,为清廷交涉取胜起了作用。他精心研究日本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专门著作。他深知舆论的重要,在日本时,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主持《民报》(上世纪50年代初在湖南时,父亲的老朋友、原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将他在日本收藏的全套《民报》送给了我,1952年我“投笔从工”转业时,将这全套《民报》送给了田家英)。随后在上海办《民立报》。辛亥革命前,他是黄兴在国内多次起义的助手;辛亥革命后,他就成为推行民主政治、实施宪政的热烈鼓吹者。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他奔走各省,协调南北,联络政党,全力进行竞选活动,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理由众议院选出,主张省议会有立法权,省长民选。他又擅长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国会选举结果,参政两院的国民党人占议席多数,组成国民党一党内阁,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几乎成为举国定论。1913年初,他在汉口演说时有这样的一段长话:“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拿出铁血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当时即有谣传,袁世凯要对宋下毒手,他对朋友说:暗杀之事,防不胜防,只有处之泰然,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励同志们的奋斗。在国会开会前夕,3月初,袁世凯急电邀宋教仁入京,“共商要政”。3月12日深夜,他由上海动身,在车站被手枪击倒,此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都在身边。

宋教仁可说是民国主张并努力实现民主宪政的第一人。武昌起义后,《民立报》社论即指出,革命党人中“牟私利之人多”。章太炎公开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南京政府刚成立时,由于宋同立宪派张謇、汤化龙、熊希龄有来往,深受同盟会中人的攻击。他的“调和南北,只希望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的思想,不为同盟会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宋教仁之死,全国哗然,这一事件缩短了袁世凯的政治生命。我在纪念文章结尾写了一首七绝:

独夫子弹震神州,恸哭人才第一流。

谁道英雄长寂寞,民权社会共千秋。

宋教仁被害之后,父亲怀着深切的悲恸,到北京出席国会,在国会中为宋教仁的理想,积极活动,在北京生活了六七年,我们三姊弟都出生

在北京。我出生后,张勋复辟,解散国会,父亲就单独一人到广东,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非常国会。辛亥革命前,谭延闿属立宪派,在湖南任推行宪政的谘议局议长,同父亲就有交往,这时同谭延闿(以及孙洪伊、周震鳞、覃振等)过从更密了。谭延闿在广东送我父亲的四幅字条,上书苏轼《张先词跋》“张子野诗笔老妙”这一大段话,一直挂在家中,儿时是能背诵的。父亲去世时,谭正闲居在上海,我的五叔父特带我到上海去见过谭,行鞠躬礼后,谭摸着我的头,问候我的母亲,并赠送二百元奠仪。1999年4月,到南京参加“五四”八十周年会议时,我和老伴曾特到谭延闿墓前行礼。

关于谭延闿当年的情况,我还知道这样一件往事,毛泽东和蔡和森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款,住在北京杨昌济家时,杨让他们去找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写了封介绍信(称蔡、毛为“天下之奇才”)。章就将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汇来的二万元汇单,交给了毛泽东。

母亲同我谈过当年在北京国会开会时,议员们意见不同,争论激烈时,甚至摔起墨盒,后来墨盒就被钉死在桌子上了。国会旧址还在新华社总社院子内,现在没有人关注这些议会旧事了。

四、六如老伯

当年同父亲关系最密切的平江同乡除凌容众外,还有方维夏和李六如。方比父亲大三岁,参加过华兴会,也是1905年到日本的,入东京农业大学,立即参加同盟会的活动。1911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任第一师范学监,是毛泽东的教师。1925年到广东,由李六如介绍入党。1931年从苏联回国后,派到苏区工作。1936年在湘赣边牺牲。母亲同我谈过,父亲去世时,方维夏曾伏棺痛哭。方的二女儿曾在苏联学习,与蔡畅同班。母亲同方一家母女四人常有来往。现在平江县长寿街办有维夏中学,竖有方的铜像,我题写的校名。

李六如的原配夫人钟桓英,同母亲是好朋友。母亲同我谈过1920年前后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毛泽东常到李家,毛不讲卫生,钟桓英常给毛洗长褂子。李六如比我父亲小五岁,1907年二十岁的时候,他结识了同乡凌容众,从凌那里知悉陈天华蹈海事件,并看到《民报》、《游学译

编》、《嘉定屠城纪略》等反清报刊和书籍。从此，投笔从戎，1908年到武昌参加新军，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刘复基（武昌起义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组织文学社，为负责人之一，从事士兵运动。武昌首义时，他被黎元洪委为第四镇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参加了阳夏之战。由于不满意标统职位，又觉得自己年轻，想出洋深造，几经请求，黎元洪终于同意，赠他三千元出洋费，每月另拨官费八十元，还补了一个“陆军少将”头衔。

1912年到日本后，他热心议会政治，进了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一心读社会科学书，如《社会问题十讲》、《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还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很深。1919年10月毕业回国后，曾有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从事过这方面的活动。1920年到长沙教书，倡导平民教育运动，成立了全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方维夏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给他许多帮助。他编辑了四本通俗的《平民读本》，于1922年出版，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四本小书曾风行一时，一连印了四版，几万册。1921年李六如先入团，后入党，还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赴广州，为党办的湘江学校募款，从而结识谭延闿、邵力子、覃振等人。他在谭延闿任军长的第二军军校中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北伐时，他任第二军第四师（师长为张辉瓒）的中将党代表，方维夏为第五师（谭道源师长）的党代表，军党代表是李富春。

1930年到中央苏区，他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红军长征后，被留在后方办事处，经常随着部队在赣南山林间转移，经常掉队。1935年在一次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他被认为再拖下去，会白白送死当俘虏，于是项英命令他和他的夫人王美兰离开苏区，给了一笔路费。这笔钱在过赣江时，几乎全部被白军搜走，流落到吉安后被捕。由于白区报纸刊有他的照片，被捕后受过种种酷刑，他守口如瓶，终被判处极刑。他于是向当年老友、时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的覃振求援，覃振立即给江西省长熊式辉写信，得以释放。因此1937年8月就到了延安。在延安曾担任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他目睹江青专横跋扈、反复无常，服务人员十分为难，敢怒而不敢言。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他将大家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对江

青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一次汇报，正当他同毛主席谈话之际，江青走了进来，有些话被她听见，当即大哭大闹。此后他就离开了这个职位。

我到延安后，立即去看望六如老伯，过去只听到母亲谈父亲同他的亲密交往，以及举家关切之情。他突然见到这个外貌酷似乃父的故人之子，自然十分惊讶和意外高兴。至今我还记得那表情和满口乡音：“呵呀，呵呀，想不到，想不到，你的姆妈好吗？”在延安六年中，我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一二次。延安生活苦，每去必留餐，“打牙祭”。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1942年要写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特地去找他谈过他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对他的一生才有较多的了解，六如伯是我们党有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及其曲折的经历，在清末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典型的。难怪他后来非写出一部《六十年的变迁》不可。他幼年丧父，母子靠借贷维持家计。他虽然饱读经书，获得应县考的资格，但两个弟弟只能当学徒。后来这两个弟弟和儿子，都被国民党杀害了。

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时，除了黄乃为我作证外，六如伯也为我作了证明。“抢救”中的过“左”做法，他向组织提过书面意见。保安处曾派人来向他调查我老家的情况，问我的父亲是不是红军杀掉的。我是在长沙读的小学 and 中学，老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六如伯比我熟悉得多。老家的亲属中，有人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也有些妇孺死于过“左”政策。有他的证明，这类谣传一下澄清。其实，我到延安时写的《自传》，老家的重要人事，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奇怪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我受批斗时，康生仍在造谣，说我这个人“有杀父之仇”。后来知道，六如伯向调查者再一次辟过这个谣，并对我父亲作了评价：是当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人士，如果活下来，也会赞成共产党革命的。

解放后，六如伯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书记。1952年初，他回到阔别25年的家乡。当时我在湖南省委工作。我的母亲自己做菜，举行家宴，请六如伯吃饭，当年平江人老红军陈再励（省民政厅长）、曹瑛（长沙市委书记）和陈长簇老伯都参加了。这时我正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搜集资料，他知道我的这个计划后，

谈到他在延安整风时，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发现自己一生同中国革命历程，竟是如此紧密相连，因此写了《自传》之后，就将自己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认识，写了许多札记，这个包包在离开延安后，一直随身带着。这次到湖南来，也附带收集有关资料。这就为我写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四本《平民读本》也是这次借给我的。五十年代在北京，我整天忙于事务，看望六如伯反不如在延安的次数多了。《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出版之后，他在扉页题签，送了一本给我，至今保存着。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六如伯。1979年初回到北京，去看望黄克诚，才知道这十年中，加上六如伯，我们三个人归“专案一办”同一个人管。八十年代初，听说他的夫人王美兰仍住在北池子故居，于是去看望她。二十多年睽违，彼此还能认得出来。我们谈了大半个上午，才知道六如伯去世前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从报纸或广播中得知江青又发表讲话时，六如伯就向老伴叮嘱，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应付最坏情况的发生。1967年康生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时说：“李六如是叛徒、反党分子。”还补了一句，“就是写《六十年的变迁》的那个李六如”。“反党分子”的罪名是由于六如伯参加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被推为主编。这当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了。至于“叛徒”的问题，自是指1935年江西被捕之事。这件事，过去六如伯没有详细同我谈过，只说到是由覃振营救救出狱的。1970年，83岁的六如伯和他的老伴，被流放到桂林，过着软禁的生活。林彪摔死后，1972年返京，长期生病得不到正常的医疗，终于日渐恶化，只好回家待毙。最后病危时，夫人到附近借一辆三轮车，将老人拉到医院。咽气时，六如伯拉着40年共患难的老伴的手，用发硬的舌头，喃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神情极其凄苦，最后，流下两行泪水而停止呼吸。时在1973年4月10日。

五、我采访林伯渠和张曙时

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194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我还采访过林伯渠和张曙时两位老人，《林伯渠谈辛亥革命》、《张曙时回忆京陵》都刊载在10月10日的报纸上。林老和张老都参加

过同盟会，同林老谈了四个小时。他是1904年到日本的，入弘文学院。最初受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参加了孙中山到日本时开的演讲会后，立即加入同盟会。还讲到孙中山讲演的主要内容所举的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铁路是个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他不赞成当年宋教仁、黄兴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的政治活动，“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

张曙时辛亥前在南京法政学院读书时，就参加了同盟会，并从事新军活动。“那时只要能与同情革命的军警联络，便是最好的革命工作，知道革命一定要靠武力才能成功。”学校教员在讲堂上也公开谈革命，黄花岗事变后，大骂清廷腐败。他详谈南京和扬州等地起义的情况，以及同盟会改国民党后，各地的分部都极其松懈，什么人都拉进来。

六、母亲对我的影响

父亲当年的朋友，同辛亥革命有关系的人很多，母亲也很熟悉，她非常敬重这些朋友，同她敬重父亲分不开。父亲去世后，母亲32岁，立下决心继承夫志，将三个子女教育成有用的人，虽然生活困难，决不能回老家吃租谷，让儿女成为游手好闲的子弟。母亲常对我们讲起与父亲有关的往事，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谈过做大丈夫的古训：立言、立功、立德和不淫、不移、不屈，虽然年幼时还不能完全领会。前面提到的《民国之精华》对父亲的评价：“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谏言。”我在母亲的教导下多有继承，一生受益颇多，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每当遇到大事，我不会突破良知的底线。尽管一生处于做人当与党员的冲突中，我宁可受罪受苦，也不违心地去作不正当之事，伤害他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回忆文章的原因。■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天台“犁豆事件”始末

○ 郑普顺

1978年11月25日,《浙江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浙江台州天台县平桥公社党委强行犁掉黄豆造成减产的消息以后,在台州地区,尤其是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的同志说,《浙江日报》刊登这样的报道,我们做农村工作的还要不要按计划种植水稻?有的说,“以粮为纲”是我们的方针,大家都去种黄豆,还有谁去种水稻,我们要不要吃饭?有的同志直言不讳地说,报纸这样宣传是对我们做基层农村工作的泼了一盆冷水,以后还有谁去做工作呢?有的同志甚至说,以后记者来,黄豆给他吃就是了。然而,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的农民却认为,这是一桩利用职权搞瞎指挥的事件,如果这样领导农业生产,农民即使讨饭也无路可走。

孰是孰非,是一场激烈的争论。

作为《浙江日报》台州记者站的记者,我当时是参与调查和采访这桩事件的亲历者,现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1978年7月底,《浙江日报》收到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一封来信,原信是这样写的:

今年我们大队有些田地因没有肥料,地势又较高,种早稻收成没有保障,而土质又适合种黄豆,所以种了黄豆共有100多亩(经调查实种80.4亩)。6月中旬(经调查应为5月下旬),正当黄豆长得整齐健壮的时候,公社党委书记某某突然来到我大队,责令我们必须几天之内将黄豆全部拔掉种早稻。这时,有些地方早稻已经开始出头(经调查,尚未抽穗,但已塞行),再种早稻是根本没有收获的,而黄豆亩产可达到200至300斤。但是某某动不动就要“专政”,我们只得含愤拔了几十亩。但是,某某的话是不能打折扣的,拔了几十亩怎么行?于是公社立即派出拖拉机,到黄豆田里横冲直撞。某某亲自站在田头,想抓出一个

敢反抗的人来。谁还敢说呢?有一个贫下中农愤怒极了,讲了声“自古以来没有这种做法”,某某指挥手下人立即把他抓过来,拳打脚踢,后来还私设公堂。某某还在广场上、田头上、大会上大发脾气,大声威胁:如果长洋大队有哪个生产队黄豆不拔,农业税就要按一亩800斤上交,化肥一亩扣40斤。还在大会上要长洋大队交出一个头头来批判斗争。

结果,100多亩黄豆全部拔光压光(经调查,实为62.4亩),损失了六七百斤黄豆种子,种上早稻,长成什么样子呢?亩产不到200斤,而且还没有成熟。更严重的是影响了晚稻,现在种不下去。季节不等人。今年粮食减产是令人吃惊的。

像某某这样的人领导农业生产,农民讨饭都无路可走。

原信落款为“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贫下中农”,时间为7月27日。

这封来信引起了《浙江日报》的注意。《浙江日报》编辑部办公室立即编发,并且在《来信来访情况》第133期上刊登出来。

1978年9月底10月初,笔者在温岭县采访,住在招待所,突然接到《浙江日报》一位副总编辑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明来信情况以后,要我前去调查,把调查结果告知编辑部。

笔者长期在农村和基层采访,耳闻目睹违背客观规律、凭“长官意志”办事的情况,类似“犁豆事件”并非个别现象:

1978年5月初,黄岩浦北公社先进大队六队社员王法明,因插秧未达到公社要求的密植标准,被公社领导捆绑、关押、游斗、造成王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有的地方,为了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垦荒种粮,造成水土严重流失;

有一个地方国家拨款 20 万元,用工 80 万工修水库,历时六七年还没有增加一寸水,劳民伤财。

这一桩桩、一件件虽不同于“犁豆事件”,但思想路线和社会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不从实际出发,违背群众的意愿,结果引起群众的不满。弄清这些问题的是非,对于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水平、法律观念和工作水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结束了温岭的采访工作以后,10 月初,我立即前往天台县委。汇报来意以后,在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戴中孚的陪同下,来到平桥公社。次日早餐以后,我们首先来到粮管所,查阅国家有关粮食的收购政策,粮豆的比价,出售粮食、黄豆以后国家奖售化肥的政策。然后去公社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到长洋大队时,虽没有看到犁豆的实情,但经过几天田头现场踏勘、找当事人座谈等工作,掌握了基本情况。

长洋大队地处丘陵地带,有六个生产队。全大队有 186 户,759 人,有耕地 614 亩,其中水田 590 亩、旱地 24 亩。社员有种黄豆的习惯。1976 年全大队种黄豆 70 多亩,1977 年也种黄豆 30 多亩。1978 年初,第五生产队社员得悉国家有个文件规定,出售黄豆每百斤奖励化肥 20 斤,超购黄豆每百斤奖售化肥 40 斤,生产 100 斤黄豆还可抵 200 斤稻谷,黄豆每斤价格 2 角左右。社员们算了账:长洋大队土地瘠薄,肥料缺乏,种早稻每亩可收 400 斤到 500 斤,但较费肥料,成本高。如果种黄豆,每亩收 200 斤是不成问题的。黄豆用肥不多,只撒些灰肥就行,既省工又省钱,可折原粮 400 斤,又可得奖售化肥 40 斤。再说,全大队社员养有 70 多头母猪,母猪生小猪以后需要部分黄豆作饲料,社员逢年过节做豆腐改善生活也需要黄豆。同时,种麦以后土壤板结,种黄豆后因为豆根有根瘤菌,豆叶落土肥田,能使农田增加养分,对于改良土壤、促进土壤通风透气很有好处。种豆后,晚稻下种一般也比早稻田种晚稻提前一个星期左右,能够抓住季节,晚稻亩产 600 斤是不成问题的。这样,全年每亩收 1000 多斤粮食是有把握的,从长洋大队的实际出发,社员说,我们种麦、豆、稻,产量不比现在种麦、稻、稻低。通过算账,社员们认为种豆也不错。于是,各队就开始准备种子,其中第五生产队以每斤七

角左右向市场买来黄豆种子 100 多斤。因此,尽管县委要求凡是能种早稻的田都要种早稻,但是,清明前后,长洋大队下种的黄豆仍然有 80.4 亩,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

为了保证早稻种植面积,春耕前夕,天台县委召开会议,县委负责同志在会上强调:为了保证早稻种植面积,凡是可以种早稻的田,均要种上早稻,种上黄豆的要犁掉。这个精神传达到长洋大队时,已是 5 月 8 日了,黄豆已经种下一个月左右。

5 月 22 日,县委一位副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发现长洋大队一片长在公路边的黄豆没有犁掉,立即责成公社党委:这片黄豆田要逐丘排队,可以种水稻的,一律把黄豆犁掉。第二天,公社党委在长洋大队召开现场会议。25 日,又召开 29 个大队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中心议题都是层层表态,统一思想犁掉黄豆,并说两天后全面检查。迫于形势,会后长洋大队有的队就行动起来,其中第三生产队在 24 日就把 4 亩黄豆犁掉改种早稻。在两个会议期间,县委办公室来电催询:长洋大队水田里的黄豆犁掉没有?长洋大队的黄豆种在公路旁边,县委领导车来车往都能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同志感到不执行上级指示不行,思想压力很大,他们向区里反映过意见,得到的回答也是要犁掉。

这时,长洋大队有的同志提出:“我们今年的黄豆长得这样好,有的已经开花了,犁掉黄豆改种早稻肯定要减产。今年就让我们种一次黄豆吧,明年再按计划种植水稻行不行?”公社党委断然回答:不行!社员看公社同志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借口劳力紧张,抽不出劳力来犁豆,想以此拖延时间,保住黄豆。哪知公社党委书记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那公社派拖拉机来帮助你们犁!”

26 日,公社果然派了一辆拖拉机来长洋大队犁豆,公社领导也跟来了。这时 40 多个男女社员涌了上来,有的坐在拖拉机前阻挡,有的手挽手拦住拖拉机,有的含着泪水说:“今年黄豆长得这么好,犁光了我们吃什么?”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对拖拉机手说:“冲过去,冲过去!”于是,拖拉机下田了。刚刚犁了半畦,又被社员挡住,一队社员洪昌兴索性把油门关掉。另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喝道:“谁说不犁的?”一队贫农社员洪宗亮说:

“不犁就是不犁！”随后，他就被公社同志扣留到片的所在地，站立了几个小时。由于社员们继续阻挡，拖拉机手无法操作，只得开着拖拉机走了。

当天下午，公社领导再次指挥拖拉机出动，刚开到长洋大队黄豆田边，又被几十名妇女、儿童团团拉住，没有犁成。

就在犁豆的日子里，公社干部几乎天天到长洋大队做说服动员工作，双方有过争执。其中有些对话是这样的：

公社干部：“你们的黄豆田在马路边，县委领导来来去去都能看到，不犁不行。”

社员：“这是搞形式主义。”

公社干部：“必要的形式主义还是要的。”

社员：“那讲不讲党的政策？”

公社干部：“什么政策不政策，公社党委讲的就是政策！”

社员：“这是瞎指挥！”

公社干部：“这不是瞎指挥，是正指挥！”

社员：“我们种黄豆价值高。”

公社干部：“那种乌烟（鸦片）价更高！”

也就在犁豆的日子里，上级拨给这个公社一批供施三类苗用的化肥。公社利用这个机会，向社员宣布了一项奖惩办法：凡是犁掉黄豆改种早稻的，每亩奖给化肥40斤；凡是不犁黄豆的，每亩扣除化肥40斤。与此同时，公社党委一位同志在干部会上说：“长洋大队阻拦犁黄豆，我看一定有坏人捣鬼，要揪出个坏人来示众！”社员们一怕“示众”，二看在化肥面上，只得忍痛割爱，于29日之前陆续犁掉黄豆62.4亩。这时，“小满”已过一星期了。

结果，这批改种后的早稻，迟插半个月，由于季节太迟，有的秧龄太长，加上高温干旱，生长很差，严重减产，而且引起连锁反应，使晚稻插秧季节推迟，造成减产。损失较大的第一生产队，共种黄豆17.2亩，犁掉的13.2亩，早稻亩产只有150多斤，晚稻亩产只有140斤。而未犁掉的4亩黄豆田，每亩收黄豆250斤，折稻谷500斤，晚稻亩产550斤。损失较小的第五生产队，采用麦、豆、稻耕作制的3亩田，亩产1150斤；犁掉黄豆，采用麦、稻、稻耕作制的12亩田，亩产880斤，每亩少收270斤。对此，社员们意见纷纷。他们说：“‘六十条’规定，种植作物要因地制宜，生产队有

自主权。上级领导这样干，谈得上什么因地制宜，我们还有什么自主权！”有的队还要求赔偿损失。

在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开始整理手头材料。在撰写稿件的时候，却碰到一个问题：5月22日县委副书记下乡检查时，责令公社可以种水稻的田，把黄豆犁掉。这位副书记曾在原台州地委部门任职，笔者与她认识。这个情节，要不要写？写上她是否与她过不去？后来经过考虑，认为我们撰写稿子的目的是帮助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是整什么人，把干部打倒，况且这些同志辛辛苦苦，长期在农村奔波，主观愿望是想把工作做好的，主要是思想方法不妥。只要对事不对人，与人为善，当事人也会觉悟的。经过一番斗争，终于把这个情节写进稿子里去。

10月中旬，笔者在天台招待所成文后，把稿子寄到《浙江日报》编辑部，报社领导看过稿子以后认为可以，原先打算作为《内参》用，后决定公开见报。为了慎重起见，报社特派总编办副主任傅通先再来台州进一步核实事实，做到准确无误。11月中旬，笔者和傅通先一起，再一次去长洋大队。这次我们住在该大队的学校里（该校设在祠堂里），夜里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白天访问当事人。在核实的基础上，对文章作了进一步修改。

1978年11月25日，《浙江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篇报道。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转载了这条消息，并且加了近600字的编者按。编者按说：

这是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农村来信和记者调查附记。这两个材料说明，在有的地方，凭“长官意志”办事，强迫命令，瞎指挥，已经到了叫人气愤的程度，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危害。

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呼声，一味利用职权搞瞎指挥，不仅浙江有，别的地方也有；不仅农业战线有，别的部门也有。十几年来，我们吃瞎指挥的亏实在太大了，教训太深了。有“权”的人说句话就是政策吗？不！不能把“权”和政策混同起来，更不能把“权”和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有的同志眼看群众利益受损失不心痛，眼看群众缺吃少穿不难过，搞瞎指挥顽固得出奇，群众的批评、恳求根本

听不进去。有什么办法能帮助这些同志改变这种坏作风呢？教育，这是很重要的。长洋大队要求搞瞎指挥的人赔偿损失，看来也是一个有效办法。如果有这么一条规定：干部瞎指挥造成经济损失者，要负责赔偿，要扣工资，那么，那些凭“长官意志”办事，搞瞎指挥的人，在作出决定之前，大概就会三思而后行了吧！

我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其中就包括革这种既无知又滥用职权的主观蛮干的恶劣作风的命。不革掉这个命，即使引进了新技术、新设备，要迅速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也是很困难的。我们转载《浙江日报》这篇报道，就是为了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也就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发了这篇报道。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还作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村发展的两个文件。

天台县委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实际，认真总结“犁豆事件”的经验教训，从而统一了干部的思想，避免了重犯历史的错误。

1979年，全国高考政治试题中，以“犁豆事件”为例，要求考生说明其中包含的哲学道理。■

（作者为浙江台州市委办公室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 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

102488 信箱 3 分箱

收款人 崔秀岭 邮编：102488

欢迎订阅2012年度
邮发代号82-688 中国钓鱼

《中国钓鱼》杂志（月刊）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办。创刊于1984年，为全国性垂钓专业刊物，内容以信息量大、实用性强、趣味浓厚而广受读者赞誉。

《中国钓鱼》作者队伍由业内资深专家和经验丰富的钓鱼爱好者组成。各地读者均有很多机会刊登稿件和图片，是广大钓鱼爱好者交流经验体会、分享钓鱼人生的理想平台。

常设栏目有：大鱼榜、库塘钓、江河溪流钓、海钓、野钓百计、竞技有术、我的一招、饵料篇、答钓友、赛事报道、钓协之声、渔具城、名人在线、天下好钓场、钓四方、钓鱼人部落、钓鱼与健康、海外一览、鱼的知识、哈哈鱼、钓鱼漫画、诗歌、摄影、绘画欣赏、鱼拓教室等等。

订阅抽奖：凡于2011年12月31日前将2012年全年《中国钓鱼》杂志订阅单复印件寄（或传真）至编辑部者（请寄：100061 北京体育馆路8号《中国钓鱼》杂志读者意见调查组收。也可将订阅单照片或扫描件发至编辑部电子邮箱：zgdy@vip.sina.com），均可参加1000名幸运奖（钓鱼用品）的抽奖活动。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每册定价10元 全年订价120元

编辑部地址：100061 北京体育馆路8号 电话/传真：010-67158584

欢迎订阅2012年《炎黄世界》杂志

订阅价：96元/全年 48元/半年 征订热线：020-85171214

观点新颖 内容丰硕 报道翔实 印刷精美
赢得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衷心喜爱

炎黄世界



改出月刊后，
又有新的重大改进，做到每期：

一篇介绍广东建设成就的重点报道

一篇有关“时代英雄”的人物特写

一篇针对社会民生的重点评论文章

介绍一位受大众关注的“影视明星”

一篇由文学博士撰写的“历史名士”

新开辟中老年人喜爱的栏目：“时讯短波”、“古体诗词”、“养生保健”（扩大版）。

本刊已打通与海外广泛联系的通道，今后将迅速报道海外华人、华侨的各种讯息。

2012年继续举办“订阅幸运奖”抽奖活动，忠实为广大订户服务。本刊为全彩印刷，大16开本，内文80页，订价较低廉。

全国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46-159

每册定价8元
全年96元

联系电话：020-85171214 85171024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永福路42号永福楼西塔504室 邮编：510095

《内蒙春光》影片风波

○ 朱安平

摄制于 1950 年的《内蒙春光》，因对民族政策的反映出现问题，上映不久即遭“停映”，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进行修改，并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更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后恢复公映，在国内外广受欢迎，曾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奖。它所迈出的第一步虽然不乏坎坷，却成功开启了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之先河。

乌兰夫提议拍摄

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追溯有影响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影片，解放前仅有 1942 年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反映蒙汉团结、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和 1948 年唐绍华编剧、何非光导演的反映台湾高山族、汉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花莲港》。真正关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生产并呈现蓬勃生机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截至“文革”前的 17 年间，此类影片就有 40 余部，其中首部影片是 1950 年春由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即后来的“长影”）摄制完成的《内蒙春光》（后改名《内蒙人民的胜利》），无论在主题思想的确立，还是选用少数民族演员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特性等方面，都对新中国民族电影产生了积极而有益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该片取材于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自治运动，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史实。1945 年 8 月 15 日，苏蒙红军配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兵东北，日本帝国主义者随即倒台。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翻身斗争的浪潮，动摇了内蒙古王公、贵族的封建统治基础。为了统一领导内蒙古人民的解放斗争，于 1945 年末在张家口召开了盟、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

会，派遣大批干部深入各盟、旗做群众工作，积极宣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纲领，组织盟分会、旗支会。影片就是通过对当时比较典型的一个旗工作情形的描写，展示了开辟新区干部怎样团结群众、争取上层、孤立敌人，成功团结蒙汉各族人民打垮了国民党军队进犯的历程。

片中着重借助贫苦牧民顿得布如何从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辨清敌友，终于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的刻画，表现了少数蒙古族群众由于受反动统治阶级挑拨造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影片还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内蒙古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这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内蒙古的封建统治者一直否认内蒙古有阶级存在，外界不了解内蒙古社会也认为草原上是自由天地。事实则是内蒙古曾经存在着非常黑暗、残暴的封建统治，王爷对人民有生杀予夺之权，而牧民连结婚的自由都没有；王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不如牛马骆驼。影片以一定的情节、场面，对此作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

该片系由时任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亲自提议，由内蒙古文工团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而成。因系内蒙古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影片，为确保其创作和拍摄成功，乌兰夫亲自向主创人员交代创作和拍摄意图，亲自主持讨论剧本，直接指派其子、时任内蒙古文工团副团长、后长期主持内蒙古文化工作的布赫担任该片顾问，并要求内蒙古文工团作为重点任务全力投入拍摄工作，在拍摄过程中还亲自给有关盟的领导人打电话，要他们全力支持，切实解决拍摄中的实际问题。“东影”方面也极为重视，选派很早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又曾在延安鲁艺从事戏剧工作、首批从解放区转入电影战

线的王震之、干学伟,分别出任编剧、导演,专门配备了一个很强的摄制班子,包括特地抽调一位技术优良的原“满映”留用日方摄影师参加拍摄。由于乌兰夫高度重视,各方面有力配合,创作和拍摄进展十分顺利,于1949年的仲夏开始外景拍摄,初冬下雪回到“东影”再拍内景,至1950年初就全部完成了影片的摄制工作。

意外突遭“停映”

《内蒙春光》很快通过审查,在首都长安戏院隆重举行首映式上,得到各界领导的好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特赠锦旗表示感谢和鼓励。由于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其主题鲜明,冲突尖锐,情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内蒙古草原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俗特色,当年3、4月在北京、天津一度上映后,令观众耳目一新,很受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文章予以称赞,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作品,无论是主题的积极性和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是我们从过去的基础上跃进了一步。这部影片,使我们看到了内蒙人民的真实生活与斗争,我们希望再拍一部描写内蒙建设影片及描写其他少数民族的影片。”

专程携片赴京的导演干学伟,原曾担心自己第一次执导拍片观众是否认可,没想到上映后获此反应,心里的石头也落了下来。就在他为获悉发行公司因上座很好讨论继续扩大上映而高兴之时,突然接到中央电影局通知,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复审。

当天夜里前来复审的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戏剧电影界前辈,时任中华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阳翰笙。他们与干学伟见面时都很亲切,可看完影片后却严肃了起来。李维汉提出一些具体意见,着重对干学伟说道:“你在影片里虽说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在形象处理上却大量暴露他们,以至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兵败将由抢劫而枪杀……”

干学伟明白是指片中对蒙古族道尔基王爷的描写,不仅表现了其非常残忍,如有踩着奴隶的背上马等场面,而且还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



《内蒙春光》电影海报

和挑唆,将特务暗藏在喇嘛庙里,与之勾结准备派人刺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干部,后来王府遭到国民党败兵的抢劫,王爷抱着金印逃跑不肯松手,被败兵用冲锋枪打死,当即对此作了解释:“我其实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他勾结反动派,引狼入室自食其果。”

但李维汉仍认为“这是在‘借刀杀人’,前面暴露得太多了,后面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并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不利于统战工作,并提出这部影片不宜再映出,最后当场做出决定该片“停映”。

干学伟事后得知,引发复审并暂停公映《内蒙春光》,在于中央统战会议上,西北代表提出此片“把一位蒙古族王爷写得很坏”,“在新区放映与政策不符”。这一意见引起已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乌兰夫的关注。鉴于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还有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尚未解决,涉及民族政策问题的宣传需更加谨慎,应避免让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因此责成有关方面予以过问。后来该片编剧王震之曾

总理力主修改

专门就此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公开检讨,表示“由于对于内蒙人民革命的基本任务没有弄得明确,因而在影片中对于王爷这一人物的处理也是不恰当的,特别是代表着共产党的苏合同志对待王爷的态度,也是不符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我只看到了王公对人民的压迫,和少数民族中的败类通敌叛变的事实,却忽视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者的面前,这样的王公虽然与其本民族的人民大众之间有着矛盾,但是因为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人民就有把这些上层分子争取过来或使之中立的可能。”“虽然我在写这个剧本时,也深感到关于民族问题处理上要十分谨慎小心,但根据这次对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六章的研究,对照着影片的内容,才深感到自己的认识与《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和人民政府对于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谨慎方针,是有着很大的距离。”

那天复审《内蒙春光》结束,阳翰笙在送干学伟回住处的车上,曾安慰道:“小兄弟,别难过……”干学伟虽很感激,回答说:“没关系,再拍一部……”内心却深感痛楚,这毕竟是自己梦寐以求拍成的第一部影片呀!为了完成这部蒙古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影片,干学伟一切从头开始,以强烈的责任心和创作热情,废寝忘食地投入准备工作,特意精心研究了蒙古史,仅蒙古族民歌就收集了几百首,从中抄写一百多首以备影片选用;还深入辽阔大草原五百多里,脚踏实地体验蒙古族生活,看套马、摔跤,参观喇嘛庙、喝奶茶、睡蒙古皮垫子,连牧民的服饰装扮、走路特点、端盘子的姿势等都不放过。后来的选择演员、实际拍摄,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为确保主要角色由本民族演员担任,外形气质既要相符,表演上还能入门,他不知跑了多少路、走访了多少对象。当时拍摄条件十分艰苦,除了经受风吹雨淋、烈日严寒等严峻考验,还要应对人力、物力紧缺严重困难,因电影胶片靠国外进口必须特别珍惜节省,每一个镜头拍摄都必须试拍练习多次,不到成熟程度决不下令拍板开机。他因操劳过度经常失眠,只有靠不停打针治疗维持,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到底,经过剧组全体人员团结苦战,影片才以高速度、高效益完成,不料甫一面世竟遭此意外。

正当干学伟为走上电影导演岗位的处女作夭折而饮食无味、通宵失眠,几天之后他忽然接到电影局通知,说周总理要看这部片子,让他准时出席。这使干学伟感到非常意外和不安,一部电影竟然惊动了总理!更没想到的是这次总理看片,竟使《内蒙春光》的命运又会出现转机。过后他了解到,原来是阳翰笙向总理汇报了有关《内蒙春光》停映的事情,总理指示文化部召集有关人士集体看片进行座谈。

5月7日晚,干学伟准时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放映厅。不一会儿,就来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以及电影、戏剧界的领导、专家阳翰笙、袁牧之、陈波儿、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老舍、曹禺、李伯钊等,甚至素未参与电影的一些作家也来了,比如丁玲、赵树理等,到场的有一百多人,而且陆续还有人进来。后来干学伟回忆当时面对这如此盛大阵势,仍不禁感叹:“那时真是紧张得不知道如何接应才好。”

正在干学伟与赵树理谈话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总理来了!”他急忙到门口去迎,总理已步履轻捷地进入放映厅,电影局长袁牧之、电影局艺委会副主任陈波儿向总理介绍说:“这就是《内蒙春光》的导演干学伟。”总理立即有力地和他握手,并亲切地说:“我看到过你的剧照,这次来看你导演的片子。”干学伟想起自己在延安鲁艺时曾在话剧《带枪的人》中饰演列宁,1942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转交给塔斯社驻中国分社寄往苏联,总理还清楚地记得那张剧照,这使他惶惶不安的心情稳定了一些。

总理同郭老等几位交谈了几句,遂请大家就座先看电影再讨论,并让干学伟坐到他身边。在随后看片过程中,总理还会与干学伟有过几次对话。随着片头字幕出现很多蒙古族演员的名字,总理轻声说:“这么多蒙古族演员,好,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干学伟回答:“有内蒙古文工团的,也有个别同志是骑兵二师的。”总理说:“对,拍少数

民族题材的影片,就要多用少数民族的演员。”在银幕上出现内蒙领导机关办公室时,总理问:“这办公室那么大的吗?”干学伟解释:“内蒙接收了敌伪产业,我们制景时做了一些加工。”总理纠正说:“不要这么大,要朴素!”这让干学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加工”帮了倒忙,当初在内蒙体验生活时,就曾在内蒙党委住过,亲眼看到书记、部长们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和大家一样吃集体的伙食,生活上没有任何铺张。影片放到牧民顿得布去找他的爱人,那个牧羊姑娘唱起牧歌,总理很感兴趣地问:“曲子是当地民歌还是创作的?”干学伟说:“是在民歌基础上加了点工。”总理说:“还是用原来的民歌好!”当看到王爷府宴会一场,干学伟低声告诉总理:“这个中间跳舞的演员是乌兰夫同志的儿媳妇。”总理高兴地说:“噢,他有这么大的儿子啦?!”

影片放完后,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郭沫若首先既真诚又直率地说:“我原来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想用它拿去换一些外汇来呢!现在看来是可以改一改……”不过他提出的却是一个听来简单但令人发笑的改法:让王爷的福晋和国民党特务眉来眼去,结果让王爷发现了,就开始有一些转变,不再跟随国民党了。这令大家哄堂大笑。而洪深和欧阳予倩则认为不能改,在他们看来影片蒙太奇处理构思较严谨,改动起来很难,改不好就乱了。周扬提出为了避免不利的影响,这部片子可以在东边地区放映。田汉表示不认同这一意见,理由是党的民族政策是一样的,不可以某些地区放映不利就选择在另外的地区放映。当总理问邓拓怎么看,他检讨了《人民日报》对于民族政策理解不足。听到有人主张这部影片再过几年再放映,蔡楚生当即说:“电影在技术、艺术上发展都很快,如在仓库里搁上几年就可惜了,损失太大,还是修改的好……”不少人同意这一意见。

听完大家各抒己见,已到深夜两点多钟,周总理站起身来,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着会场,亲切而又略显严肃地用洪亮声音开始发言。他指出,这部影片无疑有它成功的地方,但也有错误的地方。成功之处在于其艺术上的深刻动人和技术上的相当完整。因此成功应归于编剧、导演、演员等工作的同志们。它的错误是违反了《共同纲

领》中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当前我们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对王公、喇嘛,我们主要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今天民族问题的焦点,还是在民族隔阂问题上,这要我们积极开展工作来努力消释。影片中的错误应归于领导。片子文化部看过,电影局属于政务院,我也有责任。最后他宣布这部影片决定修改,并请座上的同志们多提建议,给予积极的扶植。

对于总理的分析和批评,与会人员都感到非常透辟,干学伟更是深受感动和教育,散会后当即向总理表示,一定认真地将影片修改好。

主席亲自更名

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文化部电影局随后又专门召开了“政策与艺术结合”座谈会,对《内蒙春光》的错误进行检讨,研讨如何加深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提高对《共同纲领》的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 1.将王公的罪恶转移到特务身上,将民族内部矛盾转移到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去。如马拖死人,拿刀叫顿得布杀人等场面,由王公的命令改为特务的命令,打工人和骑马的小孩等场面则予以减轻。

- 2.增加一个好的王公,或者给王公加一个好的儿子。

- 3.表现王公本来是好的,但另外有一个控制他的摄政王与国民党特务勾结。

- 4.在王爷府里增加一个奸细,一切与国民党特务勾结欺压人民的事,都是瞒着王爷做的。

- 5.加强对王爷当时所处环境的描写,加强王爷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矛盾,安排使王爷动摇的伏笔,而王爷终于被我们所争取。

“东影”迅即安排主创人员认真进行修改、补拍,全片原有54场戏,改后保留28场,加入重新拍摄16场,以及部分修改的10场。在修改后的影片中,蒙族的王爷由原先与国民党勾结,坚决反共反人民,最后没有好下场,改为在国、共两党之间一度犹豫不决,脚踩两只船,后经共产党人苏合与爱国进步的蒙族上层人士的争取、影响,



《内蒙人民的胜利》电影海报

终于站到拥共反蒋阵线一边，最终醒悟成为党争取过来的对象，而一直受蒙族奸细和美蒋特务蒙骗的顿得布，最后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袁牧之、蔡楚生、陈波儿等电影界领导，自始至终对修改工作予以关心与指导，许多地方都与编导人员一起反复推敲。改拍完成的影片经过文化部审查后，陈波儿又让干学伟再送请总理审查。

干学伟与在片中饰演王爷的白大力一起专门来到中南海，向总理请示对该片修改的意见。总理见到他们很高兴，一起坐下来仔细观看了改拍后的影片，看到片中在争取上层分子方面加强了，其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包括倾向共产党的人物，这样基本上符合了党的民族政策，此前曾提到的关于办公室和有民歌的两场戏也都改拍了，感到很高兴。看完片子后，总理又稍加思索，即表示对影片已没有意见，再请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看一看。

于是，影片又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看了。主席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在前面增加一场戏，先有国民党派特务进草地，这样比较策略，以后有

自治运动的同志才到草地上去。第二、后面抢劫王爷那场戏，国民党兵正要夺王爷印的时候，解放军到了，一下子把国民党败兵抓起来，然后向王爷宣布只要你不投敌，你的生命、财产都有保证，这两句话再斟酌斟酌。不久又传话后面两句话先不动，前面的那场戏还是要加一下，并提出《内蒙春光》的片名不好，让编导自己改一下。干学伟转请主席改一个片名，仅一天后就获告知主席给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最后确定以此为正式片名。

经过精心修改后的《内蒙人民的胜利》，成为一部较能正确、真实地体现民族政策的影片，被列入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影公司举办的国营电影制片厂“新片展览月”展映影片之一，于1951年3月在全国20个大城市重新上映，《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评价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是一部反映我们民族政策伟大胜利的影片。它正确地反映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国内各民族的政策，并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去执行这个政策，才能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并取得伟大的胜利。”后又输送到苏联和东欧各国放映，也受到一定好评，认为“这部影片在政治上具有明确目的性并且是具有极大热情的影片，因此它是有助于解决加强中国各民族团结友爱这一伟大任务的。”并在捷克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编剧奖。

从《内蒙春光》“停映”到《内蒙人民的胜利》复出，该片迭经行政权力干预、却又有幸得到积极扶持，诚如后来有论者所指出的：“这次对《内蒙春光》的批评，虽然也是毫无例外地出于革命功利的考虑，但比较有说服力，比较实事求是。”其影响颇为深远，它在表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予以特殊对待与呵护的同时，亦鲜明昭示任何民族题材的影片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的政治方针和民族政策。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信仰、风俗、习惯，由此成为每一个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自觉恪守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该片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却为此类影片的生产制作起了“导向领航”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小说《刘志丹》第二次被禁情况补充

○ 王晓中

《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刊登了李原的文章《小说〈刘志丹〉的三次被禁》。对小说的第二次处理是在1986~1987年，中顾委有关老同志参与其中。本文仅就当时情况作些补充，希望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地了解事情的全貌，进而做出适当的判断和思考。

小说《刘志丹》可说是“风云小说”。

《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河南许昌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6年和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结婚。建国后，曾先后任职中央监察部专员和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因为这本小说，她的大半生都陷于无休止的纷争中，吃尽了苦头。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工人出版社策划创作出版一系列革命英烈丛书，把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工作托付给李建彤。但因为这一题材涉及30年代西北革命史中的诸多悬案，一开始就在相关圈子里引起争议。小说初稿完成后，同时开始在《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之后引发了一场争议。《刘志丹》成为禁书，李建彤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党籍，成了劳改犯。这是《刘志丹》的第一次被禁。“文革”结束后，被禁16年的《刘志丹》和作者李建彤也重见天日。

一、旧事重提，再起波澜

冤案平反后，李建彤怀着更为激愤的心情，埋头奋笔，写完了《刘志丹》。1984~1985年间，小说一、二、三卷陆续出版，公开发行。

但由于这部小说毕竟描述的是西北革命历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三卷本小说《刘志丹》封面

史，触及诸多矛盾和积怨，且立场观点有失偏颇，它的出版发行，又在相关圈子里掀起一阵波澜。

1983年，中央对西北问题做过最后结论。（西北问题，指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内部矛盾冲突以及1935年西北“肃反”运动的遗留问题。1983年，中共中央责成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解决这一历史悬案。）中央结论的重点是：一，刘志丹、谢子长都是西北革命领袖；二，1935年西北肃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有关负责人是执行“左倾”路线；三，本着“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精神，分

清大是大非，不再追究细节和个人责任，把相关争论停止下来；四，所有在肃反中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中央结论以中委（1983）28号文件通报全党。

在28号文件颁布后，相关老同志们也都不再议论往事，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也基本平息下来。但是，《刘志丹》的出版，旧事重提，在相关圈子里又引起不满。

《刘志丹》是一部人物传记体小说，旨在以纪实手法记叙西北革命史和刘志丹生平。其中，除了刘志丹外，隐去了真实人物的姓名，以及事件的时间、地点。但其所指，凡是过来人都一目了然，不难找出现实中的原型，“对号入座”。例如，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方自强，实际是影射谢子长，另一人物陈宏，实际是写阎红彦。在新出版的三卷本小说中，二人都被描写成刘志丹的死对头，属于反面形象。小说逐一记叙了西北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在感情和认识上流露出褒贬不一的倾向。

1985年,谢子长的亲属以及中顾委委员、原红二十五军领导人贺晋年等人先后写信给中央领导人,认为作者及小说内容背离了28号文件的要求,要求中央予以纠正。

28号文件中曾明确规定:“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必须从全局出发。遇到与党的决议和文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应经中央和中央授权机关审查后发表,不允许轻率地公开争论。”中央有关部门认为,小说《刘志丹》的发表,的确违反了这条纪律。

遵照中央指示,由1983年解决“西北问题”的五人小组成员、中办副主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牵头,召集原“西北问题”五人小组和部分有关老同志再次座谈,讨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习仲勋出席了会议。(五人小组,指1983年中顾委解决西北问题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成员有中顾委副主任、常委李维汉,中顾委常委王首道,中顾委委员冯文彬,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中组部秘书长何载。当时参加解决问题的原陕甘边代表是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原陕北代表是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

在会上,1983年参加解决西北问题的老同志信守承诺,包括刘景范、贺晋年,都没有再就历史问题展开争论,只是就如何妥善解决小说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希望尽快化解矛盾,平息争论,回到1983年中央结论的轨道上来。

座谈会结束后,冯文彬汇集会议意见,给胡耀邦写书面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这份报告认为:

“一,由文化部通知有关单位停止继续发行小说《刘志丹》。如再版,必须由作者根据中央1983年28号文件的精神进行修改。二,由中组部派人,和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一道找作者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并做出适当处理。三,以党史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必须与党的两个历史决议(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一致。凡涉及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必须十分慎重。有关部门要注意把关,防止再出现类似问题。”

正如李原的文章所述,1986年1月12日,胡耀邦在冯文彬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是中央同志审阅和批准了的文件,有关党员同志

必须严格遵守。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

胡耀邦的批示阐述了两条原则:对文学创作的风格和艺术,不要干预。但对党的历史,不应虚构,不能歪曲。当时,胡耀邦的这一批示不仅仅针对小说《刘志丹》,而且对于全党的史学研究和文艺界的创作原则,都具有拨乱反正的指导意义,影响很大。

1月28日,中央办公厅将胡耀邦批示和冯文彬的报告一道,形成中办(1986)14号文件,下发全国各级党政军机构和团体,要求各有关方面和党员作家遵照执行。

遵照中央安排,“五人小组”成员、中组部秘书长何载先后七次和李建彤谈话,说服她执行中央决定,并对她提出批评。

在初次谈话中,李建彤表示愿意接受批评,可以考虑修改作品。3月6日,她写信给胡耀邦作检讨。她在信中说:“自己不争气,出了乱子,惹了麻烦,决心改正,也一定能够改正”。表示准备重新修改小说,把不妥当的描写,不恰当的词句,统统改掉。她请求召开座谈会,以助于自己把小说改好。她还在信中向党组织请求处分。

3月9日,胡耀邦在她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办。”

可过了不久,李建彤又反悔,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意修改小说。5月21日,她又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标题为《陈情和要求批示》。信中强烈表达了她的不满,再次表示,还要原封不动地出版小说。

她说,自己写的是传记小说,是刘志丹的一生,不是写党史,更不是党史资料。她反对中委(1983)28号文件中关于陕北革命是“刘、谢二人共同领导”的结论,罗列了西北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评价,要中央领导回答“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她对几位对小说有不



1957年,刘景范、李建彤全家合影。后排左起:李建彤、刘景范。前排三个子女,左起:刘米拉、刘索拉、刘都都。

同意见的人——点名指责,并说是有人歪曲了、滥用了中委文件,把文件“当作一条棍子”,“把文件庸俗化了!”她认为,对历史问题,“既然有了结论,就应当允许任何人去写。如果什么都不能写,还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成了虚无主义?弄得西北历史和表现历史的文艺作品成了一张白纸,一片荒地?”

她说,我写的不是党史,而是小说,但我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在是有人用封建主义、唯心主义来反对,中央怎么能接受?她质问道,我的小说中写的重大政治事件哪件是假的?哪件没有根据?哪件没有做过结论?她一方面再次否认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影射现实,可又说,既然你们认定“方自强”就是谢子长,就说明我写得真实,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

她还说,从理论上、政策上说,谁也无权规定我写什么、写谁。写什么、写谁,都应该让我自己决定。谁有意见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我!

7、8月间,中组部又委派孟连昆、韩灵二人两次找李建彤谈话,予以劝说和批评,要求她按照原来的承诺及早动手修改小说,然后召开座谈

会征求意见。但李建彤始终坚持先开座谈会,然后再修改小说。还坚决地说,不开座谈会就不修改小说。

8月20日,李建彤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李建彤抱怨习仲勋:“我已经不理解你了。如今,你变了。顶不住‘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者的一再进攻,表现出挨打挨怕了的样子,赶快糊弄。”“你的阵脚一乱,‘左倾’宗派主义者便去喝胜利酒了”。她还说,“14号文件(指中办(1984)14号文件)和宪法、法律挂不挂得上钩?和文艺政策、双百方针、党的生活准则有无违背之处?”“这部书是不应该禁的,越禁人们越爱看!”

她坚决表示:“这次写这个题材,准备一次就写个彻底,把所有涉及刘志丹的问题写清楚,不留给后人。我要放手大胆地让感情在纸上奔驰,一定要挖透。我明白,这个题材只有我敢这样写。”她还说:“写这个题材的人要准备担风险。因为有人惯用各种方法左右我党的政策,搅浑党的理论。”

在《公开信》的后面,她还附上一份《申诉书》。她在《申诉书》中说,要用宪法保护自己的作品。按照“双百方针”,文艺、历史、政治领域里的问题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凭一家之言,一锤定音。由于我们国家有一部分人太封建,才发生了《刘志丹》小说案件。她还进一步提出,有关部门要负责赔偿停止出书造成的经济损失。

鉴于这种情况,10月16日,冯文彬再次邀请五人小组和中组部、中宣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

根据大家的意见,10月29日,冯文彬再次给胡耀邦写书面报告,提议:“一,由中组部和李建彤单位党组织继续对她进行批评,告诫她这种做法是党纪所不能允许的。二,欢迎她实践对耀邦年初的批示所作的承诺。三,如李仍坚持不改,则把她的问题交所在单位党组织处理。”

胡耀邦将报告批转各有关单位,包括中顾委。中组部孟连昆、韩灵又找李建彤谈了两次,她依然不服。

至此,这件事已经牵动书记处、中顾委、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等多个中央机构,一再引起胡耀邦(1986年底之前)、胡启立、薄一波等领导人

的关注,影响面越来越大。李建彤的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和党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相持不下,也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1987年4月,中组部孟连昆再找李建彤谈话。李建彤态度依旧,根本不认错。但她说:“耀邦也下来了,我的事就不提了。”(1987年1月胡耀邦去职)她虽不再到处申辩争吵,但也没有接受组织上的要求。

二、最终再次被禁

1987年4月、6月,贺晋年一再写信给薄一波,要求彻底解决问题,并对习仲勋1978~1979年间发表的有关西北革命的回忆文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6月5日,薄一波在贺晋年的来信上批示:“李建彤的小说问题应按照中央1983年中央结论的精神解决。必要时,可在报纸上公布。习的文章是在28号文件之前写的,可不再论。”同时批示请冯文彬负责督促落实,解决问题。习仲勋在这件信函上批示:“同意薄老的意见。”

可冯文彬给胡后立写信,说他已不便与李再谈下去,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建议请中央办公厅负责督促相关工作的落实。

7月6日,胡后立在冯文彬的报告上批示:“建议由荣高棠牵头,同中组部、中宣部一起研究落实办法。”薄一波批示,同意胡后立的意见。13日,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指示中办秘书局,将薄一波、习仲勋和胡后立的有关批示照转中顾委荣高棠、中组部部长宋平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

遵照薄一波和胡后立的批示,7月26日,荣高棠和宋平、王忍之三人在北戴河开碰头会,商讨解决办法。

经过讨论,三人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坚持执行中办(1986)14号文件决定。仍由中组部派人和李建彤谈话,重申中央的决定,对李进行批评,并约法几章,作为纪律。同时,由中宣部安排,立即停止发行《刘志丹》。在文联、作协传达中办14号文件,重申党的纪律,并对李建彤及小说予以批评。

同时三人认为,如果向社会上公开材料和事实,势必又要旧事重提,并涉及一些人,难免又会引起新的矛盾和纠纷。再说,此事的前一阶段是

耀邦亲自过问处理的,公开争论,难免会引起其他猜测和议论。所以,在报纸上公开的办法还要慎重研究。

会后,我遵嘱整理出三人会谈纪要,呈报中顾委和中央领导人。

这份纪要上报中央后,就没有再看到有关后续消息。李建彤后来情况如何,也不得而知,只是听说小说不再出版了。此事始终也没有在报刊上公开。

小说《刘志丹》在经历了20多年的起起伏伏后,最终还是尘封一隅,还没怎么与读者见面,又被打入冷宫。对它的一再封堵,根子还是西北革命历史遗留的矛盾和积怨。

从1983年中央解决西北问题的历史悬案,到1987年小说《刘志丹》的风波,又历时将近五年,说明争论并没有结束。相关各方都在对历史作自己的诠释,都想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都想从过去的梦魇中解脱。但是,如同过去的50年中为之死去的人们一样,在他们心中,真相依然无处说清,公道始终难以还清。深埋心底的伤痛,至死也难以平复。

这就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的苦难,悲壮而又惨然。而伤害人心的祸根,是残酷的党内斗争。

从小说《刘志丹》的曲折命运可以感觉到,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面对现实,凡有不同立场、不同观点,都很难置身度外,独善其身。尤其作为共产党员,其立场、观点和感情,不但要尊重事实,服从真理,更是必须服从大局,服从组织。凡事顾全大局,统一思想,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铸就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战斗力的法宝,而这其中,又意味着多少共产党人的忍辱负重和自我牺牲。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又过了将近20年,所有的当事人都陆续离开人世,“西北问题”也逐渐风平浪静。2005年,一生坎坷、郁郁不平的李建彤去世,终年86岁。

据悉,又如李原所述,200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刘志丹》一至三卷,公开发行,可不久又再度被禁。■

(作者原担任中顾委办公室秘书)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我的父亲“丁海关”

○ 丁耀琳

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是百多年来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江海关自从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开始设立,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的约定,江海关征税事宜由当时清政府的苏松太(苏州、松江、太仓)道台兼理。1853年(清咸丰三年),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馆,乘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之机攫夺了上海海关行政权,组织海关税务管理会,由英、美、法各派一人担任税务司。从此,象征着国家主权的海关就被帝国主义把持了将近一百年,直到上海解放。我的父亲丁贵堂,在这座大楼里度过大半生岁月,海关有他终身的情结。建国初期他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初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丁海关”,这个称呼,很确切也很形象。

父亲1891年11月18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一个农家,今年是他诞生120周年。幼年时代,祖父发现他聪明好学,智慧过人,就下决心即使贫寒也要集全家的收入送他去读书。先上私塾,后来在家乡上小学和奉天(今沈阳)高等学堂。19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开始在奉天新建的东关模范学校任教。1911年春,去奉天报考了政法学院和北京税务专科学校。五年后,从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被派往安东海关任见习生,从此,开始了他长长的海关生涯。

海关里不屈不挠的斗争

父亲由于中、英文都强,工作又勤劳能干,从见习生很快就逐级上升。1919年他被调到北京海关总署任帮办。1927年调到上海海关任汉文秘书。1928年升任汉文科税务司。虽然升级很快,他看到海关大权完全掌握在洋人手中,心情郁悒而愤慨,总是盼望着能收回海关的主权,为

自己的国家服务。所以当他升到税务司之后,就开始运用自己的职权向洋人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他首先组织成立了一个海关的华籍关员俱乐部,里面有打台球、打乒乓球的场所,有餐厅,还有一个可以开会、演戏、看电影的大厅。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团结了广大中国关员,让中国关员在业余有个谈心娱乐的场所,虽是一件小事,却是海关里从来没有过的。

海关外籍关员的工资远远高于中国关员,还有中国人没有的各种福利津贴。父亲联合了总税务司署的中国关员向洋人交涉。经过激烈辩论,终于争到平等的工资和房贴、煤贴福利待遇。他又组织海关中国员工联合会向洋人提出“提高职权、改善待遇”的要求。得到广大关员的坚持,据理力争,当局终于被迫把几位工作很有成绩却长久得不到提升的中国关员升到税务司的职位。

在一次参加关务署在南京举行的“海关关制审查会议”上,父亲为挽回中国关员的行政管理权和提高待遇的问题,同其他中国高级关员一起,与洋人辩论得面红耳赤。最终还是通过了中国关员与外籍关员原则上平等的权力和地位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洋人的霸权。他在会上还提出:今后,一切海关事务必须由上级关务署同意后,方可执行。他还坚持海关的“报关单”和其他统计报表上,都应该加列中文,打破了海关单据全部用英文的惯例。维护了中国关员对海关的管理主权。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媚外政策,海关里的外籍官员总是飞扬跋扈,不把中国关员放在眼里,父亲的主张和做法经常受到他们的干扰。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了要给日本关员岸本广吉腾出位子,就派时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的父亲出国考察。父亲无奈,只好在1935年

春,以欧美关政考察特派员身份去欧美几个国家考察了半年多。又如1943年美国人总税务司梅乐和退休离职,父亲被委派为代理总税务司。这意味着中国关员可以执掌海关的主权了。但是,昏庸的国民党政府又委派了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派父亲到新疆去建设新的海关。父亲于1944年去新疆,先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塔城、伊宁等五个城市设立了海关并且承担了这五个海关的税务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又派父亲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负责接收京沪区的海关,并让他兼任江海关税务司和浙江海关税务司以及上海浚浦局局长。但是一年以后,李度又委任白立查为江海关税务司,调父亲回总税务司署。

父亲曾告诉我他的祖先一家也是从山东千辛万苦地闯关东来到奉天的。他们那一代的硬汉品性,完全是闯关东时期练出来的,他们热情豪爽,不怕困难,不向强暴低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对家乡东北的沦亡极为痛心,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万分愤恨,决心要以各种方式支持我国军民的抗日斗争。1932年春“淞沪战争”时,父亲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十分钦佩,不仅自己大量捐款,也发动中国关员们捐款,还通电号召各地海关中国关员捐款。

在他的倡议下,全国海关中国关员从1933年起,按月捐献薪金的5%,以一年为期。他们又先后支援了东北义勇军和冯玉祥、吉鸿昌、宋哲元将军在华北的抗日部队,还协助了阎宝航领导的救国会,宋庆龄和斯诺、艾黎等创导的“工合”运动等。他还带动海关中国关员,开展多次临时捐款。1937年全面抗战后,他请阎宝航交了一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捐出二万元支援新四军。他与海关中国员工共捐款五万元,支援抗战和救济难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海关总税务司署曾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岸的详细情况密报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日本宪兵队认为这是“间谍行为”,在1942年3月底逮捕了父亲及海关另一名税务司张勇年。经过了一个月的审问辱骂、殴打,父亲不屈不挠,始终不承认是“间谍”。日本宪兵队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他释放,但仍在暗中严



丁贵堂(1891~1962)

密监视。父亲出狱后,以旧病复发为名回东北老家养病,不想再受日本人欺凌,在好友帮助下,冒生命危险,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辗转周折,终于抵达当时的陪都重庆。

秘密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

过去我们总认为父亲只是一位爱国人士,像他的那些好朋友阎宝航、孙恩元、宁武等一样,却不了解他在解放前好几年已经悄悄地靠近革命,结交了一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那时我经常看到父亲带客人来家,在一间我们很少用的小客厅,关上门并拉上厚厚的窗帘。我和哥哥、姐姐们就会说:“又在开秘密会议了!”并未介意过。直到前些年看到一些报刊登载了父亲参加上海海关起义等事迹,特别是父亲的老朋友夏衍和李正文同志的两篇文章,才恍然大悟,十分感动。原来小客厅里的密会商议的是极重要的、有关解放全中国的大事,难怪上海解放前夕,小客厅的窗帘拉上得那么频繁,原来父亲已经秘密地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而且立了一件大功。

夏衍老人回忆说：“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琨忽然从上海秘密到香港，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同意，特地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一百多年的档案，有一批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国民党政府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十分必要。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很快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明确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头了。”

李正文同志在《丁贵堂在上海立功》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从1941年9月同我父亲结识起，就感到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深感中国海关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一直等待中国出现一个为人民办事的开明政府，收回海关主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他通过父亲的挚友兼同事孙恩元，经常同父亲保持联系。

“1948年下半年，根据上海局的决定，我和孙恩元同志商量，请孙正式向丁提出党组织对丁的希望，直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请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借口，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调拨、让开航路、码头装卸等方面，不要让贵重物资（早已被蒋介石从各地运来上海堆积如山）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外国。1949年3月，我又通过孙向丁提示，希望他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

“1948年春，上海海关总税务司李度逃离上海，海关的大权就掌握在丁贵堂手里，他就可以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了。那时，上海地下党海关总支秘密发动群众，保护关产，上下默契配合。于是，海关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回

到了人民手中。国民党政府曾从台湾先后三次严令丁（当时他兼上海浚浦局局长）把最好最大的‘建设号’挖泥船开往台湾，丁假称该船亟待修理而留了下来。他同蒋介石的物资抢夺战相当激烈，也可以说是解放上海战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解放前的那段日子里，海关所有大小关员都很关心父亲的去留，父亲就毅然宣布自己决定留沪。这个决定使全体关员欢欣鼓舞，父亲并且立即电令全国海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这些措施保证了解放后能够顺利地协助上海军管会接管海关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的全部机构。

最后一个坎

上海解放后，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之后，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

解放后，父亲知道了他的许多好友都是地下党员，他很快乐。1950年，他就把海关总署的人员和自己全家搬迁到北京了。组织上安排他和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同志，住在北京台基厂一号院。两家各住一幢小楼。孔原同志是平易近人的一位党员领导。他和父亲来往频繁，相处十分融洽。父亲很快就向孔原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孔原很高兴，一方面鼓励父亲，一方面劝他要多提高对党的认识，加强党性锻炼，将来一定会如愿。

父亲听从孔原同志的话，一方面主持海关的建设，不遗余力，一方面努力学习党章党纲。1954年和1959年，他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代表。但不幸的事发生了。他晚年患了糖尿病，影响视力，不能多读书、看报、看文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工作，他坚决要做眼部手术。不料手术后由于护理的疏忽，造成了血栓。1962年11月21日晨，他正准备出院回家时，突发肺动脉栓塞，抢救不及而离世，终年72岁。他的骨灰，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作者为北京外文局《北京周报》英文版原副编审）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

○ 朱 正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丁晓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这本传记，从传主胡乔木早年参加革命写起，细细写出他一生的重要经历和重大贡献。正如书名“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所显示的，全书侧重写他这一支笔的贡献。在这一方面，真是写得有声有色。胡乔木真不愧是党内最大也最高明的笔杆子。这些在这本传记里有很充分的反映。

胡乔木这一位大作家并不是为自己写文章，他是为党写文章，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这几十年的历史是很复杂的。这期间党也有过犯错误的时候。这时，胡乔木就要为党所犯的错误作解释、作辩护了。这种文章也更难做，更能够表现出这一位文章高手过人的本领，书中没有注意写出他这一方面的“贡献”，这里补充一两个例子。

胡乔木怎样为肃反运动辩护

1955 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紧接着，7 月 1 日又发布指示，要发动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提出：“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不包括工商联）的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中小学校（包括教职员，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包括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均须无例外地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 页）《指示》对运动提出了这样坚决的要求：“在这次运动中达到在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中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

分子的目的。不完成任务不要收兵。”（同上书，第 135 页）

从这个《指示》里还可以看出这一场运动的规模：

根据七月底（一部分单位是八月初）三十二个单位（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统计，已在一百零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九人中展开了坦白检举运动，共已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二万九千二百三十名，另反革命嫌疑分子一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名……（同上书，第 134～135 页）

肃反运动，顾名思义，是要在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的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中小学校（包括教职员，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包括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中间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来。查出一个，可以算是运动的一份成绩，如果把一个人列为肃反对象却不能将他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就不但不是成绩，而是一宗错案，一个偏差了。肃反运动正是一个错案率极高的运动。1957 年整风鸣放期间，许多人纷纷诉说自己肃反运动中所受到的委屈。

为此，《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8 日）发表的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0～569 页），为肃反运动辩护。这真是一篇只有文章高手才写得出的文字，能够把缺点和偏差解释为成绩。这篇社论列举了四项“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成绩”，第三项是这样说的：“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130 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在给这 130 多万人做出并非反革命分子的结论之前，必定都曾经立案审



查,也就是说都划入了肃反对象的,要不然,他就无案可定了。这些人在经过坦白交代、清算斗争、内查外调等等这一系列必经的程序之后,他还是不够不上定案为一名反革命分子。所以,肃反运动对于这 130 多万肃反对象来说,是肃错了。

弄出了这样数以百万计的错案,为什么胡乔木反而要将它算作肃反运动的一项巨大成绩呢?他的逻辑是这样:对于这些肃错了的肃反对象来说,“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如果真是这样,当然应该算是一大成绩了。经过几年来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有一些人被改造成为丧失了是非之心、放弃了自尊心、愿意逆来顺受的驯服工具。这样才能够凡事退一步想,使自己多少求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不过万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改造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事实上并不是很多。否则,鸣放整风期间就不会有那么多肃反对象出来诉说冤苦了。

胡乔木在《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社论中,谈到肃反运动的第一项成绩是:“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在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

一千多名。”这才是真正的成绩。对于“八万人”这个数目,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辩:

另一种人承认肃反运动有成绩,却以为成绩太小了。他们说,“搞来搞去没有搞出多少反革命分子”。在他们看来,八万人的数目是太小了,值不得“小题大做”。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难道一定要八十万个,八百万个,才值得我们兴师动众去肃清么?

孤立地看“八万”这个数字,是不好说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拿“八万”去造句,“竟有八万多”和“不过区区八万”都可以。如果拿 130 多万肃错了的肃反对象作比较,就不能不承认这八万人的数目是太小了,真正值不得“小题大做”哩。只要学过小学算术就能够算出来:以 130 多万加八万一千多做分母,八万一千多做分子,1955 年肃反运动的错案率高达 94% 强!后世史家都要感谢胡乔木写了这一篇社论,它用官方的数字准确地表明了 1955 年的肃反运动有多么大的偏差。

肃反运动中的错案,像《七一指示》特别提到的潘扬集团和胡风集团两案,潘汉年一案,已于 1982 年 8 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平反昭雪;胡风一案也已于 1980 年 9 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本人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都属于最大的错案之列。一些名气没有潘汉年、胡风这样大的人,也有不少平反的,只因为不是名人,不为人所知罢了。这里可以举周维斌一案为例。这是胡乔木写的《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社论里列举的表明肃反运动成绩的十个案例中的第一个案例:“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而在《百年潮》杂志 2007 年第 2 期上朱元石写的《〈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一文中指出:“这是一件冤案。周维斌不是一个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为革命做了大量秘密地下工作,特别是为中共接收哈尔滨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周维斌(1907~1993),辽宁辽阳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加入苏联极东情报组织,1936 年赴苏联学习,1937 年被派遣回国担任苏联远东军青年突击队小队长。1939 年春被日军捕获,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无期徒刑。日

本投降后出狱，被推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不久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1946年4月28日苏军撤出哈尔滨，中共先头部队在周维斌等地方干部的配合下及时进驻哈尔滨市。1948年他改任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1955年8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职位上被捕。1958年4月15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18年，刑满后在辽宁凌源农场就业。1985年平反。胡乔木写的社论是将这一案例作为典型，来证明开展肃反运动的必要性的。朱元石的这篇文章表明，这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由此可见这一场肃反运动是如何颠倒是非，颠倒功罪，诬蔑无辜的。考虑到后来平反了的这许多错案，当年肃对了的就更不足6%了。

肃反运动，这一个历时两年，直接打击了140万人的大运动，错案率高达94%强的大运动，在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完全没有提到。在历史学家胡绳主编、实际上是由胡乔木终审定稿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也无一字记载，就像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避免提及的态度，是不是可以认为反映了内心深处对肃反运动的评价呢？

胡乔木怎样为斯大林辩护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斯大林，从而开始揭露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表示了必须有所变革的意向。

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决心为斯大林辩护。4月5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12月29日又发表由胡乔木执笔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竭力为斯大林辩解：“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须的。”（《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512页），不但为斯大林辩护，还要为产生了斯大林的制度辩护。断言“斯大林的错误

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同上书，第509页）

不是制度问题，那么发生斯大林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胡乔木在这篇文章中说：

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同上书，第511页）

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就写了一篇《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来反驳胡乔木的这篇文章，指出这里的“全部论证在逻辑上不过是同语反复，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个人崇拜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崇拜的流行”，他说，“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据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8页）

多年之后，胡乔木本人也承认了他的这种提法是缺乏说服力的。1980年他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这篇讲话中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这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民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就解释了吗？”（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还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论点：“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见《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509页）

这个说法并不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在高度专制的体制下，经济生活不可能正常运转，不可

能不出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斫丧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外行领导者的无知,计划中的高指标无法完成,所有这些因素使得物资匮乏,在居民中滋长了不满现状的情绪,于是要为经济工作的失败寻找替罪羊,拿一些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技术知识分子来开刀,说是经济生活中的困难是因为他们组织了怠工之类的破坏活动。斯大林也为此制造了几起冤案,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对这些宣传性的审判作了颇为详细的介绍。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转述一点,希望知道详细情况的读者可以去看原书。这本书中说到的,有:

1928年5月到7月的沙赫特案件,涉案的53人多是煤炭部门的工程师,其中5人被执行死刑。

1930年秋天,宣布发现了在主要食品供应系统的破坏性的间谍组织,一些钻进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商业人民委员部、肉类联合公司、鱼类联合公司、果品蔬菜联合公司等类似组织的破坏分子,破坏了许多城市和工人村的食物供应,在国内一系列地区组织了饥荒,同时肉类涨价,罐头质量差等也应该由他们负责。涉案的46人全部被秘密执行死刑。

还有1930年11月到12月的“工业党”案件,涉案的多是有名的技术专家。《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1年版,第185~202页

这里显出了宣传家和史学家的不同。史学家的任务,是使人明白一些事实,宣传家的任务,是使人接受一种观点。不论是宣传家或是史学家,都必须会写文章,这却是共同的了。

胡乔木当然会写文章。我以为他更会改文章。他曾经审阅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稿,当时我有机会看到他修改过的校样,改得真精彩!这里举一个例:《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一文中提到法国作家纪德,原来的注释稿中说纪德“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法西斯分子”。胡乔木在审阅时将毫无事实根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法西斯分子”一句删去,并且把“诽谤社会主义制度”一句改为“攻击苏联”。对于这一修改我是十分佩服的。如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稿档案中还保存了当年胡乔木修改过的校样,倒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材料。■

(作者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更 正

2001年第9期第83页右栏第2行“第四野战军第18军”,“第18军”应为“第48军”;第10期第50页左栏第3行“国务院秘书长马永顺等”有误,应为“国务院秘书厅马永顺等”,当时国务院秘书长是习仲勋;第64页左栏倒数第2段“1941年10月日军偷袭珍珠港”有误,应为“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

欢迎 订阅

邮发代号 25-42

2012

全国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送报传真情

单位为离退休老人订一份《安徽老年报》等于送了一年的人情。

儿女为父母及其他长辈订一份《安徽老年报》等于尽了一年的孝心。

为朋友赠送一份《安徽老年报》等于送了一颗火热的心。

为困难户老人送一份《安徽老年报》等于尽了一份敬老情。

为自己订一份《安徽老年报》等于常年享受甘露。

安徽老年报

本报是我省唯一的老年人报纸,曾被省评为一级报纸、编校质量先进单位、广告发布诚信单位。

- 一版 新闻言论
- 二版 卫生保健
- 三版 《枫林》副刊
- 四版 综合
- 月末为生活版

四开四版逢五逢十出版
全年订价:28.40元
零售每份:0.40元

为离退休老干部订 《安徽老年报》

我省领导一贯关心离退休老同志,不仅关心物质生活,还关心精神生活,其表现之一就是让老干部订阅老年报。早在老年报刚办的1989年,省委老干部局与省人事厅(局)就于当年8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涉老部门把老年报当成自己的机关报,给予积极的关心和支持,明确规定为每位离休干部订一份《安徽老年报》。1992年4月,安徽省人事厅(局)又发出补充通知,要求为每位退休干部(含工人)订一份《安徽老年报》,单位退休管理部门、活动室也要订阅。订报经费按省人事厅(局)、省财政厅皖人字(92)07号文件规定,从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中开支。

本报发行部地址:合肥市庐江路69号
邮编:230001 电话、传真:0551-2653071

失落自我 回归自我

○ 资中筠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的。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取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

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

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

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去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图南)老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



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

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

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结集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

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国格与人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越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为《资中筠自选集》自序)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考察

○ 王铁群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问题是,作为人数众多的阶级,无产阶级如何专政?

列宁在 1921 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是这样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不通过共产党不能工作”,“我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

共产党也是由众多的党员组成的群体,它又如何实现人数甚至多达数千万之众的全党专政呢?

列宁回答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他声称,“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罗莎·卢森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一种小集团的专政:“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

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32 页)。

陈独秀也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是不存在的,它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专制。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苏联历史学家阿布杜拉赫曼·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所著《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一书中分析说,苏共党内有许多层,最外层由 1600 万普通党员构成,套在它里面的次一层由 400 万各级党委委员组成,再往里由 40 万专职党务干部构成,再往里由从区党委到苏共中央大约 3 万名党的书记构成,而核心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普通党员没有实权,真正掌权的是 3 万名书记。因而苏联的共产党专政,“是书记专政”;苏联的共产党独裁,是书记集团独裁。

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况

1917 年 11 月(俄历 10 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二月革命”后的民主临时政府,11 月 8 日,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由此拉开序幕。

1918 年 1 月,苏维埃政权用武力驱散了民主政治机构——立宪会议。从 1921 年起,苏维埃中的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均被取缔。1922 年 8 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反苏维埃党派问题,决定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给予镇

压。于是,其他党派存在的权利被取缔,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

苏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集权。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1. 政治上

苏共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权力,人民大众无权选举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无权监督执政党。从30年代到斯大林去世,20多年仅召开过3次党的代表大会,2次党的代表会议,23次党的中央全会。这就使苏联的政治权力集中于总书记之手。尽管后来党的代表大会届数间隔较为规范,但领袖独裁的本质没有变化。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结束语中,戈尔巴乔夫写道:“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

根据解密档案的披露,早在列宁时期就开始了特权化、腐败化。如浪费公款、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到斯大林时期,特权化、腐败化更加严重。从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斯大林在全国的别墅超过100所。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24岁任中将,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使特权家族化: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女婿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期间,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苏联社科院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85%。

2. 经济上

1917年列宁在十月夺权后,便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排斥个人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苏俄经济濒于崩溃,1920年同1913年比,谷物产量下降55%,工业生产下降了近86%,国民收入下降了75%。1921年列宁被迫转向新经济政策,容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

斯大林掌权后,通过强权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到1936年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同时消灭了一切非公经济成分,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这种经济制度带有空想性,存在严重的先天缺失,如单一公有制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激励机制、计划经济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少数人对公有财产和计划运作的垄断等。

苏联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导致了大饥荒。由于集体化乌托邦严重打击了农民积极性,使农业歉收。在工业化运动中,非农业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需求大增,苏维埃强行征购,甚至将农民的备荒粮都抢走。集体化的低效率、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以及1932年的歉收,终于导致1932~1933年的空前大饥荒。

在这场大饥荒中,饥荒和死亡最严重的是被称作“欧洲粮仓”的乌克兰。2006年11月24日至29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乌克兰之家”,举行了1932~1933年大饥荒档案揭秘展。资料显示:乌克兰在1932~1933年饿死700万至1000万人,这一数字相当于乌克兰当时全国人口的1/4至1/3。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说,在1932~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也发生“易子而食”的惨状,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乌克兰议会将11月28日设定为纪念大饥荒的全国哀悼日。

除了乌克兰饿死700万至1000万人外,苏联另外14个加盟共和国死亡人口最少2000万。最保守计算,苏联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约3000万。

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2;1933~1937),成为工业强国,当时其工业总产值居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但这种出于实现“世界革命”需要,人为地通过计划经济的工业

化,是以牺牲农民、农业,甚至是以牺牲国民的幸福为代价的。苏联可以“卫星上天”,但却不能满足本国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号称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1953年人均粮食和肉类产量比沙皇时期的1913年的产量还要低,公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这证明专制国家即使变成超级大国,对老百姓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老百姓并没有获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步改善。

苏联搞的是粗放型、大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基建投资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国家预算支出的50%。70年代末,苏联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消耗石油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额多50%。

2009年12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说,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得到的进步,是用压迫百万人民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代价换来的。斯大林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应被遗忘的事实。

3. 思想文化上

“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查封了多家报纸,第三天列宁签署《出版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到1918年5月,所有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活报》在内,全部被停刊。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大众传媒成了官方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文化领域也曾出现“自由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文学试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赫鲁晓夫时期也曾有过文学的“解冻”,但均属昙花一现,书报检查制度的强化和高压整肃的升级,使整个知识界笼罩在恐怖之中。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苏共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严控的情况:“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

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营造了举国上下思想一致的假象,广大百姓则陷于蒙昧主义之中。

对那些有良知的文学家、思想家则施以政治高压,甚至迫害至死。苏共二十大以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在遗言中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界控诉说:“那些有良知的文学家‘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八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09页)。

4. 对待政治异己

为了维护专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对各种政治反对派采取无情打击乃至肉体消灭的政策。

针对俄国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的反抗,列宁于12月20日成立了“全俄特别委员会”(“契卡”),这把“革命之白刃”的职责是“肃清反革命”,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列宁认为:“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据史料介绍:“沙皇政权在1826至1905的80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894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10万。以后斯大林统治下30多年计,死于大清洗、古拉格群岛和秘密警察专政下的无辜者,更是不计其数!”

斯大林在执政期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有人做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为284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45人外,剩下239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188人,自杀的8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22人,只有21人安度“中年”。(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党治制的由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88页)之所以说安度“中年”,是因为

斯大林在 1952 年又在筹划新一轮清洗,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点名批判。若非斯大林在 1953 年 3 月突然去世,苏联不知又要降临什么人间灾难。

苏联大“清洗”,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有多少人死亡?确切的数字迄今没有定论。但据一些人士的估计,数目十分惊人。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是当时少数能够看到最机密档案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说:“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中间的’数字,我做出如下的统计……从 1929 年到 1953 年总共有 1950 万到 2200 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 1/3 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46 页)。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特别顾问亚·尼·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时期都担任“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2000 年“十月革命”节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 2000 万人,也许还要多。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引用了 2000 万人的说法。他写道,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 2000 万到 2500 万人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

苏联大“清洗”的数字是否确凿,有待进一步考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清洗”涉及的面极广,受害者不计其数。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沙皇从 1876 年到 1905 年的 30 年内,共处死了 486 人。与之相比,1930 年至 1953 年的斯大林治下被处以极刑的人数则是沙皇 30 年的一千多倍。

从 1991 年起,俄罗斯每年 10 月 30 日都举行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活动。2009 年 10 月 30 日,在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的活动中,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百万人因为虚假指控在恐怖中遇难,这些人甚至不能按照人的尊严被正常安葬。所谓的国家发展和成就等等,都不能建立在人们的痛苦和牺牲之上。任何事务都不能高于

人的生命价值,决不允许为政治迫害辩解。

三、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终结

赫鲁晓夫最先举起了改革的旗帜。1956 年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为苏联政治改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终结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针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赫鲁晓夫在 1957 年“十月革命”40 周年前夕提出了“全民国家”概念,以后他又在 1959 年苏共二十一和 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继续阐发了“全民国家”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把国家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吸引公民直接地经常地参加国务和社会活动,把生产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相结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每一个苏联人都应该成为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参加者!——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任务。”

“全民国家”思想以扩大人民代表苏维埃为主要实践途径。到 50 年代末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苏维埃系统:“1959 年,在苏联已有 5.7 万多个各种级别的国家政权代表机关,在这些机关里工作的有 180 多万名代表。”(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6 页)

“全民国家”的一种方式是全民性大讨论,如 1956~1957 年国家退休金法律草案和完善工业及建筑业管理提纲大讨论,1958 年发展集体农庄和重组拖拉机站及教育系统等大讨论,1959 年关于劳动立法草案等 4 个法律草案大讨论,1959~1965 年国民经济发展问题大讨论等。

“全民国家”的实践形式是多样的,如 1958 年各加盟共和国召开了 58 个各部门的会议,1959 年类似会议则达 125 个,会议讨论范围涉及各个领域,与会者来自相应的组织和集体,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到 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了”,苏联“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苏共“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赫鲁晓夫“全民国家”思想的实践,强化了苏联人民的公民意识,成为苏联“公民社会”的萌芽。但在专制的前提下,人民群众不可能真正实

现参加国家管理,事实上“全民国家”的实践在苏维埃的选举等很多方面都流于形式,各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等实际上也纳入了官僚体系。

赫鲁晓夫的其他改革措施以及“三和两全”政策,也都为后来苏联制度变迁埋下了火种,并使“社会主义阵营”朝着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自己一手扶植的勃列日涅夫搞下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逆转了赫鲁晓夫的宽松和改革政策,尤其是通过压制不同意见和舆论来维持政治权威,形成了“沉默的苏联”。苏联在表面上维持了超级大国的地位,甚至不断扩张势力影响,实际上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进入了缺乏创新的停滞状态。

勃列日涅夫死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在任一年多便先后病逝。

在契尔年科病逝的第二天,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选举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从此,苏联进入了最后一个时期,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公开性使苏联人民开始了解国家的真实历史。重新考察苏联历史和现实,人们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实行公开性的结果,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

之后,戈尔巴乔夫直接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冲击。他回忆说:“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我们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十月革命”后“取缔非共政党和取消言论自由,是同民主决裂的鲜明标记。”“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党国”的极权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

也都在于这一体制。”他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他强调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会议决定进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建立拥有实权的最高苏维埃。

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一位评论家说:“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作弊、非民主的结构和幕后操纵,但是这次选举将作为苏联人民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见到过的最民主的选举而载入历史。”民主选举的新的最高苏维埃,已不再是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他们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初步显示了苏联议会的作用。

公开性和民主化,使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非官方组织和团体,从1988年到1989年,非官方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许多非官方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活动。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他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1991年8月苏共下台。1991年12月,随着独联体正式建立,苏联不复存在。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正式解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由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此,这个地球上1/6地区的亿万居民重新走上宪政民主的轨道。■

(作者为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日本“买下美国”的教训

○ 张焕利

最近,笔者出差到东京,发现日本由于经济迟迟不见起色,建筑用地和房价已下跌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大约相当于日本泡沫经济顶峰时期的1/8。一位朋友在靠近东京中央区的隅田川畔贷款买了一套使用面积86平方米、带有保安系统、精装修的二室一厅公寓,仅花了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0万元),而且免收利息和税款。至于说远一点儿的郊区的二手独门独户小楼之类,因为每年要交地产税,有的竟然售价只合几十万元人民币也不容易卖出去。不少中国人认为,昔日世界之最佳的东京房价,今天比北京便宜。于是,他们更看中了东京的高价位地段,果断地出手了。比如新宿商业区、麻布、六本木使馆区等这些一般日本人不敢问津的地方。这不禁让笔者回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人似乎“要买下美国”的那种手握钞票无所忌惮的疯狂情景。

日本人曾买下美国10%的不动产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战后持续高速增长在日本经济,在世界上可谓一枝独秀。日本成了“世界工厂”,日本制造的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各地,所向披靡。1985年,美日英德法签订了“广场协议”,规定美元贬值。由此,日元不断升值到近原来的三倍。随着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确实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日本人也因此变得空前富有了。他们手中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了,过去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根本买不起的美国货,现在唾手可得了。于是,日本人开始到美国大肆购买。日本人购买美国商品,美国人当然高兴,但日本人对美国的房地产和企业资产的大量收购却令美国人深感不安,当时美国人甚至惊呼:“日本要买下美国!”

记得当时笔者在东京工作期间曾在报上看

到这样一条新闻:有日本人要买美国人想卖的一整座大楼。美国人报价4亿多美元,双方没有讨价还价就谈定了。可是,过了两天,日本人拿来的合同书上却写着日方付6.1亿美元。这让美方惊奇不已。日方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整座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日方要打破这个纪录!

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疯狂的程度。1989年6月,日本索尼公司宣布,他们以34亿美元成功购买了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此前,日本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在洛杉矶,日本人购买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共购买了美国10%的不动产。

日本人在美国大量购买资产,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反响。美国舆论甚至惊呼,历史上日本曾武装偷袭珍珠港,而今天日本正在经济入侵美国全国!美国人还预测,照此下去,有一天,日本人会买走自由女神像!

美国舆论也严厉指责那些把资产卖给日本人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只顾自己赚钱,丝毫不关心国家未来的长久发展和经济安全。有人呼吁政府出面制止日本人的大肆购买,要求政府设法防止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被不计成本的日本人不断抬高。

再看当时的日本国内呢,包括日本媒体在内,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而欣喜若狂。战后以来只能对美国俯首听命的日本似乎有望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了。

“买下美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

事实上,日本三菱公司购买美国洛克菲勒中

心不久,就因为经营不善,难以承受巨额亏损,不得不以当时购买的半价再次出让给美国原主。日本索尼公司购买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后,虽然索尼最终实现了向娱乐公司转型的战略,但花费了数倍的成本和时间。同时也被公认为是日本亏损最大的企业并购案。

在此不妨再回顾一下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转让案。1990年9月,有位名为熊取谷稔的日本人以8.4亿美元买下了美国圆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及风景优美的“17英里公路”。熊取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日本出售1000张圆石滩球场100万美元一张的会员卡,这样一下就可得到10亿美元,去掉8.4亿美元的成本,一举就能获得1.6亿美元的赚头。但机关算尽,到1998年,日本人熊取再也挺不下去了,又将这个球场以8.2亿美元的价钱还给了美国买家,而赚头最大的是那位当年的卖主美国人马文·戴维斯。1978年他买进这个球场时只花了7200万美元,1990年卖给日本人则拿到了8.4亿美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失去了大量收购美国资产的势头。以前收购的那些资产许多变成了经济包袱,不但不能带来收入,还要想办法摆脱。IT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更降低了日本收购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当初那些被认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美国房屋、企业等资产出售者其实是对的。他们不但在出售资产时没有吃亏,把那些资产日后可能的盈利都提前变现了,而且,出售这些过时的企业资产得到的大量资金,为后来的新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商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并没有让日本人“买下美国”,而且还在未来的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

可是那些日本购买者呢?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年他们的疯狂购买没有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虽然在世界经济中按数字排名第二,但在国家综合实力上仍旧远远达不到美国及西欧国家的水平。日本作为“世界工厂”带来的财富及日元升值造成的虚假富裕让他们头脑发热,从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为所欲为。日本人往往是出于非经济的目的而购买那些资产的,所以他

们才特别热衷于那些美国的不动产及各种有巨大影响的资产。至于这些资产能不能在日后带来足够的收益,他们并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考虑。而以后的局势发展也让他们为自己忽视经济规律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时至今日,每当谈起当年那一幕幕时,仍有不少日本人要么会感慨,要么会愤愤不平。不管怎样,总是美国人胜出,新出道的日本怎么也抵不过老牌资本主义美国,美国就是比日本厉害。还有很多日本人深信某种阴谋论,认为美国人设了个大圈套,并狡猾地诱使日本人上了当。

但在笔者看来,其实这些看法都不符合事实。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来自于制度的优势。通过出口工业品挣到了大笔美元的日本,当他们想要购买外国资产时,为什么大多选择美国呢?正是因为美国有可靠的产权保护,有优良的经营环境,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因为有这些制度优势,于是,美国人为购买日本货而支付的美元,通过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舆论批评,但因为美国社会对私有产权和市场自由交易的充分保护,美国商人可以坚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他们不必屈从政府或者公众的意见。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家的眼光和头脑始终有机会发挥作用。而美国也因此总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最大限度地发现成功之路。而正是在这方面,日本这个半路出家的经济大国还不可能有那种胜出的把握。

最近,中国在日本的投资收购活动日趋增加。据日本央行的统计数字显示,去年被中资并购的日企数量剧增,比上一年多了四倍。从1998年到2004年,中资投入日本的金额一直维持在100亿日元(约合8亿元人民币)的水平。可是,在那之后却逐年增长,到2009年创下最高纪录,总额为285亿日元(约25亿元人民币)。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衰退、房地产业持续低迷之际,日本人买不起的房子中国人抢着买,这种来自中国客户的“大手笔”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一些日本人认为,今天的中国还比不上当年的日本,但是,当年日本人的教训,中国人值得借鉴。■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今年第5期登载上海读者朱夏生来信,提到今年第2期江平先生《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一文中的“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诗句,认为其中的“鬼域”应是“鬼蜮”之误。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鬼域”与“鬼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江平先生的“鬼域”是对的。按照诗句的原意,“鬼域犹得诉罗殿”意为“鬼的世界还可以到阎罗殿去上诉”,“鬼域”与“圣朝”相对,指鬼的世界,而“鬼蜮”则指鬼怪,两者显然是不同的。

广州读者 曾昭柏

贵刊2011年第5期刊登的《文革前的〈文史资料选辑〉》一文中“有‘被俘将领有郑洞国、覃异之、黄绍竑’之句,‘被俘将领’之说”不确。郑洞国作为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他是在我军久困长春、曾泽生率60军起义后,自动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怀抱的,用《廖耀湘与蒋介石》一书中的话说:“他是投诚将领,行动比较自由”,毛泽东曾敦促国民党将领“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覃异之是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副司令任上于1949年初出走香港,同年8月宣布脱离国民党,12月回到北京的。黄绍竑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之一,和谈破裂后没有回南京,短暂去港后于1949年8月回到北平。故“被俘将领”宜改为“国民党爱国将领”。

这一期刊登的《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一文,有“罗瑞卿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毛主席那是忠心耿耿啊,结果给打得腿都断了”之句,腿是跳楼摔断的,不是打断的。

上海读者 朱夏生

贵刊2011年第8期《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一文中写道:“1957年反右运动狂潮中,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陈毅、聂荣臻支持下斗胆上书毛泽东,要求中科院不打一个右派,为共和国保护了核心精英群体,其功至伟!”给人的印象是中科院没有打一个右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57年反右时,我已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据我所知,计算所被打成右派的就有5人:谢鸿、柳维长、吴乐之、赵隆邦、黄自宁。中科院别的研究所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华东财委的精英顾准,当时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也被打成右派,我想研

究新四军史的作者,不应不知道。

北京读者 刘慎权

贵刊2011年第8期《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一文中提到:“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其所著的《十年浩劫史》中写过……其中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汇报到萍乡有个《万山红遍》时,江青插话……”据我所知,王年一的著作不是题名《十年浩劫史》,而是《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2005年出的第二版则名为《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我在上述二书中均未查到魏海林文所引的上述资料,但查到如下文字(1988年版第282~283页,2005年版第233页):“江西:程世清1968年4月9日在机械、煤炭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上说……”“九江、上饶、景德镇、萍乡、宜春及其他地方……公开号召为牛鬼蛇神翻案。”

此文中还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何式,他于1967年在被判处20年徒刑后,未来得及送至服刑地,即于1967年7月绝食死于狱中。”这里的“1967年”显系有误,何式1968年3月才被捕,怎么可能于1967年被判刑并死于狱中呢?

江西读者 吴厚荣

贵刊今年第8期《在南宁陪首长跳舞》一文中写道:“自小我就爱看上海滑稽戏,学会了苏北方言,记忆中,总理祖籍淮阴……便用苏北腔与总理对话。”我们知道,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但祖籍是浙江绍兴。该文作者说是从小记忆,所记不够恰切,情有可原。需要说明的是,2001年,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下辖的淮安市(县级)更名为楚州区。

江苏读者 王宗祥

贵刊今年第8期《在胡耀邦家做客》一文中说:“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胡耀邦同志下放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其中,“至1965年1月”不准确。有关资料介绍,中共中央1964年11月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于1964年11月30日晚到西安上任,12月1日到西北局报到。当时,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患病住院。胡耀邦在湖南的任职时间不可能到1965年1月。

陕西读者 王富春

欢迎订阅2012年 炎黄春秋

2012年本刊将继续——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

以史为鉴、以史资治，“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

恪守“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德，

以求实存真的态度书写历史。

全年 96元

订购热线：010-68532048
010-68539058

邮发代号：82-507 全国邮局网点均可订阅

直接向本刊办理全年订阅和单本邮购

邮局汇款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收款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银行汇款 开户名：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帐号：01090324900120109064325 开户行：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批发联系：13910850872 传真：010-68532569 电子信箱：yhcqfxb01@126.com Yhcqw01@126.com

网上订购：代理本刊零售网店“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http://yh100.taobao.com>

《炎黄春秋》杂志十年精选本 (共二辑) 隆重推出

《炎黄春秋》杂志独立、权威、真实、厚重，在国内读者群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十年精选本是2000年—2009年10年“亲历记”专栏所刊文章的精编集

著名历史学者吴思主编，为你揭秘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中国当代史

精选本分为两辑：《走向1949》和《1978纪事》，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后，所记录的内容偏重平凡人的视角，但也有对重大人物的审视；既反映出了当时普通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事件；不仅有原汁原味的纪实成分，更有还原历史的解密文字。



文章都是当事人自己亲历的活生生的历史，内中包括我在延安被“抢救”，随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日子、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宋庆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等许多著名篇章。

《亲历记：走向1949》定价29元 邮费6元

《亲历记：1978纪事》定价29元 邮费6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邮购地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咨询电话 010-68532048 68539058

李锐：我和辛亥革命的缘分

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演进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

《内蒙春光》影片风波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

小说《刘志丹》第二次被禁情况补充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